美国军事战略研究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蔡祖铭 主编

MEI GUO JUN SHI ZHAN LUE YAN JIU



军事科学出版社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蔡祖铭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22号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蔡祖铭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625印张　198千字
1993年1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21—480—X/E·387
印数 1——5000册
定价：4.6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为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我们认为，要想写好这本书，必须首先解决写书的目的和方法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首先弄清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军事战略以及怎样研究美国军事战略这两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军事战略？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美国军事战略，不仅仅是为了进行学术性、理论性探讨，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需要，为现实斗争服务。

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去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的旧格局已经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新旧矛盾交织，天下依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苏联解体后，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现在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己目前正处于“四无”的有利国际环境，即除使用战略核力量外，世界上已无任何国家能对美国构成全球性军事挑战；在

常规军事技术和运用能力方面，也无任何国家能与美国相匹敌；就战略态势而言，既无任何重要的国家集团或联盟对美国利益持敌对态度，又无任何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处于敌对的、“非民主化”势力的控制之下。总之，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它极其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随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美国在推行“地区防务战略”过程中，由于不必顾忌处理地区性危机时动武会升级至世界大战，加之，其军事力量的组成结构、武器装备、反应能力等比过去更适应打地区性战争，所以，美国出兵干涉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将比以往增大。美国总统布什上台三年多来的行为表明，他比本世纪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加乐于动用武力。西方评论家称：布什既不把武力看作是第一招，也不把它看作是最后一招。换句话说，他并不把武力看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是把它当作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标准选择办法。每当他认为“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而政治手段又不足以保护这些利益时，他就会诉诸武力。布什有恃无恐地动用武力的事例，前有1989年的武装入侵巴拿马，后有震惊全球的海湾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可以预料，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将更多地推行“大棒政策”。因此，我们今天来研究美国军事战略，对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和世界和平来说，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怎样研究美国军事战略？

建国后的四十多年来，国内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和调

查研究单位就美国军事战略问题写过大量的介绍与研究性文章，并出版了一些理论专著，但其内容几乎全部是围绕着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几个军事战略。我们认为，着重研究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这本《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是根据《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编写的，它要有相当的系统性。因此，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仅仅研究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上，就远远不够了。为了保证本书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我们尝试着研究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200多年的战略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俗话说：“无古不成今”，不研究美国军事战略的全部历史，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对美国军事战略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会落到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境地。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曾提倡“古今中外法”，要求人们“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倡的这种“古今中外法”，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指导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基本方法。

在本书的体例方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分别论述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为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楚，我们将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参加的各次重大战争中的军事战略的第一至七章编为上编，将论述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推行的军事战略的第八至十三章编为下编。为了探讨美国各个历史时期军事战略的内在联系，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相互孤立的现象，我们写了一个全

面论述美国军事战略的《绪论》以及反映美国军事战略中带有规律性特点的《结束语》，对各个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进行纵向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纵横结合的方法，使读者能对美国的军事战略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此外，在编写方法方面还要解决一个“评”与“介”的关系问题。考虑到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军事战略的专著，我们认为“评”与“介”二者不可偏废。然而，具体到各个部分，表述方法可以各有侧重。例如，在叙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时，以介为主，稍加评论。而在《绪论》和《结束语》部分，则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侧重评论。我们认为，采用这种区别对待、各有侧重的方法，也许能够较好地体现知识性与学术性并重的方针，以求达到“雅俗共赏，军民咸宜”的目的。作者的主观愿望如此，由于水平与资料的局限性，本书编写的内容同预定的目的之间定会出现不小的差距，望军内外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后不吝赐教，俾使作者在再版时能作补充与修正。

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论著，由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蔡祖铭任主编。全书各部分执笔分工如下：《前言》、《绪论》和《结束语》——蔡祖铭；第一至五章——马学印；第六章——王惠民、李植谷；第七章——李植谷、刘威；第八至十三章——萨本望。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吴春秋同志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目　　录

绪　　论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在战略研究方面起步是很晚的。美国是一个仅有210多年历史的新兴国家。在这短暂的历史上，美国曾参加过许多战争，其中重大的有：独立战争、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墨战争、美国内战、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侵朝战争、侵越战争和海湾战争等。但是，在上述许多战争中，美国并没有完善的军事战略。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美国边境从未遇到过严重的威胁。美国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都能以浩瀚的海洋作为屏障，并可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此外，由于美国的南北邻国都很弱小，因而可以享受到"不付任何代价的安全"或"廉价的安全"，边界线本身就给它提供了安全。正是由于美国人缺少危机感，人们对军事战略漠不关心。因此，在美国历史上，除了马汉和米彻尔等少数几个人而外，几乎没有出现过出色的战略家。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人开始重视军事战略的研究，但仅限于少数军人，而且时断时续，缺乏连贯性。美国人真正全面系统研究军事战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掀起了一股研究军事战略的热潮，在西方国家中呈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步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战略研究中心。

一、美国开展军事战略研究的历史沿革

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年）是18世纪的一场有限战争。在战争初期，无论是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还是其他任何领导人，对于如何指导这场战争，心中都没有现成的军事战略。因为当时他们并未把希望寄托在军事胜利上，而是希望通过

对大英帝国施加政治压力，迫使英国内阁避免这场冲突。所以，当费城的大陆会议正式决定派遣部队包围波士顿并从新英格兰以外的殖民地征募新兵予以增援时，华盛顿等领导人所遵循的战略方针只是持久地围困波士顿。除此而外，他们并没有较长期的战略计划。他们以为，一旦美国进行武装反抗，就会立即震惊英国的内阁，并会迫使它采取行动以调和这场冲突。因此，他们认为在围攻波士顿之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作战的必要了。

美国在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1814 年）中，也没有完善的战略计划。特别是在 1814 年，拿破仑征俄，法国遭到严重削弱，因而英国得以抽调军队增援北美战场。美国因为战前谋划不周，在新情况面前显得不知所措，因此不得不放弃其原定夺取加拿大的计划。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遭到局部挫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事领导人根本没有受过战略教育。当时，美国除西点军校外，没有更高级的军事院校。而西点军校又没有开设战略课。学校的教材除了几本战术手册外，根本没有本国编写的战略教材，而欧洲国家出版的论述战争艺术的书籍既昂贵又难以弄到。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军官们缺乏学习军事艺术的热情。

美国在美墨战争（1846～1848 年）中，出现了美国陆军史上第一位战略家，他就是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他以攻打墨西哥城获胜而闻名遐迩。但是，斯科特的军事思想并不是从美国以往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也没有进过西点军校。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 18 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他曾在图书馆里阅读过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军事文献。在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他曾访问过法国，接触过拿破仑时代的一些新军事思想。但是，他的这种欧洲 18 世纪军事思想在美国并没有多少市场，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追求的是能适应新形势的战略。

历时 4 年的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是一场总体战争。这场“美国式的大战”对美国军事思想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比拿破仑

战争的影响还要大。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在军事上具有雄才大略的北部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但却没有一个象克劳塞维茨那样的人能对这场战争的战略方面的全部经验做出系统的分析。可见，这时的美国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战略计划的制订是一门专门的军事艺术，他们制订的战略计划还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美西战争（1898年）标志着美国向海外扩张的开始，并表明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但是，这时美国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军事战略。美国将军谢夫特在回忆美西战争期间他在圣地亚哥作战的情况时说："如何实施这场战役，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实际上，这句话也适用于整个美西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役。但是，美国毕竟打赢了。所以，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没有战略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困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美国却出现了一位颇负盛名的战略理论家A·T·马汉。马汉是"海权论"的创立者，毕生从事海军并致力于海军理论著述，有著作20部。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确立了他的"海权论"。马汉的"海权论"的中心思想是：要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的战略目的。他的军事理论正适应于当时美国垄断资本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尽管美国参战很晚，1917年4月才宣布参加协约国，但美国对于如何参战事先并没有完善的战略计划。当战争的乌云已笼罩在欧洲上空时，美国的威尔逊政府对预先拟制战争计划的做法仍持怀疑态度。威尔逊在得知美国陆军部正在制订对德国作战的计划时，大发雷霆。结果，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实施从战略上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决策者们都未预料到美国将参加何种类型的战争。海军认为，未来战争将发生在加勒比海或太平洋，最后以一场大规模海战而告结束，而且海军抱着传统的不结盟的看法，认

为美国将单独打这场战争。陆军的作战计划也落后于形势，在1917年3月以前竟没有制订出一份向欧洲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当时的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布雷德利·菲克斯回忆说："我对制订作战计划一窍不通。我从未受过拟制作战计划的训练，也未听说过有谁曾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至于在这场战争中应首先击败哪个敌人、在何处击败以及怎样击败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欧洲盟国早已作出决定。这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只是执行了欧洲盟国的既定战略。不过，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作战经历，对于从战略上培养军事领导人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美国在欧洲部署部队时采用的许多战略原则，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军事领导人在各个战区都再次使用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战略思想和战略计划发生了转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一个时间很长的"临战前阶段"，这对于美国制订战略计划大有好处。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开始逐步进行战争动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不同，这一次美军的参谋部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因此，他们在战前就得以有机会同未来的盟国英国一起制订全球性的联盟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的战略家们来说是一场预有准备的战争。在美国军事史上，制订战略第一次成为国家军事当局的一项很重要的正式任务。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参加战争时有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的先进的战略思想。这次战争加快了美国战争决策者们成熟的步伐，这场战争还使美国的战略家们得到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机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不得不按协约国的既定战略行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待全球战争的方式和方法，在制订战略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在讨论欧洲战场的战略时，美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据理力争。而在制订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时，美国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盟国不得不按美国的战略行事。由于制订战略的能力

越来越强，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军事大国在战略制订方面已经摆脱了欧洲的影响而成为一个十分成熟的军事大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个世界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使用核武器摧毁对方，因此美国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依靠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英国的强大海军来阻止“外敌入侵”了。美国的领导人认为，美国的海洋和空中边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不稳”。美国这个带着高度安全感跨人 20 世纪的国家，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感到不那么安全了。象怎样避免战争、如何实施战争以及用何种手段进行战争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军事领导人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是政府官员、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 20 世纪的 50～60 年代，美国的战略研究进人了“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侵朝战争的教训，并着手研究如何推行侵越战争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这时已丧失了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技术上的突破又导致了氢弹和洲际导弹的出现。此外，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所有这一切，提出了美国战略应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国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一大批为如何制订美国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出谋献策的著作破门而出。形形色色的战略主张，诸如“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前沿战略”、“有限战争战略”以及“逐步升级战略”，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笼的。进入 70 年代以后，美国研究战略的势头一直长盛不衰。今天美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美国战略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战略研究几乎成为文人战略家的一统天下。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一些战略思想家大都是职业军人，其中虽有极少数人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但都充任过军职或参加过战争。但

是，今天，美国职业军人出身的战略家能与文人战略家一较长短的真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的战略研究已比过去更为广泛，更为复杂，其范围已不仅限于战争本身，甚至也不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这就是美国所说的总体战略或国家战略。现代战略内容包罗万象，与其他学科相比，无论是在深度方面，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现代战略的研究已经不再是职业军人所能垄断的。即使他们主观上想垄断，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真知灼见，大多不是来自军队的参谋部门或军事院校，而是出于在大学或民间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供职的文人战略家，例如布罗迪（著有《导弹时代的战略》）、基辛格（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奥斯古德（著有《论有限战争》）、考夫曼（著有《麦克纳马拉战略》）、康恩（著有《论热核战争》、《论逐步升级战略》）、柯林斯（著有《大战略》）以及谢林（著有《冲突的战略》）等。这些文人战略家在研究战略方面都是"半路出家"，过去都没有从军的经历，但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例如，基辛格本是历史学家，康恩本是物理学家，谢林本是经济学家。

美国文人战略家的兴起与战略研究的繁荣，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和互相促进的作用。文人战略家的涌现推动了战略研究的开展，而战略研究的开展反过来又鼓励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战略研究。文人战略家的思想比较活跃，不受传统准则的束缚。他们把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战略研究领域，例如美国流行的 MSG 技术（即 Model 模型、Simulation 模拟和 Game 博奕）。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创造性。

大批文人战略家涌入战略研究领域固然使美国的战略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但他们将新兴科学技术用于战略研究领域的作法也遭到不少的非议，认为用这些方法来制定战略决策是"企图对主观武断得出的结论赋予科学的外衣"。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

莱辛格在《定量分析与国家安全》一文中指出了使用新兴科学技术制定战略决策的局限性。他认为，战略决策不同于低层决策或作战决策，决策的层次越高，分析的定量性和系统性就越少，象国家安全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是不能依靠某一种专业技术简单加以处理的。就连某些定量分析方法最热心的倡导者也反对滥用定量分析方法。例如，莫顿·霍尔珀林在《七十年代的防御战略》一书中就曾指出："数量估计是重要的，但它只提供了现实政策问题的部分答案。"他认为，定量分析方法必须与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才能正确制定战略决策。此外，还必须指出这些长期在各种"思想库"从事理论研究的文人战略家们几乎全都没有接受过传统的战略教育，因此，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核战略，而对于常规战略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这就必然会影响他们对美国当局制定战略决策时的助手作用。

二、美国军事战略的内涵

1、战略的内涵与外延

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大多数战争的规模都不太大，进行战争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因而战略同战术一样，被视为纯军事问题。甚至到19世纪前期，尽管经历了震撼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战略仍然指的是军事战略。美国研究大战略的先驱者之一艾·厄尔在《现代战略的制定者》一书的"前言"中说："大约直至18世纪末叶，所谓战略仍然是指将军们用以欺骗敌人并赢得胜利的一整套战争谋略和诡计。但是，随着战争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经济、心理、道义、政治和技术等非军事因素。因此，战略就不止是一个战时概念，而是无论何时治国之道固有的一个因素。"

到20世纪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帝国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精神（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之大，可谓触目惊心。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因素与非军事因素特别紧密地互相交织，打破了

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老看法，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战略问题。于是，西方国家有人提出凌驾于传统的军事战略之上的“大战略”这个新概念。至于“大战略”这个名词究竟是谁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不过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可以说是西方国家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军事理论家。他在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然而，由于利德尔·哈特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战略的研究方面，对于大战略并没有专著问世。但是，英国军方却正式采纳了大战略的概念，并在1935年出版的野战条令中为大战略下了定义：“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

然而，综观美国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漫长岁月里，美国人心目中的战略概念一直指的是军事战略。由于美国在那些年代里没有长期卷入世界范围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和平时期就没有一个以武装力量和外交手段相配合的、坚定不移地寻求达成政治目标的大战略，只有在战时公开使用武力以寻求彻底的军事胜利的军事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并长期卷入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政治斗争，于是美国便偏离了它的历史轨道，开始尝试制订大战略——美国官方通常称为国家战略。这种国家战略不是一种纯军事战略，而是利用国家整体资源，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总体计划。

在美国，最早探索国家战略的先驱当推长期在陆军服役的职业军人魏德迈。此人曾参与制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战略计划。他在他的回忆录——《魏德迈报告》中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战略家，我所受到的真正教育是1936年至1938年我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的那两年开始的。多亏在德国的进修，使我获得了一个学习广义战略概念的好机会。”他又说，为了研究美国应采

取的战略，他查遍了多种词典和著作，都没有找到战略一词的恰当的定义。“这些定义对我来说，似乎都太狭窄了。它们没有考虑到对于决定战争结局和国家命运同等重要的（其他）因素……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上，军事因素与经济、科学、技术、政治和心理因素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我认为，一个更广义的战略概念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后来，他也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并为大战略下了如下定义：“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他所说的国家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四大类。他强调说：“这四类力量实际上是国家政策的四件主要武器。如果前三者用之得当而且及时，即按统一的计划使用，那就可能不需要动用第四种力量，即不需要按传统的、赤裸裸的方式使用军队。”

由此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战略的概念已经进入美国，但美国官方一直没有使用这一名词。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颁发全军通用的《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中并没有“大战略”这个词目，而有一个“国家战略”，其释文是“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这一定义和英国野战条令为“大战略”所下的定义虽在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实际涵义却是一致的，都要求综合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去实现国家的目标。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从英国的“大战略”衍生而来的，或者说二者是同义词。虽然美国军方正式采用的是“国家战略”一词，但“大战略”这个术语在美国军内外的使用却相当普遍。

2、战略的层次

随着战略内涵扩大化趋势的发展，美国的战略概念不仅向横的方向扩展，而且还在向纵的方向扩展，使战略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发展。至于美国的战略究竟分为几层，各国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前苏联学者的看法

由前苏联研究美国问题的权威机构——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集体撰写的《美国军事战略》一书认为，美国战略可分为三个层次：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美国军事战略》一书为国家战略下的定义是直接引用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72年出版的《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下的定义，其释文前面已经引过，这里不再重复。该书认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包括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等几个部分。在理论上，美国国家战略的使命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利用国家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实现其根本的（“国家”的）目的。而实际上，美国国家战略的中心内容过去和现在都是如何解决在战时与平时最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国家潜力的其他成分以保证军事力量的建立和使用问题。

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军事战略》一书未下明确定义。书中只是指出，国家安全战略是比国家战略更为狭窄的概念，但它同样规定，为“保卫国家利益免受外部和内部威胁”，不仅要使用军事力量，还要使用各种非军事手段。不过该书着重指出，在国家安全战略这一级上，军事力量的作用更加重要。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未来战争的性质，武装力量的建设方法（以确保对敌的军事优势，确保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就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进行有利部署，使武装力量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全国作好战争准备），组织与其他国家广泛的军事合作和军事经济合作，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国家安全战略都有自己特定的名称，如“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和“现实威慑”战略等。

关于美国的军事战略，《美国军事战略》一书也没有下明确的定义，书中只是说美国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军事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组建、发展和训练计划（包括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战略展开）以及与盟国联合进行

的军事准备。对于进行战争的方法，则只进行一般的研究。军事战略同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计划有关。

中国学者的一种看法

80年代后期，我国军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探讨战略层次结构的热潮。有一篇论文认为，美国的战略可分为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四个层次。

文章为国家战略下的定义也是直接引用的美国《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所下的定义。文中虽提到“国家安全战略”一词，但并未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战略层次，而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对外政策与防务政策两个部分）是美国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均属国家级战略”。

关于国防战略，文章根据1987和1988财年《美国国防报告》及美国的一些军事著作中关于美国国防战略的论述，把它概括为“建设和综合运用全部国防力量，筹划、指导国防全局，以达到国家安全目的的艺术和科学”。它要求有效地运用与国防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心理等综合国防力量，达到维持长久的国家安全目的。

文章为军事战略下的定义也是直接引用的美国《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所下的定义：“运用美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各项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文章认为，美国军事战略包括部队运用战略和部队发展战略。部队运用战略主要包括战争指导、战场准备、部队部署、战略展开、与盟军联合作战以及战略情报搜集等方针。部队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后备力量规模、体制编制、武器装备发展、战略预备队和战略指挥系统的组建等方针。

关于战区战略，文章根据美国国防大学教材中关于战区战略的论述下了如下定义：“美国战区战略是指美国各大战区部队的运用战略，其中包括西欧战区战略、太平洋战区战略和西南亚战区战略。”文章认为，美国当前在西欧战区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

和“前沿防御”战略均属战区战略。

我们的看法

总的来说，上述“三层结构”和“四层结构”的战略分类方法都有一些道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又觉得论据不够充分，而且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以“三层结构”中的“国家安全战略”而论，尽管美国人在一些著作和报告中经常使用这一名词，但从其内涵来看，这种战略就是军事战略。众所周知，当今美国军事战略本身就包含有组织武力与使用武力两层意思，因此，没有必要在美国“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再单独列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层次。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些军官和学者使用军语极不严格，有时他们用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军事战略”的同义词。从这一点上看，就更没有必要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单独列为一个战略层次了。

“四层结构”中的“国防战略”虽然在美国官方文件和一些军事著作中经常出现，但只要仔细推敲一下它的内涵，就会发现它和“军事战略”的内涵并无实质性区别。我们认为，所谓美国“国防战略”和前面提到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样，也是内涵已经扩展了的“军事战略”的同义词。因此，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层次。至于“战区战略”，美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词。象美国在欧洲战区奉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和“前沿战略”这样的东西，虽然带有“战略”二字，但如果按战略包括组织武力与使用武力的方针两部分组成这一科学定义来衡量，这两种战略只不过是战区的作战方针而已，因而本身并不能构成战略层次结构中的一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战略层次结构为“二层结构”，即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至于其他一些战略，有的是这两种战略的同义词，有的则是这两种战略的派生物，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战略层次。作为美国官方权威性词书的《国防部军语与有关术语词典》中只有“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这两个词目，便可作为上述结论的有力佐证。

下面简单叙述一下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国家战略是在军事战略的内涵扩展后产生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如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计划和作战系军事战略教研室主任小阿瑟·莱克上校在《军事战略的含义》一文（载于《军事战略》一书）所指出的，“我们不应把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大战略）混为一谈”。他认为：“军事战略只是包罗万象的国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事战略必须支持国家战略，并服从于国家政策（一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目标而采取的总行动方案或指导方针）。同时，国家政策也受军事战略的能力与局限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说：“正如战术是军事战略在较低一级的运用一样，（军事）战略是‘大战略’（即国家战略）在较低一级的运用。”我们认为，小阿瑟·莱克和利德尔·哈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关系是主导与从属关系，或者说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国家战略是筹划指导国家整个全局的，是制订军事战略的依据，而军事战略则侧重于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活动，其目的与国家战略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与方法不同。因此，它受国家战略的指导和制约。但是，军事战略在军事和战争领域进行的活动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可向国家战略提出必要的要求，作出反馈。

最后，我们引用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对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关系的小结。他说：“‘军事战略’和‘大战略’（指‘国家战略’）有联系，但绝不是同义词。军事战略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它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大战略如果运用成功的话，将减少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大战略所寻求的远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军事战略主要是将军们的事，而大战略则主要是政治家们的事。大战略支配着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只是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3、战略的构成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在1981年访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发表演说时指出："战略总是由目标、方法和手段几个方面组成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这一概念：战略＝目的（追求的目标）＋途径（行动方案）＋手段（实现某些目标的工具）。"他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制订各种战略，如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

小阿瑟·莱克接受了泰勒的观点，并将他的公式运用到军事战略方面。他认为，在军事战略方面，"目的"就是军事目标；"途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的各种方案，即军事战略方针；"手段"就是完成任务所必要的军事实力（人力、物力、财力、部队、后勤等）。据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公式：军事战略＝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实力。

那么，什么是军事目标呢？H·埃克尔斯认为，"目标是制定任何一种战略的主要问题。各级对政策及其目标的理解是整个国家战略和由国家战略产生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计划的基础"（《军事概念和思想体系》1965年出版）。而"军事目标"，就是"通过军事行动和利用各种军事实力来完成的特定使命或任务"。美国前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宣称："70年代美国主要的军事政治目标是：预防（'遏制'）以武力威慑为手段的武装冲突的发生；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证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制止冲突；维持足够的军事实力，以防止'武力胁迫'美国采取它所不希望的行动的可能性；向某些国家提供援助，以保证它们进行'自卫'；保障空中和海上的自由。"（《军队态势与陆军部1987年度预算估计》）

小阿瑟·莱克认为，所谓军事战略方针就是"在分析战略态势的基础上确定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选择，例如实施前沿防御、保留战略预备队和增援部队、炫耀武力、预储弹药装备、组织集体安全和提供军援等。

军事实力是军事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克劳塞维茨指出：确

定军队的规模“的确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把军事实力看作是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不仅会使军事战略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军事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两项，而且在集中精力解决军队建设问题时有可能忽视军事目标与军事战略方针，从而使三者脱节。美国的军事实力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一般任务部队、战略和战术核部队、防御和进攻部队、现役和后备役部队、作战物资和武器系统以及人力资源等。鉴于美国推行的是联盟战略，在考虑美国的军事实力时，还要把它的盟国的实力适当计算进去。

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和军事实力是军事战略中缺一不可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所谓制订军事战略，就是确定军事目标、制订实现这些目标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确定使用何种军事实力来贯彻军事战略方针。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相互制约的。军事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能够决定军队的建设和军事力量的部署。然而，军事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又必然受到军队能力与局限性的影响。如果在确定军事目标和制订军事战略方针的时候不考虑军事实力，就会出现战略失调的现象，也就是用不充足的军事实力去贯彻战略方针和实现军事战略的各项目标，这样就可能铸成大错。因此，上述三个基本战略要素必须协调一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出现矛盾，国家的安全就有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军事实力这一要素，在制订军事战略时更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世界军事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战略计划之所以破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目标没有建筑在可供支配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之所以失败，除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而失道寡助这一根本原因而外，其侵略野心太大而其军事实力相对不足，亦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军事目标代表国家对战略的“需要”，而军事实力则代表“可能”。只有把“需要”和“可能”妥善地结合起来，这个军事战略才是切实可行的。这种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是一条公认的战略原

则，也可以说是战略的精髓。那么，目标和手段怎样才能统一起来呢？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列举了七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1) 决策者可以杜绝浪费，不论构成浪费的原因在哪个方面——制度、编制、程序、文化或其他方面。

(2) 决策者可以压缩目标。朝鲜战争中，当中国进行干涉时，联合国就是这样做的。

(3) 决策者可以调整战略。60年代，当美国制止了苏联人的武装侵略（指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作者）时，苏联人就是这样做的。

(4) 决策者可以增加可供使用的手段。美国公开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就是这样做的。

(5) 决策者可以降低目的要求，增加手段。美国在印度支那就采取了妥协的办法。

(6) 决策者可以采取讹诈手段。1936年希特勒以其弱小的陆军进入莱茵区，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就是这样做的。

(7) 决策者可以作出目标已值不得争取的决定，采取忍痛撤退的办法。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就是这样做的。

总之，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只要发现可能引起的风险大于估计可能得到的利益，决策者就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务求使军事目标与军事实力很好地统一起来。

三、美国制订军事战略的依据

军事战略是领导和指挥战争的人们的主观指导活动。但是，这种主观指导活动并不是军事统帅凭个人主观意志而进行的自由活动，而是在各种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而进行的活动。战争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活动，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自然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战略作为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也必然要受这些条件的制约。下面我们分别探

讨这些条件对制订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

1、政治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达成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列宁说：“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157页）。战略是为战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要服从政治的要求，千方百计地去完成政治赋予的任务。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我们便可以说，政治目的是决定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因素。

战后，美国统治阶级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力图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永远保存下来，在同社会主义的对抗中保持和恢复资本主义的阵地，排斥进而最终消灭社会主义体系。根据这一总的政治目的，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原苏联当作它的主要对手。对于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美国亦当作次要对手或潜在对手。美国在60年代推行的“两个半战争”战略（即“灵活反应战略”）中的“两个战争”就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即准备同苏联和中国同时打两场大战。

美国统治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政治目的是企图将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保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阻碍它们从新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存殖民压迫的最后堡垒。美国推行的“两个半战争”战略和70年代推行的“一个半战争”战略（即“现实威慑战略”）中的“半个”战争，就是为了镇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美国统治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力图保持并进一步巩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地位，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政治影响之下。为此，美国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合作”。美国推行的“集体安全”、“前沿防御”、“总体力量”等战略方针，都是为实现上述目的服务的。

此外，美国军事战略还受国内政治条件的影响。这表现在两

个方面。其一，美国军事战略往往要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垄断财团的利益所左右。美国各个垄断财团都竭力争取奉行那种能最大限度满足本财团私利的军事战略。各垄断财团实力地位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军事战略的改变。例如，50年代初美国军事战略由“遏制战略”改变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部新兴工业财团得势，要求发展导弹与飞机工业，以保障该财团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战后代表不同财团利益的美国几届总统上任不久就改变军事战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二，美国军事战略也受国内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这是因为民众的税收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军队的兵员来源于民众而且民众的反战情绪对于推行美国的侵略与扩张政策会产生重大的制约。为了减轻民众政治态度对军事战略的影响，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特别强调如下两点：第一，尽量减少对人数众多的陆军的依赖，重点发展技术装备精良而用人较少的海、空军，同时让盟国扮演“炮灰”提供者的角色。第二，强调进行速决战，因为在持久战条件下，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会遭受特别严重的威胁。不过，我们应当看到民众政治态度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的，因此，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2、经济条件

经济因素对军事战略的影响是巨大的。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战略观点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讲是以经济条件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军事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军事战略的目标不应超出国家实力所允许的范围，否则，这种军事战略就必然是失败的战略。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军事战略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尼克松政府1969年上台后不久急于改“两个半战争”战略为“一

个半战争”战略，除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等客观原因外，美国国内经济情况不景气、国力日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第二个表现是，虽然经济的发展服从于自己的规律，但经济在确定发展方向时也要考虑战略的需要，而在战时它的发展方向则几乎完全是根据战略的需要而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不考虑战略的需要和最合理地利用本国资源于国防事业，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国家应随时作好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准备，以应付战争。因此，国家的经济组织通常应在某种程度上适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美国由于享有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处于不易遭受欧洲列强攻击的地位。因此，在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基本战略方针都是在战争爆发后再进行军队和军火生产的动员，利用主要参战国浴血奋战的时机，积聚军事潜力和经济潜力，等到这些国家精疲力竭时，再将美国的强大潜力加到交战双方实力较量的“天平”上去，以坐收渔人之利。但是，自从原苏联掌握了火箭核武器之后，美国便失去了地理上的防御屏障，美国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等战争打起来之后再慢慢进行战时动员，逐步将经济转上战时轨道了。为了适应新的战略形势的需要，美国政府采取了在平时就将经济转上战时或准战时轨道的政策。

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第三个表现是战后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美国统治集团在将美苏两国的综合国力进行对比后看到，原苏联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已能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在战略资源和后备兵员方面还占有优势，但在整体经济潜力方面仍落后于美国。根据这一基本分析，美国近年来推行了“竞争战略”，加强军备竞赛，由陆地、海洋和空中一直争到外层空间。1983年里根总统提出需要耗资上千亿美元的“战略防御倡仪”(SDI)，除了想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带动整个民用工业而外，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与技术优势，通过在太空领域的竞赛，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3、军事条件

军事力量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它的强弱，对战争规模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战争形势的变化乃至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一项军事战略能否行得通，其军事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足够可供使用的军事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探讨军事目标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时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同它们所要对付的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制订军事战略时要考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十分重视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军事力量的对比，特别是核力量的对比，并根据对比的结果修改其军事战略。在40年代后期至整个50年代，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先是处于垄断地位，后是处于优势地位。在此期间，美国推行的是强调"第一次打击"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是，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火箭核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逐渐丧失了核优势地位，甚至有人惊呼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为了适应新的力量对比，美国放弃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推行强调"相互确保摧毁"和"第二次打击"的"灵活反应"战略。

4、科技条件

一定的战略是与一定的科学技术相适应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促使战法变革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从中观或微观上看，一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产生一定的武器，而武器又决定了战略战术和战争样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武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战争。不言而喻，什么样的战争，当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世界军事史表明，科学技术越发展，它与战略的关系也就越密切。这一点对奉行"唯武器论"的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自从40年代中期军事技术由利用机械能、化学能进入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以来，核武器就成为影响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在50年

代拥有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才会有“大规模报复”战略；正是由于在60年代出现了美苏“核均势”，美国才改而奉行以核力量为“盾”、以常规力量为“剑”的“灵活反应”战略。同样，正是由于近年来美国在微电子技术、高速数据处理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高能粒子束技术、微波技术、C^3I 技术、遥感探测技术以及自适应光学技术等尖端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在其他多数项目上都超过了原苏联，所以里根才得以在1983年提出旨在同原苏联进行太空领域竞赛的“战略防御倡仪”。

5、自然条件

古今中外的战略家无不重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幅员、地形、人口、资源以至气象条件等，对于制订军事战略均有重大的影响。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与一个小国相比，通常具有生存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在上述诸多自然条件中，地理条件对军事战略的制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大陆国家不能弃陆崇海，应该推行大陆战略。同样，一个海洋国家不能弃海崇陆，应该推行海洋战略。如果一个国家不考虑自己的地理条件，硬要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就难免不失败。典型的例子是，德皇威廉二世非常欣赏马汉的“海权论”，他不加具体分析地盲目推行“海洋战略”，妄图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使德国变成海权强国。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几乎没有起作用，反而由于资源分配不当，致使陆军的兵力达不到应有的数量。德国在这种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惨遭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美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大天然屏障使美国远离战事纷繁的欧洲。美国周边均为一些弱小国家，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美国长期享受着“廉价的安全”。但是，自从导弹核武器问世后，地球的范围“缩小”了，美国失去了地理上的安全屏障。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便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成为制订军事战略时必须考

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从50年代初开始，美国便成立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现改名为“北美防空与防天司令部”），建立了战略预警系统，组建了防空与防天部队。1983年，里根总统又宣布要执行一项旨在防御原苏联导弹袭击的“战略防御倡议”。

6、国际条件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受国际关系的影响。军事战略的制订和改变，也越来越离不开国际条件。美国是当代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军事战略是以独霸世界为最终目的的全球战略，受国际条件的影响更为明显。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特别是几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是美国制订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战后世界经历过的几次战略格局的变化，都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例如，60年代末期尼克松政府之所以放弃“两个半战争”战略，改而推行“一个半战争”战略，主要原因就是中苏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中苏之间在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使美国政府看清了中苏之间的分裂。他们认为，“中苏之间铁板一块的团结再也不存在了”，美国已无必要准备同苏联和中国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战略形势下，美国企图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实现其“联华反苏”的新战略方针。当前，苏联已经解体，两极格局已经瓦解。为适应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需要，美国又制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

上　　编

殖民地时期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美国军事战略

第一章　殖民地时期的战略传统

美国原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建立的殖民地。1607年英国建立詹姆斯城——后发展成弗吉尼亚殖民地，到1733年在北美大陆东海岸已建成13个殖民地。从1607年到1774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称为殖民地时期。在这个时期，殖民者在战略上形成了追求进攻和歼灭的传统，在军队建设上形成了轻视正规军、崇尚民兵以及文官治军等传统。

一、歼灭战略

为确立在北美大陆的主导权、确保殖民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殖民者同土著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印第安战争是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方式，结合自己在军事上的强点和弱点，殖民者奉行了以毁灭印第安人的社会基础为特征的歼灭战略。这种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避免同印第安人进行游击战，力争找到印第安人的村庄并把它夷为平地，从根本上断其生路，尔后加以歼灭。

印第安人的战争方式具有同白人极为不同的特点。其一，他们的目的重在比武，而不在于战胜和消灭敌人。"他们从不彼此靠近，……而是在很远的地方朝天射箭，然后盯着天上，看箭落在什么地方，不到箭落地就不射第二支箭。这种战斗简直是在消磨时间，而不是要战胜和征服敌人。"（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10～11页）其二，他们不打全面战争，极少打击非战斗人员，而是把战斗严格限制在打击战斗人员上。其三，他们不进行正面决战，而是进行游击战。他们分成若干小股出征队，各自

单独行动。他们不停地运动，反复运用突然袭击和伏击战术。他们行动隐蔽，快速集结，攻击得手后，很快便消失在旷野之中。如果强敌当头，他们并不死守硬拼。这种作战方式虽缺少战略眼光，但却足以对殖民者构成战术上的威胁。

与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相比，殖民者的作战方式具有明显的战术缺陷。他们习惯于采用欧洲式的正面进攻战术，进行近距离平射，通常成密集队形。因此，他们常常受到印第安人的骚扰，但却无法识别和发现敌人。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殖民者采取了两种措施，即雇佣部分印第安人作为盟军和把战争目标由打击游击队转向打击其社会基础。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以部落或半独立群体存在的互相分离的若干少数民族。他们之间为争夺土地等而进行的战争连续不断。因此，利用一部分印第安人去攻打主要的敌人就成为殖民者惯用的手段。几乎所有的印第安战争都是殖民者伙同一部分印第安人反对另一部分印第安人。在丛林战和游击战中，只有印第安人才是印第安人唯一的克星，如果派远征军攻打印第安人而没有印第安人伴随行动，只能是自取灭亡。印第安人在充当向导、间谍、侦察员等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但是，即使有印第安人的帮助，殖民者也很难迫使主要敌人进行决战。其结果是要么让敌人白白溜走，要么误入敌人的埋伏。因此，殖民者改变了打击的目标，由打击行动迅速的印第安战士转向破坏他们的村庄和食品供应点。殖民地部队往往由印第安人侦察员作向导，攻打印第安人的村庄。他们疯狂地烧毁印第安人的居民点，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捣毁食品仓库，使幸存者饥饿而死。这种战略目标的扩大化体现了殖民地时期战争的残酷性。

殖民者采用的这种破坏印第安人的整个社会而不只是针对战士的总体歼灭战略，在印第安战争中确实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它使掌握先进生产方式的殖民者得以逐个毁灭一个个印第安部落，夺取他们的土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殖民地最初的发展时期牢固地确立了白人的主导地位。例如，在 1622～1632 年和 1644～

1646 年的两次泰德沃特战争中，殖民地派出远征军，雇佣印第安人作向导和战士，不停地袭击泰德沃特地区的印第安人，残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毁灭村庄、玉米地和渔塘。从此，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再也无力抗拒白人的扩张了。1637 年在新英格兰地区发生的皮廓族战争和 1675～1676 年在这里发生的“菲力普王战争”，1711～1713 年在北卡罗莱纳发生的“塔斯卡格拉战争”，1715 年在南卡罗莱纳发生的“亚马斯战争”，等等，都是以印第安人的失败及其社会的覆灭而告结束的。

美国独立后，几届政府都奉行以驱赶印第安人、侵占其土地为核心的“保留地”政策。陆军在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继承了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总体歼灭战略，使印第安种族濒于灭绝。

17 和 18 世纪，欧洲处于“有限战争时代”。欧洲各国都尽力减少战争造成的破坏，给战争施加各种限制，但北美大陆的殖民者却不顾一切，大肆屠杀普通居民，毁坏其社会财富。这种总体歼灭战略成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战略传统，也构成了有别于欧洲的战略特色。这种传统对日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进攻战略

在欧洲列强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斗争中，西班牙和荷兰相继衰落，最后只剩下英、法两个殖民大国。他们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挑起战争，而每一次战争都波及北美大陆，从而使英国的 13 个殖民地卷入同法属加拿大之间的长期战争。从 1689 年爆发“威廉王之战”到 1763 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称殖民战争时期。殖民者为了消除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影响，十分热衷于进攻法属加拿大，一次次的北征形成了殖民者的进攻战略传统。

1689 年，欧洲爆发“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在北美被称为“威廉王之战”)。加拿大总督弗朗特纳伯爵兵分三路，向新英格兰—纽约一线发起进攻。1690 年 4 月，纽约、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代表们制定

了一项完整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成了后来对新法兰西作战的战略蓝图），预定两路出击，一路从奥尔巴尼出发，经陆路进攻蒙特利尔；另一路则溯圣劳伦斯河而上，进攻魁北克。如两路能同时到达各自目标，加拿大为保两城就会分散原本不多的兵力，这就为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如英国方面集中兵力于一处，另一处就唾手可得。殖民军方面由于征集到的民兵和易洛魁盟军武士太少，加之天花流行、口粮不足，指挥官取消了对蒙特利尔的远征。进攻魁北克的部队约2000人，到10月份才到达魁北克，但时令已入寒冬季节。该城位于悬崖之上，易守难攻，加上蒙特利尔未受威胁，这里的守备部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殖民军虽多次发动猛攻，但进展很小，加之补给匮乏，寒冷难耐，指挥官被迫率部撤退。第一次远征加拿大遂以失败而告终。

1701年欧洲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很快蔓延到北美殖民地，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殖民者再次向母国（英国）提出1690年制定的北征计划。1709年英国女王批准该计划，并保证派出舰只和部队两路夹击，一举征服加拿大。面对这一良机，殖民者坚信这次远征不会重蹈1690年的覆辙，并积极作好作战准备。地面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为1500人，包括来自四个殖民地的民兵和易洛魁人，集结于伍德克里克；另一路为1200余人，集结于波士顿。万事俱备，只等女王派出的舰队来援。然而到夏初时节，英国却退出这次行动，致使宏大的远征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此后，在1711年和1746年殖民军又进行了两次徒劳的远征。直到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才打败法国，夺取了加拿大。然而加拿大并没有同13个殖民地融为一体。在1775～1783年和1812～1814年的两次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人又多次北征加拿大，但均未成功。

北征加拿大的战略集中体现了殖民者的进攻意识。这种战略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殖民地北部的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北征的需要。13个

殖民地是一条狭长的滨海地带。西边长长的阿帕拉契亚山，是一道天然屏障。南边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已构不成威胁。东边浩瀚的大西洋处于大英帝国的控制之下，可保殖民地安全无虞。唯一受到威胁的是北部边境地区，即新英格兰当面的法属加拿大。新法兰西占有地利之便，可取道圣劳伦斯河轻易进入大陆腹地，占据俄亥俄河流域，南下密西西比河，对英国殖民地形成两翼包围之势。因此，殖民者深感加拿大是危险的根源。一旦它为敌人所控制，殖民地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这就是殖民者如此执著地谋求征服加拿大的首要原因。

在英国殖民地同加拿大的交界处居住着两个大的印第安部落即阿尔贡金人和易洛魁人。他们之间互为敌人，争斗不已。易洛魁人扼守着北部边界的交通与贸易要道，他们与英国殖民者为伍，而阿尔贡金人则与法国人结盟。有易洛魁印第安人作盟军，也是殖民者敢于发动北征的一个有利条件。

其次，加拿大远在北方，决定了殖民者必然要采取进攻的方式。进攻是达成战略目的的主要手段，只有进行远征和发动进攻，才能将加拿大的威胁拒之门外，才能进行决战，从而彻底解决北方的威胁问题。对殖民者来讲，长年累月的荒野生活培养了他们的进攻精神，对印第安人的长期战争进一步确立了进攻的主导地位。他们尽管力量有限，但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这种进攻战略同殖民者的开拓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这种进攻战略有其物质基础，那就是殖民地人口上的优势。英国的殖民方式与法国不同。法国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寻找金银财宝，做皮毛生意，因此只有少数商人和军队守卫着自己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的目的是建立大英帝国，进行大规模移民。移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垦土地，从事生产。这种殖民方式以创建新社会为目的，因此有着很大的生命力，其人口繁衍远远超过法属加拿大，也超过印第安人。当时，英国殖民地与加拿大在人口上的比例是 15：1。这种优势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殖民地实力的主

要组成部分。这是殖民者在挫折面前毫不退缩、锲而不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信心的重要基础。

三、简短的评论

1、殖民地时期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军事制度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根源。离开这一时期，美国的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从研究美国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说，殖民地时期的战略传统和战略意识对日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有着无法抹杀的影响。

2、殖民地时期是美国的“史前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战略问题只能从这一时期的重大军事活动中去分析，从面勾画这一时期军事战略的脉络。因此，这里讲的歼灭战略和进攻战略只是广义上的战略，不是狭义上的战略。在长期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歼灭意识、总体战意识正是一个新生的民族求生本能的反映。这种传统在日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点。特别是歼灭战略，从殖民地时期起，经过多次战争的考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构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历时 300 年左右。

3、歼灭战略和进攻战略是殖民地时期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其核心是主动精神。主动是进攻的前提，是歼灭的保证。在从 1689 年到 1814 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殖民者始终把目光盯在加拿大身上，一再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和进攻，在 1763 年之前是为了消除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和影响，在两次独立战争中则是为了从英国手中夺取加拿大从而迫使它承认自己的独立。虽然此后北征加拿大的进攻战略因北方边界的划定而停止使用，但它所表现出来的进攻传统却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

第二章　独立战争时期对军事战略的探求

1775年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开始了历时8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但1783年的和平条约并未使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获得完全的独立，结果在1812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美英战争，史称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这两次独立战争，是美国诞生的助产婆。作为一个诞生于战火中的国家，美国一开始就碰到了一系列战略问题，这一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一、华盛顿的防御战略

《独立宣言》发布后，大陆会议即开始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协调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外交上，成立了外交委员会，向欧洲国家派出使节，争取外援，以便共同对英国施加压力，迫其向殖民地作出让步。在军事上，组建"大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以统一领导各殖民地的武装斗争，使独立战争由自发斗争走向有组织的斗争。但是，对于究竟应采取什么军事战略，大陆会议并不明确，"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将军也是心中无数，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探索。

华盛顿认为，由于在总体力量对比上美国处于劣势，加上最初北征加拿大的失败，美国应采取战略防御。为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官尽最大努力"防止敌人侵入我们的殖民地"（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第17页）。虽然他肯定地认为美国进行的战争应当是防御性的，但如何实施防御，他并不清楚。他简单地认为，防御就是"坚固设防并保卫交通线上的每一个重要哨所和要地"（同上第17页），敌人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进行防卫。在这

种单纯防御思想的指导下，他进行了1776年的纽约保卫战和1777年的费城保卫战，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华盛顿的战略知识并不丰富，他不懂得防御与进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在费城保卫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777年9～10月，英军攻打费城，华盛顿进行了费城保卫战。他对英军的行动总是作出直接、被动的反应，没有把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结合起来，最后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北方战场，他共指挥了五次重大的战役和战斗。其中只有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袭击战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新精神。他利用夜暗和圣诞节敌人疏于戒备这一有利条件，率部袭击了德国雇佣军的兵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在其他三次重大行动中采取的都是阵地防御，这充分表明他的防御战略具有很大的消极性。

作为一个墨守传统的军人，华盛顿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军事原则，如集中兵力和实施包围。他认为，对于陷入一场防御战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战役一打响，就尽力使部队在某些驻地集结起来，形成战区的中心，以利支援敌人驱兵所向的任何地方"，"不慎重地分割兵力，优势之军也可能成为劣势之军的牺牲品"。他坚持"不能分割部队，丧失对敌人兵力上的优势，而陷入与一切军事原则和'分必危'的切身经验相对立的分离状态"（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第23—24页）。但遗憾的是，在实战中，他从来没有集结起对敌人占有优势的军队，因此在实施阵地防御时总是为敌军所战败。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之后，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始转变为一场国际战争。美法结盟后，大批法国援军和物资抵达美国，使美军有可能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优势兵力，完成对英军的包围。1777年北方战场归于平静、战争转向南方后，华盛顿仍盯着纽约城的英军，试图寻找机会进行一场包围战。但最后这一机会却出现在南方战场的约克敦。在1781年的约克敦战役中，华盛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英军，并迫使其投降。

由此可见，华盛顿的防御战略是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归纳起来，它有三个特点：①以保卫13个殖民地不受侵犯为战略目标；②以阵地防御战为主，偶尔进行以袭击为主要样式的进攻作战；③集中优势兵力，力求包围敌人。很显然，这种防御战略带有明显的消极防御色彩，以及较深的传统和保守的烙印，这同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性质是很不协调的。

华盛顿之所以奉行这样一种防御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政治需要。大陆会议和各殖民地政府强烈要求进行自卫，抵御任何侵略。在此以前的殖民地时期，除印第安人和法国人曾对他们构成威胁外，13个殖民地一直不曾受到过任何外来的侵略。因此，当英军前来镇压或攻占某个城市时，殖民地就会强烈要求保卫领土，拒敌于国门之外。其二是革命军队力量弱小，难以发动大规模阵地进攻战。“因而，革命战争中的美军战略不能不是一项建立在弱势上的战略”（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第13页）。其三是战场形势的客观要求。战争爆发后，英军虽人数众多，但仍无法实施全线进攻，只能占据个别主要城市。由于英军无法控制广大的殖民地，殖民地就有土可守。

二、格林的游击战略

“萨拉托加”战役结束后，北方战场陷入僵持状态。英军针对南方亲英势力较大的特点，于1778年开始进行以占领南方为目标的战役。1780年8月坎登战役美军失败后，英军便占领和控制了整个南方。

华盛顿提议由纳撒尼尔·格林任南方战区司令，接替坎登战役中战败的霍雷肖·盖茨，大陆会议批准了这一提案。格林针对南方的特点，大胆创新，实施一项与华盛顿的防御战略迥然不同的“游击战略”。他收集南方“大陆军”残部，重整部队，同时兵分三路，由摩根率600人向西运动，由“轻骑哈里”李率280名骑兵和步兵向东与马里恩的游击队联合作战。在中路，格林亲自整训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三路相互配合，适时集中，在运动中

创造歼敌机会，最终把英国占领军引向约克敦的投降之路。

格林的“游击战略”有三个主要内容。其一，以消耗敌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格林始终抓住英军康沃利斯的部队，牵着他的鼻子，与之周旋。其二，不停地运动、游击。格林充分发挥内线作战和民兵的优势，快速机动，诱敌深入，转战合击，在运动中消耗、歼灭敌人。正如格林所说，“没有哪位将军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走动得如此频繁，如此起劲”，但是，“我注意不走得太远，通常速进速退”（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和政策史》第 48 页）。其三，对集中兵力的原则，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地分散兵力。面对康沃利斯的优势部队，格林将本来就不多的部队一分为三，迫使敌人也按照自己的方式运动，同时他依靠敌后游击队骚扰敌人。在考彭斯和吉尔福德县府两次战斗中，格林分别歼敌 1000 人和 500 人。这两次战斗虽未取得胜利，但却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将敌人调出了城市，使之陷入游击队的骚扰和缺少补给的困境之中，南方广大地区又重新落入美军之手。英军被迫龟缩在几个沿海城市。最后，华盛顿指挥的军队在法军的大力支援下，在约克敦包围了康沃利斯的军队并迫使其缴械投降。

格林之所以推行“游击战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格林任南方战区司令是临危受命的。当时南方领土相继沦陷，已无要地可守，只有广大的敌后可为游击队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要从敌人手中夺回失地，必须设法调出敌人，使其脱离自己的补给线，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第二，随着英军和“效忠派”的残酷镇压，各地纷纷涌现出爱国民兵游击队。在克林顿率部北上纽约后，留下康沃利斯统率的 8000 余人控制南方，势单力薄。这就为格林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三、进攻战略

1812 年 6 月 18 日爆发的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于英国侵犯美国的主权和尊严而引起的。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是一种进攻战略，正如田纳西州的民兵司令安德鲁·杰克逊所说，

"我们要进行战斗，以重振我们已在国内外遭到误解和诽谤的国民性，保护我们的海上公民……伸张我们的自由贸易权利……"（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470页）。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或唯一方式就是进攻英属加拿大，"要通过征服北美大陆一切英属殖民地来为我们过去所受的损害求得某种补偿，求得某种防止未来侵犯的保证"（同上第470页）。这种北征加拿大的战略并不是美国战前计划好的，而是临时制订的。对于这次战争，美国基本上是毫无准备的。在杰斐逊执政时期，美英关系已因英扣押美商船和强征海员而开始紧张，但他一味依靠商业抵制，禁止对外贸易。他不仅不作战争准备，反而裁减了海军军备。其后的麦迪逊总统虽对英宣了战，但由于国内在政治上出现了分裂而无法进行战争努力。反战的新英格兰对"麦迪逊先生的战争"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加以抵制，不仅拒绝提供资助和动员本州民兵，而且公然提出要退出合众国。因此，战争开始时美国并没有作好准备，更谈不上有一项明确的战略，只是听任战略本能的驱使，对英属加拿大进行连续不断的进攻。

在1814年8月以前，英国因陷入欧洲对拿破仑的战争，无力在北美发动大规模进攻，因而处于防御态势。与此相反，美国则主动出击，企图通过征服加拿大迫使英国屈从自己的要求。在这一阶段，美军共发动了7次北征加拿大的战役。但除第一、二次取得有限战果外，其余均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准备不充分，指挥不得力，民兵不服指挥。许多指挥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年过六旬的老兵，缺乏进取精神，例如指挥第一次北征的威廉·赫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几次战役中，派来增援的民兵竟拒绝越过尼亚加拉河进入加拿大。由于多次进攻而不克，美国遂于1814年7月放弃夺取加拿大的计划。同年8月，英国在打败拿破仑后得以向北美增援大批部队，并转入反攻。与前一阶段北征的失败相比，美国在几次防御战役中表现得十分出色，打退了英军的猖狂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美国在第二次独立战争中之所以采取这种进攻战略，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在没有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宣战的，其目的不是为了抗击侵略，而是为了发泄对英国人的仇恨和怒气，有一种报仇心理。因此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就自然成为美国进攻的主要目标。

四、战争期间的美军建设

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创立了双重军队的传统，即小规模的正规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早在殖民地时期，移民们就在新世界承袭了英国的民兵制度。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民兵制有三个特点。1、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原则。殖民地法律普遍规定，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健康男性公民须自动加入民兵组织，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必须参加定期阅兵或军事训练。2、武器装备实行个人装备与公共资助相结合。民兵必须自备和保养武器，民兵军官、阅兵首长或其他指定的官员负责武器检查。3、文官政府控制军队。民兵部队的权威来自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和文官政府。文官政府对民兵的权威通过立法控制来体现。随着边疆的扩展和殖民地社会的发展，普通民兵制逐渐衰落，志愿民兵应运而生。志愿民兵是独立的军事组织，他们有自己的制服、装备、组织和团体精神。

独立战争使民兵制获得新生。各殖民地议会纷纷通过加强训练、整顿纪律、严格制度、储备物资等手段加强民兵力量建设，以保卫殖民地不受侵犯。民兵力量的活动方式主要有自发运动，参加游击队，自愿参加大陆军，应殖民地议会或州长的征召组成远征队听候华盛顿指挥，等等。大陆军的前身就是新英格兰的几个民兵连。尽管民兵的成分良莠不齐，但作为基本的群众性武装力量，它不失为独立战争的依托。

鉴于民兵是各殖民地独立的地方武装，纪律性差，难以进行统一的指挥管理，大陆会议于 1775 年 6 月 14 日决定建立各殖民地的联合武装力量——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大陆军是一支小型正规军，同英军相比，无论在正规化程度上，还

是在数量上都是微不足道的。1776 年夏，大陆军的人数第一次达到 18000 人的高峰，而英军此时已有一支 35000 人的陆军和一支强大的舰队。大陆军尽管从未直接在阵地战中取胜过，但却是独立战争的中坚力量。作为一名统帅，华盛顿十分重视军队建设。他认为，独立战争的首要目标在于建设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革命事业的财产莫过于军队"。华盛顿热心于大陆军骨干力量的发展，作为加强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措施，他很注意在战斗的间隙整训部队，例如，在费城保卫战之后，即 1777 年的冬季，大陆军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福吉谷冬季整训。大陆军针对军心涣散和供应困难等问题进行整顿，提高了战斗力。1778 年 2 月，原普鲁士上尉斯图本还引进了一项新的训练制度，强调实用的标准化，受到士兵的热烈欢迎。

当时由于英国海军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海军十分弱小。它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华盛顿率军围攻波士顿时创立的一支私人船队，用于捕获英军的补给船只。二是多数州组建州属舰队，主要用于海岸防御。三是私掠武装船只，实际上是特许的海盗，有极大吸引力。战争结束前，在大陆会议、州政府、海外的外交官等各处的委员会统辖下的私掠船达 2 千艘，使英国商船受到巨大损失。四是大陆海军，它于 1775 年 10 月 30 日正式成立。由于缺乏经验和训练有素的船员，又受英海军打击，大陆海军发展十分缓慢。到 1780 年只有 100 艘舰船在编，其中除 5 艘战舰外，大部分都是小船，海上斗争实际上完全依赖于武装私掠船和法国海军。

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大陆会议虽是领帅机关，但不是正式的中央政权，缺乏顺利实施战争所必需的法律权力。大陆会议最初委任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军队提出的问题。1776 年 6 月，它又成立了一个 5 人战争和军械委员会，但成员多为兼职，且更换频繁。因此，1777 年 10 月，大陆会议重新设了一个包括军人参加的委员会，并设立了几个后勤参谋部门，如仓储部、供应部和军需部。1775 年 10 月 30 日大陆海军建立后，大陆

会议又成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但总的来说，战争期间的军队管理机构效率低下。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提出了新的建军方针：小型海军和正规陆军与组织完善而统一的民兵相结合，建立军事工业、军火库和军事院校。1788 年正式生效的联邦宪法确保了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军队制度。正规陆军人数很少，从未超过 5000 人。民兵受国会和州政府的双重领导。1794 年，国会批准组建了由 4 艘军舰组成的海军。杰斐逊执政时期，奉行缩减军备的政策。因此，到 1812 年战争爆发时，陆军仅有 6700 人，海军只有 16 艘舰艇（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 101 页）。

1789 年 8 月，国会批准设立陆军部，9 月，诺克斯被任命为陆军部长。1798 年 4 月，国会批准建立海军部，并任命斯托德特为第一任海军部长。这两个部的指挥机构并不健全，陆军部需要有权管理民兵，但国会不同意授权。海军部领导下的海军舰队数量少，在单舰作战取得辉煌战绩之后，国会曾于 1813 年批准建造 16 艘大型战舰、快速舰和单桅海军炮舰。但由于英海军改变战术，变单舰活动为舰队行动，并加紧封锁美国海岸，美海军基本上被困在港内。海军取得的局部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也很小。然而，新建的内湖舰队进行的几次战役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五、简短的评论

1、独立战争时期是美国军事战略的起步时期。在战争初期，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战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在军事政策与军队体制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的。但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却进行了多种途径的探索，既有华盛顿效法英军和欧洲军事原则而对防御战略的探求，又有格林对传统的进攻战略和歼灭战略的继承和发扬，从而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游击战略”（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 49 页）。这种战略启蒙状态是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所具有的明显特点。

2、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尚不成熟，但仍取得了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主要是由于几种战略相互配合的结果。那种保全领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略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格林的游击战略夺回了南方战场的主动权，把康沃利斯的英国占领军逼上了投降之路。然而，这两种战略都不具有单独确保胜利的效能，只有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才能将独立战争推向胜利。华盛顿孜孜以求的包围、全歼英军的夙愿，只有格林运用“游击战略”才得以实现，而格林创造出的约克敦歼敌战机，只有华盛顿运用防御战略才能加以利用。正是这两种战略的结合取得了约克敦的决定性胜利，才得以赢得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外，美国的这两次独立战争都不是单纯的美英之战，因此外交斗争和国际军事力量的组合对美国取得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第二次独立战争与第一次独立战争的战略不同。第一次独立战争中美军在英军侵略面前谋求奉行多样化的防御战略，第二次独立战争则是美军以进攻为主线，趁英军深陷欧战之时，主动进军加拿大。进攻加拿大虽是美国人长期形成的本能意识，但在第一次独立战争中表现为能进能退，服从战略全局；而在第二次独立战争中则表现为扩张欲望驱使下的进攻战，屡败屡战。两种不同的战略来源于两次战争性质上的差异：第一次独立战争是正义的革命战争，而第二次独立战争虽然是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继续，但却含有扩张主义的因素。

4、两次独立战争使美国军事战略的弊端暴露得一览无遗。但这种情况却促使美国人痛定思痛。第二次独立战争结束后，他们对以前的军事战略进行了扬弃，有的得到了继承与发扬，有的遭到抛弃。此后，美国军事战略便走上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道路。

第三章　美墨战争时期的有限战争战略

美墨战争是美国对弱小邻国墨西哥进行的侵略战争，是美国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第一次领土扩张战争。经过这次战争，美国打通了通向太平洋的大陆通道，并为美国的版图增加了 119．3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一、美国的有限战争战略

美国 13 个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周围仍遍布着各种潜在的敌人。为了保证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国家当局便努力寻求扩大疆界，以求获得天然屏障。

美国的领土扩张同移民的涌入和西进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815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约有 3000 万人从欧洲移居美国。在生存和发财欲望的驱动下，美国的移民占领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大批地深入到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境内。到 1834 年，已有 2 万白人和 2000 奴隶移居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境内，比当地的墨西哥人多 3 倍。到 1840 年，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省的美国移民在人数上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这些移民对墨西哥的管辖桀骜不驯，不愿遵守它的宗教、教育和司法等方面的政策。1836 年，得克萨斯移民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他们在一次短期战争中确保了独立地位。1845 年，得克萨斯共和国请求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于是，它便成为美国第 28 个州。正是移民的渗入和美国的扩张政策，使美墨战争成为必然。

美墨战争的直接起因在于美国和墨西哥都把努埃塞斯河与格兰德河之间的土地宣布为己有。美国总统坚持对那片领土拥有主

权，并要求墨西哥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卖给美国。这一要求被墨西哥拒绝。当美国部队挺进格兰德河畔时，战争便打响了。

美国在此次战争中的目的不是征服墨西哥共和国，而是企图运用武力强迫墨西哥割让土地，以扩大美国的版图。美国总统波尔克露骨地说，“很明显，当国会准备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想取得领土补偿”，又说：“众所周知，墨西哥为了赔偿我们的公民的正义和长期被拖延的损失，并赔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耗费，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割让部分领土给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1789～1962 年》，第 4 卷第 532 页）因此，由美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限目标的战争。为了适应这一战略目标的需要，美国提出了一项有限战争战略。具体地说，就是迅速占领墨西哥的部分领土，必要时，直接攻占首都墨西哥城，尔后通过谈判，迫使墨西哥签订割地条约。这种有限战争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1、战争手段有节制。由于有限战争战略不要求全歼敌人，因此，在战争手段上应有所节制，战争的强度应与目标相称。在战争之初，各线指挥官曾接到明确指令，尽量减少伤亡，保护和平居民，保护敌国的文化、宗教和建筑，用行动证明美国进行的不是一场旨在征服墨西哥的战争，不是一场反对他们的宗教和教会的战争。各线指挥官不仅禁止破坏行为，而且对于在敌国境内得到的补给一律支付现金，不搞强制征用。由于战争方式上的节制和宽容，美军深入墨西哥领土后很少受到墨民众的袭击。

2、强调进攻。美墨战争是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进攻型战争，进攻和夺取胜利成为美军作战的主要样式和目标。美军统帅，不论是泰勒，还是斯科特，都致力于进攻作战。由于在敌国作战的特殊环境，要想达到目标就必须不断进攻，攻取敌人的阵地，占领敌人的领土。这种进攻战此后成为美军的主要作战样式，并且开创了在境外作战的先例。

3、逐渐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也就是说，不以在一两次会战中消灭敌军作为自己的战役目标。美国远征墨西哥的兵力从

来没有超过 12000 人，而要全歼敌军势必需要更多的部队，因而美军在五次重大的战役中，从不追求“全面胜利”，只求逐渐消耗敌军，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美军十分明白，前进道路上的任何恶战和耽搁，都会影响他们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耽误时间愈长，夺取墨西哥城的希望就愈小。

4、运用谋略。美军总是力求以谋略取胜，从不死打、硬拼。在韦腊克鲁斯、塞罗戈尔多等战役中，美军一再实施侧击和包围的战术，将敌人从一个个阵地上赶走。这种战法符合节约兵力的军事原则。

5、战和相济。只要有和平的希望，美国从不放弃。在康特雷拉斯和丘鲁武斯科大捷的当天，敌人狼狈逃窜，美军本可以乘胜追击从而长驱直入墨西哥城，但却停止了前进，默认停火，希望能与墨政府缔结城下之盟。由此可见，在美军心中，政治和军事、战争与和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美军战前的建设

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美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依据战争的经验教训，美国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

1、确立了“大陆防御体系”。1815 年初，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种“三位一体”式的国防体系，即有一支海军保护商业，一系列堡垒工事保卫海岸线，一支名副其实的正规陆军和整编过的民兵守卫边疆，抵御侵略。虽然国会不愿触动民兵组织，但对其他要求则全部满足，从而使美国了确立了和平时期的常备防御体系。

1815 年 3 月，国会批准建立了一支 12000 人的正规陆军，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常备陆军。尽管由于 1819 年的经济衰退，国会在 1812 年 3 月将陆军裁减到 6183 人，但此后，随着国家资源的增长和对外扩张的需要，陆军人数不断增加。

1816 年，美国第一次制定了和平时期海军建设的长期规划，决定 8 年内每年拨款 100 万美元建造 9 艘装有 74 门炮的大型舰

只、12艘配有44门炮的护卫舰和3艘海岸防卫蒸汽炮船。在1816～1833年的17年中，国会共拨款1100多万美元建设海军。两次防御战争的经历促使美国人修筑一系列的海岸防御工事。麦迪逊总统上台后，指定了一个工程委员会来负责这一事务，该委员会在1812年和1817年提出两份报告。1812年的报告提出要修建50个要塞，到1850年又提议增设150个。大陆防御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安全事务在新的条件下日益受到人们的注意。

2、改革了军队的管理和指挥机构。第二次独立战争暴露出美军在备战方面的严重缺陷，既没有统一的后勤管理体制，也没有统一的指挥体制。1813年，国会力图通过法令成立总参谋部来整顿这一混乱局面，当时的总参谋部仅是陆军的一个后勤管理机构，由几个独立的局组成，局长对陆军部长负责。国会分别于1816和1818年颁布法令，扩大了总参谋部，确保了它的持久性。

在第二次独立战争中，作战指挥几乎同后勤支援一样糟糕，当时的陆军部把陆军划分为若干战区部，各由一位指挥官独立指挥，仅仅通过陆军部长进行协调。1821年，国会对高级军官进行了裁减，只保留一名少将和两名准将，陆军部长卡尔霍恩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建立了集中的指挥机构。他命令唯的一名少将雅各布·布朗前往华盛顿，并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这样，陆军部长就可从总参谋部获得技术方面的建议，并通过总司令来指挥军队。

海军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始于1815年，当时成立了海军专员委员会，协助海军部长管理海军舰队。但是，由于该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不利于个人责任感的发挥，加上它极端保守，对海军方面的技术革新与发明常持反对态度，国会便于1842年取消了这一机构，代之以五局制的管理体制：船厂船坞局，船建、装备和维修局，医药卫生局，补给服装局和军械水文局。海军从此向管理的正规化、专业化迈出了第一步。

3、军事技术革命使美军的火力和机动力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改变了美军所进行的传统战争样式。1789年，约翰·菲奇成功地

制造了第一艘蒸汽机船，到1830年，美国已有成百艘蒸汽船来往于内河水域。由于不受潮汐和风浪的影响，蒸汽机船在作战和军队运输上拥有很大的优越性。火车的优点同样明显，它不受干旱和严冬的影响。1826年，一些纽约人组成了第一家铁路公司。到1860年，美国境内已有30000英里的铁路线。轮船和火车的发展使军队的远距离作战、大规模战役成为可能。此外，1844年5月，塞缪尔·莫尔斯电报机的发明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使得指挥、控制和通信得以紧密结合起来。在火力方面，一系列新的发明使步兵武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预示着战争的破坏性将空前加剧。1862年，理查德·加特林造出了第一挺机关枪。火力上的变化孕育了战役、战术形式上的变革，加上机动性的提高，一起推动了战争向总体战方向迈进。

4、进一步加强军事院校的建设。美军职业化建设开始于西点军校的设立。华盛顿早在成立联邦政府之前就提出《关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意见》，主张建立正规军和军事院校，但国会在1802年3月16日才通过在纽约郊外西点建立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俗称"西点军校"）的法案，7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它仅是一所军事工程学校和技术学校，而且还面临被取缔的厄运。1817年6月，当詹姆斯·门罗总统任命西尔韦纳斯·塞耶上尉为校长时，西点军校才获得新生。尽管第二次独立战争表明开展战略研究十分必要，但美军最缺乏的还是基层军官，西点军校必须把大量精力放在最基本的作战入门上。因此，西点军校的课程除少量军事史和战争理论外，大都是工程学和战术方面的内容。此外，在和平时期和没有外敌即刻入侵的威胁条件下，要想赢得军官和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就必须培养出对国家建设极其有用的人才，因此西点军校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所民用工程学校。1824年，陆军部长卡尔霍恩在门罗堡建立了陆军第一所研究院校——炮兵实习学校。但1835年炮兵实习学校被关闭，步兵实习学校也名存实亡。只是到了内战以后，长期的军官研究制度才发展起来。

1815年12月，威廉·班布里奇海军准将在马萨诸塞的查尔斯顿海军基地建立了海军第一所训练学校。1845年美墨战争前夕，曾临时担任陆军部长的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将属于陆军的安纳波利斯塞文堡划归海军，并开始将海军士官生转到安纳波利斯，办起了海军学校，为海军培养专门的军官人才。1850年，它正式定名为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军事院校的建立不仅使军官树立了专业意识，还使他们成为军队专业化进程的推动者，军官队伍中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比例在1817年还不到15%，到1860年就上升到76%。这一代军官不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了国家的建设，而且确保了美墨战争中美军的战斗力。这一代军官几乎都在这次战争中崭露头角，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南北战争中的杰出将领。

三、简短的评论

1、美墨战争是美国进行的以夺取领土为战略目标的一次有限战争，是其大陆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有限战争的固有特性决定了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必须采取有限战争战略。此外，美国首次深入敌国作战，也给美国的军事战略提出了许多要求，如保护敌国的公民、文化和宗教，禁止战争扩大化，尽量降低战斗的残酷性，等等。只有做好了这一切，才能实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政治目的，即迫使敌人签订割地条约。美军认识到，任何违背有限战争原则的行为，都有可能激起墨西哥国民的反抗，从而把一场以夺取部分领土为目的的战争变成一场民族之间的生死存亡的决战，这就会妨碍战争目标的实现。

2、作为一场有限战争，美墨战争同欧洲的“有限战争”有许多相同之处，如目标的有限性，手段有节制等等。但是，美墨战争又同欧洲的“有限战争”有所不同，美国的有限战争有它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强调进攻。美墨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是进攻作战，这正是美国的战略传统。

3、虽然美墨战争是美国首次进行的有限战争，但美国却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主要得力于它有一大批优秀的军官，从而确保了军事战略得以贯彻实施。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有：格兰特中尉、谢尔曼中尉、米德中尉、胡克中尉、麦克莱伦中尉、托马斯中尉、李中尉，他们都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才能。这些杰出的初级军官在后来的美国内战中都成了南北双方的主要将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勒将军和斯科特将军，前者是美军在美墨战争第一阶段的主要指挥官，后者指挥了著名的墨西哥城远征战役。当时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曾预言：斯科特“输定了，……他既攻不下这座城市，也无法返回基地”。但当他后来得知斯科特获胜的消息时，他称颂斯科特为“活着的最伟大的军人”。

4、美国在美墨战争前建立了“大陆防御体系”，改革了军队的管理和指挥机构，扩充了常备陆军与海军，并且加强了军事院校的建设，这一切对美国赢得此次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四章　美国内战时期的多样化军事战略

美国内战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北部诸州与发动叛乱的南部蓄奴州之间的战争。南部为维护和扩大种植园奴隶制而挑起战争，北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废除奴隶制而进行战争。1861 年 4 月 12 日，由脱离联邦的各蓄奴州所组成的南部邦联（也称南部同盟）向联邦控制的萨姆特要塞进行炮击，宣告了美国内战（亦称南北战争）的开始。经过 4 年的生死较量，南部军队于 1865 年 4 月 9 日投降，战争正式结束。战争的结局不仅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而且实现了美国南北部的统一，为尔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北军的有限战争战略与总体战战略

与南部同盟相比，联邦占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北部人口为 2200 万，南部仅 600 万，南北面积之比为 3∶1，北部有工厂 11 万个，南部仅 1.8 万个。全国生产总值的 75%、工业产量的 90% 集中在北部。但是，如何运用上述强大的实力去统一联邦，对北方来说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就军事战略而言，北方经过了一个由有限战争战略向总体战战略演变的过程。

战争开始时，联邦陆军总司令斯科特制定了一项“蟒蛇计划”。他打算利用海军封锁切断南方与欧洲的联系，并沿密西西比河实行突破，将邦联的东半部孤立起来，尔后对东部地区实行海陆进攻。这就象南美巨蛇扼杀猎物那样慢慢收缩对南部的包围圈，最终收复南方。按照斯科特的这一计划，联邦要征服邦联，至少需要 30 万大军、一位有杰出才干的将军和 2～3 年的时间。但是，

这一计划同林肯政府以及广大民众急于战胜南方的要求不相符合。林肯政府认为，只要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迅猛突入南部，即可在短期内打败南方，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在战争前期，林肯政府坚持“按宪法方式”进行一场“有限战争”。林肯认为，恢复联邦统一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单纯进行军事征服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对南方使用有限度的武力，以求迫使南方自愿地向联邦屈服。他感到，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可能孕育出更多的仇恨，这样，联邦的真正统一也就可能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他不希望在击败南军后又陷入一场游击战。他说：“在考虑镇压叛乱应采取什么方针的时候，我一直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务使为达到平乱目的而进行的这一番必不可少的冲突不致堕落为一场激烈无情的革命斗争”（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60页）。林肯从战争一开始就宣布他是不得已才开战的，他将以尽可能人道、和解的方式进行战争。在1861年4月15日发布的要求部队镇压叛乱的宣言中，他保证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不从事不必要的惩罚与毁灭。他说：“我认为……将士们的首要任务很可能是收复从联邦夺走的堡垒、城镇与财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保持极度的谨慎，在始终不违背上述目标的同时，避免任何糟塌、毁灭、干预财产或骚扰国内各地和平平民的做法。”（同上，第161页）“我从来不希望触及他们的社会基础或他们的任何权利”（同上，第166页）。

由于严格执行这种有限战争战略，联邦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果。一方面，联邦陆军总司令、波托马克军团司令麦克莱伦严格执行林肯总统制订的“为保护联邦、维护宪法和法律而战”的政策，坚持“用计谋而不是用战斗去取得胜利”，希望通过攻占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而一举迫其屈服。但结果却一无所成。另一方面，由于线膛武器大大有利于防御一方，几乎每次试图达成决战歼敌的努力都变成了两败俱伤的消耗战。尽管连换两任总司令（麦克莱伦和哈勒克），但在作为主要战场的东部

战区，南北两军经过一年多的激战，战事毫无进展，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林肯的温和、和解的有限战争战略未能实现联邦的统一，加上连绵战事所带来的痛苦，迫使许多共和党领导人重新考虑对南方的战略，并要求林肯对南方实行更加严厉的惩罚。当初林肯曾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865页）。但奴隶制是这场战争的根源，不触动奴隶制是不可能恢复联邦的。1862年“七日战役”过后，英法两国开始酝酿支持或承认南方，林肯这才定下决心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行战争。他说，“如果我无须解放任何一个奴隶便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必须解放所有的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又说，“这个时刻来到了。它使我感到奴隶制必须死亡，国家才能生存”（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867页）。9月22日，即胜负难分的安提坦战役以后的第五天，林肯发布了《解放宣言》，宣布自1863年1月1日起解放所有的奴隶。马克思称赞《解放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从“以宪法方式进行战争”到“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转变。实际上，它正式宣布了对奴隶制开战，由有限战争战略转向总体战战略。

1864年3月，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陆军总司令。他的晋升标志着联邦军事战略转变的完成。新的军事战略是一项总体战战略，其主要目标是消灭敌主力军团，破坏敌人的战争资源和打垮敌人的士气。主要战略手段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在战场上打击邦联军队，尔后深入敌人后方，进行一场摧毁敌人社会基础的歼灭战争。

为最终打败南部同盟，格兰特认为有必要消灭两支主要的南部军队，即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和约翰斯顿的田纳西军团。他对部将米德说：“李的军队将是你的目标点。李跑到什么地方，你也要跑到什么地方。”他还指示另一位部将谢里登：“敌军不亡，我

军追逐不止。敌军撤向何处，我军也跟向何处。”（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73～174页）他要求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打击南军主力，直至他们丧失战斗力。尽管格兰特的战略目标是歼灭敌军主力，但他并不寄希望于一次决战取胜，因为线膛武器的运用，使攻防双方的伤亡大大增加，拿破仑时代那种一次决战全歼敌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格兰特要求北军紧紧抓住南军，天天打，不停地打。为此，北军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1864年5～6月的维尔德尼斯—彼得斯堡战役，格兰特亲率波托马克军团，死死抓住李的北弗吉尼亚军团，连续发动进攻，付出了可怕的伤亡代价：联邦军死伤8.4万人，南部同盟军也死伤了3万人。正是在这一战役中，格兰特赢得了“苦干的屠夫”的绰号。这一战役对于北军来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它迫使南军第一大主力军团陷入被动地位，被牢牢地控制在联邦军的掌握之中，同时为北军深入敌人后方开辟了道路。此后，林肯总统又鼓励格兰特“一鼓作气，穷追不舍，力求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人”（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225页）。

除要求不停顿地打击敌主力军团外，格兰特要求打击南部同盟的士气民心。他“认定只有依靠完全征服才能拯救联邦”。他“把那些能为南军力量所及的军需品看作是与武器或军火一样的违禁品，把它们毁掉不必流血却能与消灭敌军产生同样的效果”（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78页）。为此，他给谢里登下达指示说：“如果战争还要延续一年的话，我们就需要谢南多亚河谷继续成为颗粒不收的荒原。”谢里登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烧死了2000多头家畜，屠宰并向部队发放了3000多头羊”。格兰特还指示谢尔曼在攻占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城后把这个铁路枢纽和军需生产城市彻底毁掉（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79～180页）。

谢尔曼是打击敌人士气民心的高手。发展了总体战战略，把摧毁敌方经济资源同心理攻击结合起来；把恐惧当作工具，把敌

方人民包括在内，主张用战争暴力摧毁敌方居民的战斗意志，使其无法继续进行战争。他说："我们不仅是在和敌对军队作战，而且是在和敌对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老幼，无论贫富都感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战争就是战争，不是讨人欢心。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必须停止战争。"（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82页）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必要的话，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卡尔·桑德堡著《林肯传》第341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谢尔曼率领6万大军，放弃固定的补给线，从亚特兰大出发，就地筹措补给，摧毁了铁路、工厂、农场等敌人可以使用的一切资源。他首先攻占萨凡纳，尔后北上穿越南、北卡罗莱纳，直插李军团的后方。谢尔曼率军远征700多公里，沿途进行了大量破坏和恐怖活动，极大地打击了南部同盟的士气民心。

格兰特奉行的全歼战略在1865年初结出了硕果。南部同盟的田纳西军团在1864年年底被消灭。李军团被包围在彼得斯堡，军队士气低落。4月，李将军被迫撤退，在格兰特大军的追击和包围面前，终于在4月9日向格兰特投降。当时他手下的士兵只剩下不足8000人。

二、南军的攻势防御战略与机动防御战略

南部邦联的战争目标是迫使北方承认自己的独立，争取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承认。虽然它主动发动了战争，但它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战略困境。南方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不仅在总体实力上同北方相差悬殊，而且它严重依赖北方的工业和技术，战争潜力有限，承受不了长期战争的消耗。

南部邦联在总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领土和赢得独立呢？在这个问题上，南军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观，一种是以李将军为代表的攻势防御战略，另一个是以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为代表的机动防御战略。而作为邦联总统和最

高统帅的戴维斯却在这两种战略主张之间犹豫不决，致使南军的东西两战区各自为战，终被各个消灭。

李将军认为，在综合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单纯防御的战略能够保卫邦联的独立，唯一能拯救邦联的办法就是把不多的兵力集中起来，在自己选定的方向上向北方发动进攻，夺取主动权，争取时间，消磨北方进行战争的决心和耐力。他说，“敌军可能被极其迅速地投入到任何一个地点上的战斗中去，人数上远远超过我们能从战场上调来与其作战的任何一支军队”；“只有把我们的部队集中起来，我们才有希望赢得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我们必须在因为不行动而肯定遭到损失和因为采取行动而承担风险之间作出抉择”（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125页）。李的攻势防御战略要求集中力量进行歼灭战，要求把战争打到北方境内实施攻势防御。在战争初期，李将军只是戴维斯总统的一名军事顾问，并不掌握指挥权，因而在战争的头一年里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1862年5月，李接替约翰斯顿任东部战区司令。此后，他在东部战区按照自己的上述战略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役，而且三次攻入北方境内，并取得重大的胜利。然而，西部战区的两个主要指挥官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却坚持机动防御战略，他们不主张主动进攻。他们认为，南军是内线作战，可凭借坚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坚守战略要地，并依托铁路线进行机动防御。只要能保存实力，把战争拖下去，北方的耐力就能被拖垮。戴维斯总统倾向于这种防御战略，但在指挥体系上却无法将东西两个战区协调起来。他把整个南部划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战区，而不强求各个战区进行跨战区的协同，只要求他们进行一般的协商。这样，在北方多线进攻之下，西、东两个战区主力便遭各个歼灭。

三、战争期间的军队建设

美国内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首次“现代战争”，参战兵力近300万人，仅伤亡一项就达109.5万之众。这一战争特点对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军通过这次战争也获得了较

大的发展。

1、人力动员。美国在人力动员上的特点是以志愿兵为主，并首次实行征兵法。1861年7月4日，联邦议会批准招募50万名服役期3年的志愿兵。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中伤亡人数甚多，双方不得不加紧进行人力动员。联邦议会再次批准征召50万志愿兵，使得2个月之内正式批准征召的志愿兵总数达到100万人。南方也征召了40万志愿兵。1862年4月16日，南部同盟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征兵法，规定所有18～35岁的白人男子都要服3年兵役。联邦国会也以宪法为依据通过了“征兵法”，又称“注册登记法”。为实施征兵法，联邦建立了一套管理和动员体制。陆军部新设宪兵总署，作为人力动员的最高机关；基层设有185个征兵小组，每小组负责一个国会议员选区；各小组又将自己的区划分成若干小区，每小区指定一名征兵军官负责。征兵法的目的是用强制手段促使人们当志愿兵，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为此国家和州都采取提高津贴的办法吸引志愿兵。尽管如此，征兵法的颁布和实施仍标志着美国人力动员政策的重大变化：根据征兵法的规定，公民服兵役是对联邦政府尽义务，而不是对各州尽义务；动员的基础由自愿人伍转为强制性服役。

2、动员得到解放的黑人入伍。内战的根源是奴隶制的存在。以武力保卫联邦必然要触动解放黑奴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南部邦联境内有350万奴隶，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862年9月24日，林肯发布了《解放宣言》(1863年1月1日生效)，把“为联邦而战”的口号改变为“为自由而战”。此后，黑人大批人伍，为联邦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加强后勤管理，增加军火生产。战争的极大需求和陆军的大规模扩军给后勤供应和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起初，北方的后勤体制无法适应这一变化，政府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如让各州供应各州的士兵。因此，联邦、州、地方的采购代理商在国内外为各自的利益激烈竞争，而且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的现象时有发生。

1862 年开始，联邦加强了后勤方面的领导，使效率低下的后勤机构很快便变成一个权力集中、组织良好的后勤系统。国会设立了调查委员会揭露腐化行为，通过立法规定供应合同的签定手续。临时的后勤体制停止工作，把后勤动员的管理权归还给陆军部，并使陆军部的后勤部门迅速扩大。陆军部长斯坦顿还建立了一个由陆军部各局局长组成的战争委员会，协调后勤工作。

工业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火生产。战争开始时，北方主要从欧洲市场采购军火，在 15 个月内购买了 73．8 万件火器。为增大、发展本国的军火工业，政府在增加国营军火工厂生产的同时，以优厚价格与私营军火工厂签订合同，刺激生产。1860 年，北方的私营和国营军火工业产量还不到 5 万件火器，但很快就提高到 250 万件。1862 年以后，北方的军火生产已自给有余，不必再向外国购买了。

南方在后勤管理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这除了受经济结构、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外，政府领导软弱是根本原因。比如，戴维斯总统始终没有对有限的后勤供应力量实施集中领导，过分强调各州的权力。

4、健全指挥与管理体系。南北战争中，联邦陆军的指挥体系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做法，由陆军总司令指挥陆军作战。由于战争初期林肯政府政治上的消极和在整个战争指导上的混乱，美国陆军的指挥体系曾一度中断。1862 年 3 月 11 日，由于不满麦克莱伦消极的用兵方针，林肯撤消了他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直到 7 月 23 日才任命哈勒克为总司令。在这 4 个月期间，陆军实际上是由林肯和陆军部长斯坦顿亲自指挥的。1864 年 3 月，格兰特被提升为中将同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作为总司令，格兰特并没有在华盛顿设立自己的总部，而是亲自率领波托马克军团同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作战。为便于林肯与格兰特之间以及总司令与各战区指挥官之间的联系，陆军部设立了参谋长一职，由哈勒克担任。战后参谋长一职被取消，又恢复到陆军部长—陆军总司令这

一指挥体系。直到1903年鲁特改革后，陆军的指挥体系才发生根本变化。

联邦军在内战期间建立了战区体制。从东到西设有两个主要战区，阿帕拉契亚山以东到大西洋沿岸为东部战区。由于这一战区内集中了南北双方的政治中心，并且距离很近，因此这一战区一般由总司令亲自指挥。从阿帕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为西部战区，其中又数田纳西中、东部和密西西比河最为重要，分设两个小战区（军分区）。每战区一般由一名少将指挥。在陆军总司令空缺的一段时间内，林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曾增设过一个山地战区，包括弗吉尼亚西部和田纳西东部山区。

战争期间，联邦海军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健全了海军管理体系，建造蒸汽动力铁甲舰。内战爆发时，蒸汽动力船已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为尽快利用技术革新成果，联邦国会于1862年7月批准，把海军部原有的5个局扩建为8个局，增加了蒸汽机工程局。同时，海军部长韦尔斯制定了扩大海军的计划，着力建造蒸汽动力战舰。在战争期间，联邦海军共建造了236艘新型战舰。海军部长韦尔斯还指定了一个装甲舰委员会，专门研究装甲舰的建设问题。1862年3月，邦联率先造出第一艘铁甲舰——“弗吉尼亚”号。紧接着，联邦海军也造出了更为先进的铁甲舰——装有旋转炮塔的“监视”号。3月9日，“弗吉尼亚”号和“监视”号在汉普顿锚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场装甲舰海战。到内战结束时，联邦海军已有70艘铁甲战舰。从此，美国海军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四、简短的评论

1、联邦陆军总司令斯科特制订的“蟒蛇计划”虽然因不符合林肯政府的速战速决方针而遭拒绝，但该计划却不乏合理因素。这一点就连林肯政府也是承认的。特别是斯科特要求对南方进行海上封锁并沿密西西比河实施突破的方针，都为林肯政府所采纳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2、林肯政府在战争初期提出的“有限战争战略”是一种“以

宪法方式进行战争”的战略。这种战略不敢以“彻底摧毁奴隶制”为目标，行动上不敢实施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只是寄希望于“用计谋而不是用战斗去取得胜利”。这种战略就不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以致最终使战争陷入毫无战果的僵局。

3、新任联邦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在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后，适应“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历史潮流，提出以彻底歼灭敌人主力军团为目的的“总体战战略”，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最终实现了美国南北方的统一。

4、南军方面李将军提出的“攻势防御战略”要求把为数不多的兵力集中起来，在自己选定的方向上向北方发动进攻，争取主动。应该说，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攻势防御战略是正确的，而且李将军在执行这一战略中确实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但由于李将军毕竟兵力单薄，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无力扩张战果。另一方面，李将军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不能从全局的高度处理战略问题，他拒绝对西部战区提供增援，以致造成最后整个南方的失败。

5、南军西部战区两个主要指挥官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提出的机动防御战略，不提倡主动进攻，而寄期望于保存实力，拖垮敌人。这种战略实质上是一种消极防御战略。西部战区的南军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屡遭分割、包围以至机动防御失去机动的空间而陷于失败。

第五章　美西战争时期的外围战略

19 世纪末期，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美国开始走上向海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这时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美国选择了当时已处于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中的西班牙这个老牌殖民帝国，作为初试锋芒的对象。1898 年 4 月，美国挑起了历时 3 个月的美西战争，其直接目标是夺取西班牙的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结果，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等地。从此，美国的势力便伸进了太平洋地区。

一、一项酝酿已久的军事战略

美、西战争是美国从独立战争以来准备最充分、持续时间最短的一次战争，因而预有准备是美国在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19 世纪末期，西班牙这个殖民帝国已走向衰落，它的海外殖民地古巴、菲律宾等相继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使远在欧洲的西班牙深感鞭长莫及，难以应付。而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势力却逐步渗入古巴等地。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着手制定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在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卢斯的倡议下，美海军重点研究了与西班牙作战的战略问题。1896 年，一位名叫威廉·金布尔的海军军官提出了《与西班牙的战争》的战略报告。报告提出：美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目的是消灭当地西班牙驻军。只有在对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进行的攻击不能奏效或达不成战争目的时，美海军才需要将战争引向西班牙本土——伊

比利亚半岛。该报告设想，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

战争开始后，麦金莱政府基本上是按照上述战略思想来指导战争的。由于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占西班牙帝国几处岌岌可危的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也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军事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

二、“外围战略”的主要内容

这一战略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依靠海军发挥决定性作用，歼灭战决胜和实施联合作战。

1、依靠海军发挥决定性作用

海军的决定性作用是由两个特殊条件决定的。首先，西班牙帝国严重依赖海洋。为镇压古巴和菲律宾的民族起义，西班牙全靠它的几支舰队提供运输和补给。如果舰队覆灭或失去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古巴、菲律宾等殖民地的西班牙守军势必陷入孤立、被动，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因此，舰队和海洋是西班牙帝国的战略支柱和生命线。生命线一旦被切断，西班牙就会不战而降。美西战争开始时，西班牙有15万正规军驻在国内，15万正规军远征古巴，2万正规军驻菲律宾，8000正规军驻波多黎各。但是，在马尼拉海战和圣地亚哥海战中西班牙的两支舰队全军覆没后，西班牙便提出求和，满足了美国的全部要求，于8月13日宣布停战。而此时，争夺马尼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地面战斗还在进行，西班牙在这些地区的守备部队基本上都未受到大的损失。其次，美国当时已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经19世纪80年代的大力建设，一些大型战舰装备部队。它们的火力、装甲等性能都优于西班牙舰队。对美国来讲，派海军作战十分方便。太平洋分舰队和大西洋分舰队早已处于待命状态。杜威的太平洋分舰队驻在香港，距菲律宾只有几天航程，接到命令后很快就可投入战争。大

西洋分舰队同古巴更是一水之隔，加勒比海形同美国的内湖。派陆军到海外作战远不如派海军那么方便，不仅容易引起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还面临动员、运输、补给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主要依靠海军作战，就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战争的实践证明，美国在对西班牙作战中，主要依靠海军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杜威的太平洋分舰队5月1日驶入马尼拉湾，仅用了几个小时就摧毁了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美军只有7人受伤，西班牙则伤亡381人。桑普森率领的大西洋分舰队在7月3日的海战中，也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西班牙的舰队全部击沉，美方只有1人负伤、1人阵亡。

2、依靠歼灭战决胜

这次战争的主要样式是海战，但陆军的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起初，美军计划只派少量陆军部队进行一些有限规模的作战行动。陆军初期的战略方针是向古巴人提供补给并对西班牙人进行小规模的袭击。但是杜威在马尼拉湾海战中获胜后无法扩大战果，这一情况促使陆军改变战略方针。杜威向华盛顿报告说，海军“无法伸展到岸上更远的地方”，为了夺取陆地，“必须有手持步枪的部队”（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280页）。于是，美国便进行了大规模的陆军动员，并决定向马尼拉和古巴派遣远征军，其目标是歼灭当地的西班牙守军，占领西班牙的属地。

6月7日，麦金莱总统命令谢夫特率领第5军开往古巴。命令提出了两项任务，即消灭西班牙守军和协助海军对付塞维拉的海军舰队。谢夫特率部登陆后沿陆路直插内地夺取圣地亚哥城，迫使西班牙守军于7月17日投降。

梅里特率领的第8军同样贯彻了歼灭战决胜的战略方针。梅里特在与西班牙人协商占领马尼拉后，率部又进行了以消灭菲律宾游击队为目标的“反叛乱作战”。经过长达4年的激战，美军才将菲律宾游击队全部镇压下去。

3、实施联合作战

美西战争是美国首次在海外进行的战争，因此陆海军配合、协同作战自然就提上日程。在这方面，美军虽然进行了努力，但总的来说，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海军行动时，陆军没有同时派出远征军，致使夺取马尼拉的时间大大推迟。如果一开始美军就向菲律宾派出联合作战部队协调行动，战争的进程就可大大缩短。在古巴战场，夺取圣地亚哥本可以采取陆海夹攻，但谢夫特不与海军合作，坚持独立作战。在攻打圣胡安山战斗时，敌人的阵地正好处在美军舰炮的射程之内，但谢夫特并没有请桑普森给予火力支援，桑普森也没有主动采取积极的支援行动，致使这场战斗成了这次战争中最激烈、最残酷、美军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

三、战争前后的美军建设

美西战争是美国进行的第一次以夺取海外殖民地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此相适应，美军在建设上也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美西战争前后的美军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调整军事领导体制。在美西战争期间和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军领导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美西战争前，海军一直没有自己的参谋机构。1898 年 3 月，为制订海军作战计划，海军部组建了一个包括马汉在内的三人“海军战争委员会”。美西战争后，海军部又于 1900 年成立了海军综合委员会，由杜威海军上将任主席。其任务是制订国家及其属地的防卫计划、收集有关情报以及组织与陆军的协同等。该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但它一直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由于美西战争中暴露出一系列管理不善等问题，要求陆军改革的压力与日俱增。为改变陆军部长办公室、总司令办公室和各管理部局之间各行其是的状况，美国会于 1903 年批准了《参谋部法》，用参谋长取代了总司令，配有由 45 名军官组成的参谋部，成为军事决策一元化的领导中心。

战争期间，美陆、海军的编制也有所变化。陆军组建了 7 个

军，每个军由 1 名少将指挥。后又组建了第 8 军。海军仍保持分成若干分舰队活动的传统，只是把它合并成 5 部分，分别成为亚洲分舰队、北方巡逻分舰队、海军辅助部队、东海岸分舰队、北大西洋分舰队。

2、大力发展海军。19 世纪末，美军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印第安战争的结束，陆军的地位受到忽视，而海军则由于在海外成功地推进美国的贸易和利益而受到人们的青睐。从 80 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大都是海权主义者，这表明美国对海军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海军战略家马汉也发表了自己的海权著作，向人们宣扬建设海军的重要性和对美国未来命运的決定性作用。因此，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军建设方向发生了优先发展海军的重大变化。在军费分配上，陆军军费由 1891 年的 4872 万美元增加到 1898 年的 9199．2 万美元，比 1880 年的 3811．6 万美元增 加了不到 2 倍，而海军军费则由 2611．3 万美元增加到 5882．3 万美元，比 1880 年的 1353．6 万美元增加 3 倍多（杜威著《美国财政史》，1934 年纽约版第 475、428 页）。在美西战争前夕国会批准的 5000 万美元军费拨款中，海军得到了 3000 万美元。在装备上，海军从 1882 年开始大力建设现代战舰，并限制对旧舰只的修理，以确保“旧式海军”尽快退役。1883 年，国会通过《海军预算法案》，批准建造 5 艘装甲巡洋舰。1884～1889 年，国会又批准建造 8 艘装甲巡洋舰和 10 多艘其它型号的装甲舰艇。

1889 年 3 月，美海军政策发生了一次“根本性”改变，海军部长特雷西在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提出以战列舰歼敌于远洋的全新的制海权思想，提出为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分别建造 8 艘和 12 艘战列舰，并要求它们在武器、装甲、结构强度和速度上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舰只。此外，他还提出建造 100 艘现代战舰的建议，他指示成立的海军政策委员会在 1890 年更进一步提出了建造 200 艘战舰的计划。国会从 1892 年到 1896 年 4 月间先后批准建造 6 艘战列舰。从此，美海军走上了依靠战列舰夺取制海权的道

路。

3、进行军事动员。早在1898年2月底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就向欧洲和亚洲的海军分舰队司令官发出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此后，海军部命令即将服役期满的海军人员推迟复员；指示各舰队储备弹药和燃料；调"俄勒冈"号战列舰赶赴加勒比海。同时，埃班少将还奉命动员了一支由海上民兵操纵的快艇舰队（被称为"海军辅助部队"）。海军也购买或租用了军舰、商船和游艇。总的来说，海军的动员较早、较快、也较充分。

陆军的动员比较仓促，暴露了一系列问题。4月22日，国会批准征召3000名联邦志愿兵。23日，麦金莱总统要求征召12.5万名国民警卫队员，5月底又要求征召7.5万名志愿兵。在6周内，麦金莱征召的12.5万人就已到齐。但是，后勤方面的动员却跟不上。陆军部各局由于资金紧张、工具落后、效率低下、内部关系混乱，使动员起来的大量兵员缺乏各方面的准备。但经过3个月的努力，陆军物资方面的动员就满足了人力动员的要求，共装备了20多万人。为进行对菲律宾的侵略战争，国会在1899年3月通过议案，批准组建正规军6.5万人，授权总统征招3.5万名志愿兵。1901年2月，国会又通过议案，把正规军增加到10万人。

4、加强专业化和正规化建设。这主要表现在：(1)确立了以准备和进行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思想，要求在平时就作好战争准备，探讨"科学地"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2)军校教育和战略研究走向深入。一些军校相继建立，如利文沃思堡步骑实用学校（即后来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和海军军事学院。一系列学术团体和刊物纷纷涌现。1887年谢尔曼发起成立了军事学会，发行专门刊物，不久又派生出各兵种的专业学会和刊物。1873年美海军学会成立，并于1879年开始定期出版海军学会会刊。(3)实行军官晋升和退休制度。1882年美军正式实施强制退休制度。1885年，陆军成立了军事情报处。1890年，海军部建立了海军情报办公室。

(5) 以厄普顿为代表的改革派军官提出了建立德国式总参谋部的改革建议。

四、简短的评论

1、美国为向海外扩张而发动的美西战争是一场有限战争，其战略目标不是为了征服西班牙，而是为了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它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属地。因此，美国采用的将主攻方向指向古巴和菲律宾的“外围战略”与战争目标是一致的。这是美国在此次战争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2、美国强调主要靠海战取胜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它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美国在海军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而且一旦美军掌握了制海权，西班牙的那些孤悬在海外的属地就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尽管美国政府在战争初期已将陆海联合作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在实战中陆海军双方都缺乏主动协调的精神，结果不仅延长了战争的进程，而且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

4、在军队建设方面，美国政府优先发展海军，使海军在短期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美国赢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此期间却忽视了陆军的建设。这不仅妨碍了陆军的动员速度，而且影响了部队的质量，这对战争的进程不能不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洋战略与正面进攻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首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采取“中立”立场，超然于战争之外。待到交战双方都陷于困境时，一直伺机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美国，于1917年4月才宣布参加协约国一方，并且直到1918年初美军才陆续开赴法国。尽管美国参战的时间很晚，而且参战后也没有打过多少像样的大仗，但它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却摘取了许多胜利果实。

一、战前美国的战略地位

在普通美国人囿于传统观念而对海外事务近乎一无所知的1898年，威廉·麦金莱总统已看清了美国战略地位发生的变化。他派太平洋舰队司令杜威亲率舰队开进菲律宾，为美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充当急先锋。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继任总统后，更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他笃信马汉的理论，认为固守本土的战略已经显得保守，因而把较多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和加勒比海。1903年，罗斯福宣称，“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三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约翰·科斯特洛著《太平洋战争》，上册，第1页）。为此，他制订了“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统治力量”的扩张主义政策。实际上，早在美西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迫不及待地插手亚太事务了。1899年和1900年，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先后三次照会各列强，申明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美国派遣2500

名军队参加八国联军以“恢复中国的秩序”。罗斯福把在欧洲崛起的德国和在亚洲崛起的日本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于是便与英国结成联盟，以维持太平洋的均势。1903年，罗斯福在巴拿马攫取了运河区，并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以便进一步控制加勒比海地区，实现马汉倡议的“两洋协同作战”的思想。1907年，为了警告自命不凡的日本，也为了向各列强炫耀武力，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的所有16艘战列舰作一次环球航行。舰队绕过南美洲，北上旧金山，然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澳大利亚，浩浩荡荡的示威航行，引起世界各地报界的注意。几个月后，舰队平安归来，罗斯福得意洋洋地说：“他们再也不敢嘲笑山姆大叔了。”

在20世纪的头十年，美国的经济以巨大的冲力向前发展。1900年，美国钢的总产量为1018.8万吨，是英国的两倍。到1913年，美国的钢产量几乎与德、英、俄、法四国产量的总和持平，达到23180万吨。美国铁的产量也由1900年的1379万吨增加到1913年的31460万吨，比德、英、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同一时期，美国煤的产量由2.44亿吨增加到5.17亿吨。美国在采矿、运输、造船、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规模和效率都是很高的，尤其是新型工业（造纸、印刷、化学和石油工业）发展更为迅猛。原油产量由1900年的5300多万桶增加到1910年的2.09亿桶。石油工业及橡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美国发展汽车制造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1900年在美国还几乎不存在的汽车工业，只经过3年时间便已取代了法国而居世界领先地位，10年后，美国生产、拥有的汽车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美国的对外贸易在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发展也很快，出口总值从1900年的近14亿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近25亿美元，进口总值在同期也从8.5亿美元增加到18亿美元。此外，在这一时期进出口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1900年，农产品在美国出口中占60%，工业品只占35%，而到1914年，工业产品几乎占美国

出口的49%。美国的资本输出也从1900年的5亿美元发展到1914年的35亿多美元，增长了7倍以上，其中约有半数投资在拉丁美洲，其余分散在欧洲和远东。尽管美国的资本输出在这一时期还不能与其他大国并驾齐驱，但美国工业品出口的增长和美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黄绍湘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求获得海外市场。

二、坐收渔利的政策

在美西战争以后的十余年中，美国的军事战略始终遵循着向海外扩张的方针，逐步从本土战略转向太平洋战略和加勒比海战略。美国军界当时普遍认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日本、英国或德国，未来战场不是在太平洋就是在西半球。制定战略计划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曾就保卫美国及其领地和西半球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并建议建立各种基地，合理分配兵力。联合委员会还针对可能的敌国，制订相应的"橙色"、"红色"、"黑色"战争计划，其中针对德国的"黑色"方案，是在假设德国入侵西半球的情况下制订的。另外，在墨西哥发生革命的时候，为防止德国和日本乘机渗透墨西哥，美国制订了军事干涉墨西哥的"绿色"计划。这些以颜色为代号的战争计划，都没有估计到1917年美国会卷入世界大战，因而对美国参战并未起到实际指导作用。

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8月4日德军入侵比利时，震动了全世界。当时的美国政府利用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情绪，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坐收渔利的策略，以便一面大做军火买卖，捞取经济利益，一面窥测时机，摘取胜利果实。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在8月4日颁布了"中立宣言"。两个星期之后，威尔逊发表演说，要求美国人"既要在行动上又要在思想上做到不偏不倚"。在1916年底的总统大选中，威尔逊发誓要使美国避免战争，从而得以再次当选总统。但实际上，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政府在暗中却采取

了向协约国倾斜的政策，同时力求推迟美国参战的时间，以便捞取更多的实惠。

三、与协约国一致的海洋战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并没有全面备战的打算，"陆军和海军的决策者们都未预料到美国会参加何种类型的战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 24 页）。美国是在军事上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加入这场战争的。

美国决定参战后，总统威尔逊发出号召："立即采取步骤，不仅使全国进入更完备的防御状态，而且要倾其物力、财力和人力，迫使德意志帝国政府屈服而停止战争"（《美国历史文献集》第 2 卷）。但正如拉塞尔·韦格利所言："对参战过迟的美国而言，要形成这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已没有多少机会"（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 243 页）。

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基本上与协约国保持了一致。在马汉思想盛行的 20 世纪初，欧洲国家大多迷信制海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军事战略是实行远距离海上封锁和在陆上实施正面进攻以期消灭敌人。实际上，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海上力量的。美国同样把制海权视为至高无上，十分看重战列舰队在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军方一度认为，将来战争"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甚至可能在地面部队参战之前战列舰队就已经解决了问题"（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 322 页）。但是，德国的潜艇战却使制海权受到了严重挑战，因此，对于协约国来说，除了要加强反潜作战能力、继续对德实行海上封锁外，加强地面部队的力量，从陆上打败德国军队，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1917 年 5 月，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团显然把这些战略上的考虑告诉了美国人，并敦促美国尽快向欧洲运送地面部队。美国附和了协约国的军事战略，参战时的战略方针基本上是明确的：在向欧洲派遣军舰，增援协约国海军；在参加对德进行远距离海上封锁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向欧洲运送地面部队，在陆

上进行正面进攻，彻底打败德国军队。

四、美国的正面进攻战略

美国虽然在总体上附和了协约国的军事战略，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坚持了自己的战略方针。

首先，为了赢得时间，争取在境外作战的军事主动权，美国采取战争动员与建立远征军总司令部同步进行的方针。尽管在战前美国已经在考虑组建能派往境外的后备役部队，但它在参战前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向欧洲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到4月5日宣战时，按部就班地进行战争动员和组建远征军总司令部显然已不适应战时的需要了。因此战争动员与建立远征军总司令部同步进行成了基本方针。宣战两天后，陆军部长贝克对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说："我们的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订，而不是已经就绪……但是，如果在就绪前有必要将我们的部队派往欧洲……我们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韦格利著《美国现代陆军史》第75页）。5月上旬，潘兴被确定为远征军总司令。中旬，国会通过征兵法案。下旬，远征军第1师已完成集结，同时潘兴也先于部队到达欧洲，于6月在马恩河上游设立了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7月初，潘兴组建了远征军参谋部，并根据战场情况，向陆军部提出了向欧洲增派远征军的计划。战争动员与建立远征军总司令部同步进行的方针，加快了美军投入战斗的步伐。

其次，美国决定参战后，特别强调美军在协约国部队中的独立性。参战前，英、法曾建议将美国的远征军分散到协约国的军队中，但美国没有答应。潘兴在赴欧洲之前，陆军部在签发的一项命令中对他作了明确指示："在反击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军事行动中，你要同其他国家的抗敌军队协同作战；但在这样做时要时刻铭记，美国军队是联合部队中一个独立和独特的组成部分。"（韦格利著《美国现代陆军史》第108页）英国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主要防守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港口地区，构成了协约国的左翼和北翼；法国同样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重点防守直接控制巴黎

的西线中段；而美国经过潘兴的努力，得以独立承担起协约国右翼和南翼的任务，即驻防在阿尔贡森林至孚日山脉的洛林地区，这就为保持美国远征军在这次大战中的独立地位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此后，美国努力在欧洲建立远征军集团军，当潘兴成为美国两个远征军集团军的集团军群司令后，便与其他协约国的集团军群司令官们平起平坐了。保持远征军在战场上的独立性，是美国战略方针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很显然，美国想通过这次战争，建立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军事地位。

再次，在欧洲普遍重视防御战、强调进行阵地战的时候，美国却坚持在战场上进行正面进攻的原则。韦格利评论说："到美国陆军部队于 1918 年春开始接管西线防区时，以英、法陆军为一方，德国陆军为另一方，已经差不多耗费了 4 年时间竭力使对方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在这 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北海，致使不可能进行侧翼机动，所以使敌军在血泊中躺下的唯一手段就是正面进攻，而双方都一直在消耗对方，结果双方都精疲力竭了"（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 234 页）。美国不赞成协约国坚持的"堑壕战"，而主张采取"野战"机动，即将敌人赶出堑壕后在开阔地上予以消灭。当协约国军队在战场上依靠手榴弹、迫击炮和自动武器实行小部队袭击时，潘兴指挥的美国远征军却时刻准备在步枪火力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德国军队实行大兵团进攻。

五、美国的战争准备

1、调整指挥体系

在 19 世纪末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的尝试中，没有对军事指挥结构作重大的调整，基本上保留了南北战争前的指挥体制。陆军部和海军部是两个具有最高指挥权力的机构，航空兵归陆军部领导。文官凌架于军人之上，总统、陆军部长以及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军事问题毫无经验，却又对军事控制过多。

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下都设有局，但各局对总体规划和协

调都不甚明了。与海军部不同的是，陆军部还设有一位按资历提升的职责范围不清楚的总司令。在这种指挥体系中，各级指挥官互不通气，难以发挥良好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成立于1903年。同年通过的参谋部法规定设立陆军参谋部。参谋部由1名参谋长、2名将军和42名尉官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1916年的国防法中将参谋部的将军增至3名，尉官增至52名。但国防法同时规定，在哥伦比亚特区或附近服役的尉官不得超过半数。这样，1917年春美国宣战时，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核准人数只有41名，华盛顿19名，其他地区22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总参谋部的成员有232名，德国则达650名。美国参谋部并没有受到总统和国会的重视。

美国参战后，潘兴及其远征军司令部被授予特殊的军事权力，并建立了远征军参谋部，对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军队享有最高军事指挥权。也就是说，远征军参谋部的权限超过了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部。潘兴赴欧前，陆军部长贝克面谕："你在法国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史密斯著《潘兴——五星上将》第8页）。在美国历史上，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从未获得过这么大的权力。

但是，美国远征军的领导机构并不完善，参谋效率也不高，这与美国战前的军事准备不足是有关系的。"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万名美国军官里，每6个人中只有1人战前在陆军或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美国远征军军官的专业水平，特别是新军官的水平，在大战期间一直使潘兴寝食不安。"（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353页）而且，在参战期间，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与陆军参谋部之间一直疙疙瘩瘩，矛盾的焦点就是争夺陆军的统帅权。这种不完善的指挥体系和其他未解决的矛盾都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增强兵力，调整编制

1917年4月美国宣战时，陆军正规军官兵是127588人，国民

警卫队的官兵是 80446 人，共 208034 人，其中军官不到 9000 人。按 1916 年国防法的规定，正规陆军以师和旅为战术编制。但是，美国参战前的部队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及海外领地，没有一个完整的师。

潘兴到达欧洲后，对远征军的编制提出了新的建议，并得到了陆军部的批准。新编制规定：远征军的基本单位是排，每排 58 名士兵，由 1 名陆军少尉或中尉指挥；每连 250 名士兵，6 名军官，由 1 名上尉指挥；每营由 4 个连组成，约 1000 名士兵，由 1 名少校指挥；每团由 3 个营和 1 个机枪连组成，约 3500 名官兵，由 1 名陆军中校指挥；每旅由 2 个团和 1 个机枪营组成，约 8500 名官兵，由 1 名准将指挥；每师有 2 个步兵旅、1 个野战炮兵旅、1 个工兵团、1 个独立营以及后勤部队组成，72 门炮、260 挺机枪，17666 支步枪，约 28000 名官兵，由 1 名少将指挥；每军由 2 个或 2 个以上师组成，由 1 名少将指挥；每个集团军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军组成，由 1 名中将指挥；集团军群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集团军组成，由 1 名上将指挥。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师的编制。每师官兵 28000 名，这个数目是 1917 年英国、法国或德国 1 个师兵力的两倍。有人批评这样庞大的编制不便于指挥，但是潘兴和他的参谋人员却认为这种师的编制有许多优点。它可以保证作战的持续力，比普通编制的师具有更强的持久力和攻击力，可避免因战斗进行间更换替补军队而造成的锐气减弱。另外，鉴于美国远征军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指挥和参谋人员，大编制的师可集中使用为数很少的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由于师的数目少，每师人数就应增多。

美国海军实力在战前虽有所提高，但并没有重视反潜作战能力。1917 年 4 月，美国海军驻欧洲海域司令威廉·西姆斯海军少将鉴于协约国舰只严重受创于德国潜艇的危急情况，从伦敦发回建议，要求把本国所有能派得出来的驱逐舰派到欧洲海域护航，因为他发现英国在西部通道和北海一带已不再派舰船护航。英国当

时拥有将近300艘驱逐舰，而美国只有70艘，其中仅有44艘是新的燃油驱逐舰。美国一直担心德国会袭击西半球，所以直到首批赴欧舰队启航两个月后，才增派34艘驱逐舰赶到昆斯顿，而把主要由老式驱逐舰组成的分遣舰队留在西半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立即停止1916年立法规定的庞大造舰计划，并于1917年5月着手执行建造250艘驱逐舰和400艘猎潜艇的计划。

美国海军面临的另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就是负责向欧洲运送兵员及其装备和给养。如果按美国现有的船运能力，要运输90万士兵到法国，至少需要2年半甚至4年的时间。而且，如果运送1个师的兵力，那么给这个师运送装备、给养的吨数将4倍于此。美国海军很难单独承担这一重任，于是政府动用了商船。1917年4月16日，政府特许航运局成立附属机构——应急船队有限公司，计划以超过潜艇击沉船舶的速度造船。与此同时，航运局扣留了从1914年就停泊在美国港口的97艘德国船，准备修复后投入使用。

美国宣战时，曾向协约国夸下海口，声称不久美国就会有上万架飞机出现在欧洲战场的上空。但是，“美国航空工业在1916年交付给陆军的只是366架订货中的64架，而这是9个航空工厂的产量。而且，这些飞机的性能，特别是发动机的性能，不能和欧洲的相比。1917年4月，美国的飞机还不到50架”（美《空军》杂志编辑部编《美国空军史》中文版第16页）。按照欧洲标准，其中没有一架可以称为作战飞机，正在服役的飞机仅有53架。1917年6月初，陆军部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制造22625架飞机，其中12000架将用于法国战场。8月，潘兴与法国航空部商定，到1918年6月，美国将向协约国提供5000架飞机。当潘兴在欧洲乱许诺言之际，美国陆军部也正在制订不切实际的计划。美国决定把航空兵增加到345个作战中队，45个工程连队，81个供应中队，11个维修中队及26个气球连队。其中，236个作战中队准备在1918年6月30日用于欧洲，其余的留在美国、巴拿马及太平洋。

这项指标显然是超出了美国的实际能力。事实上，到1916年为止，美国的航空工业总共只生产了不到1000架军用和民用飞机。陆军部终于从盲目的热情中冷静下来。1918年初，在与潘兴商量之后，陆军部批准了一项新计划，准备在1919年1月使用120个作战中队于欧洲前线。

3、实行征兵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兵役制问题上充满了争论。1914年，国会曾通过了一项志愿兵役法。其中一项条款规定，陆军部要保证民兵部队的编成内有3/4的志愿兵。这项立法受到了军界主张战备的激进分子的抨击。前陆军参谋长伦纳德·伍德批评志愿兵制度"扼杀每一位公民心中都应有的军事义务感"，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同任何作好战争准备的强国进行斗争"。陆军部也极为赞成放弃这种极端依赖志愿入伍的现行立法，而主张实行比较可靠的义务兵役制，以保证充足的兵员。同年4月，伍德将军借鉴瑞士的经验，着手进行普遍军训的尝试。在普拉茨堡训练地，他集训了大量自愿前来的市民，"吸引了公众对战备的注意，收效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结果"（杜普伊著《美国的军事传统》第355页）。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美国越来越感觉到兵员匮乏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准备实行征兵制。1916年的国防法肯定了征兵制的原则，规定："美国的民兵将由年满18岁、身体健康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以及已宣布或将宣布成为美国公民的健康男子组成。除例外情况，年龄不超过45岁。"（韦格利著《美国现代陆军史》第69页）

1917年4月，美国决定参战后，实行征兵制便成了当务之急。参谋长斯科特对陆军部长贝克说："如果现在你不实行征兵制，那你就已经输掉了这次战争。"（史密斯著《潘兴——五星上将》第8页）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17年2月美国与德国断交时，总统曾指示贝克草拟一项征兵法案。美国宣战后，总统立即向国会提交了这一法案。法案规定，年龄在21到30岁之间的所有男

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法案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全国立即征召50万士兵，，必要时可再征召50万。正规陆军、国民警卫队和应征人员的服役期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同时志愿兵依然存在，正规陆军、国民警卫队、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继续募兵。1917年5月18日，国会通过了征兵法案，基本上解决了美国的兵源问题。先后登记的人数达2400多万，入伍人数有400多万，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在人力动员方面收效如此之大，是与传统的民兵制度分不开的。

4、改进武器装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十分匮乏和落后的。美国虽然工业发达，但军火的生产却远远没有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宣战前1个月，国防委员会建立了由6名工业家组成的军火标准委员会。宣战后两天，军火标准委员会改组为总军火委员会，由大约20名陆军后勤军官和参谋部军官组成，负责军火采购的协调工作。但是总军火委员会未能担起工作重任，收效甚微。后来，7人战时工业委员会取代了总军火委员会，但新的委员会工作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已经是1918年的春天了。

1917年5月10日，陆军部长贝克召集陆军参谋长斯科特、副参谋长塔斯克·布斯以及远征军司令潘兴举行会议，专门讨论远征军的武器装备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美国远征军采用英国的步枪，并将对它进行改造，以便发射美国制造的弹药。

5、加强军队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普遍缺乏必要的训练。1917年4月23日，参议员约翰·威克斯在国会发言中说道："去年当我们的部队开赴墨西哥边境的时候，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可能有一半之多，从来没有打过步枪，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从来没有受过1个小时的训练。"（史密斯《潘兴——五星上将》第8页）就是这样的军队，还是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唯一受到实战锻炼的军队。在美国20多万部队中，当时在墨西哥边境打仗的正

规军有5000多人，国民警卫队有65000多人。如果按部就班，美国要在训练完150万新兵后才能派兵前往欧洲战场，而要训练完上百万的军队，美国就得用上全部现有的军队，就是说，美国需要20万名军事教官。

美国军队在参战后，已经不可能按常规进行系统的训练。美国远征军开赴欧洲后，潘兴遂“在法国建立了一整套精心安排的军官训练学校，其课目从武器的使用到参谋的职能无所不包”（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353页）。同时，潘兴坚持认为，士兵需要进行高强度和长时间的额外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方法主要是进行阵地战，所以，潘兴要求士兵必须学会如何进行阵地战和如何掌握在堑壕中使用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以及铁锹和有刺铁丝网等装备。此外，潘兴还要求士兵学会在开阔地进行运动战的进攻战术，因为要想赢得战争，美国陆军就必须进攻，将德军赶出堑壕。潘兴为在法国的美国远征军制订了冗长的训练计划，士兵在接受了4个月训练后，又被送到前线的一个较平静的地段进行实战锻炼。潘兴过于追求完善的做法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批评。陆军参谋长马奇写道：“大批士气旺盛的美军部队（师），在经过4至6个月的训练后，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军营中又进行了更长时间的训练后，原本希望一到法国就立即投入战斗，然而，他们的旺盛士气被他们在美国进行的一遍又一遍的训练消磨光了。”（韦格利著《美国现代陆军史》第103页）陆军部长贝克也致电潘兴：“我们刚刚发现了有关我国部队训练的两个问题……首先，虽然在没有战争刺激下的和平时期，将新兵训练成战士大概需要9个月到1年的时间，但是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人们有着使自己尽快成为合格士兵以投人战斗的强烈愿望。因此，现在也就不需要训练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肯定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里训练出比和平时期9个月还要好的士兵。第二，我们已了解到，让新兵在国内的训练营中呆太长的时间，会使他们变得疲惫和厌倦，而这种焦虑烦燥的情绪所造成的危害恐怕能抵消长期训练所带来的

好处……我想你会发现，在这里进行4个月训练的士兵，几乎可以同你的老兵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一起使用。而且你还会发现，起码就前者来说，在欧洲进行长时间的训练是没有必要的。”（同上，第122页）实际上，进入1918年以后，德国人的强大攻势已经迫使潘兴不得不在训练计划没有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将部队投入战斗。

六、简短的评论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多项战略决策以及尔后的战争动员基本上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进行总体战的需要。美国参战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消耗战略，即以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远离欧洲战场的有利条件为依托，组建和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逐步地投入战争，与协约国一道，通过持久作战最后打败德国。总的看，美国比较顺利地达到了这一战争目标。

1、在战争中美国的损失较小，而收益较大，战争推动美国挤进世界强国行列。美国远征部队在西线历时200天的地面战斗中，共有5万多人阵亡或重伤不治而死亡，20万人负伤，病死于国外的人数为5．7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死于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伤亡总计30余万人。战争的直接费用约300多亿美元，其中1/3是用税收支付的，其余的2/3则为借款。美国的战争费用仅为协约国的1/5。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留下了毋庸置疑的财产：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战前，美国人欠外国人30亿美元，而战后外国人欠美国人130亿美元”，“美国突然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华尔街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托马斯·帕特森著《美国外交政策》，第419、420页）。

2、战前美国军事战略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战争丰富了美国的战略实践。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在赴欧前竟没有得到任何一项具体的军事计划。美国海军在参战前也没有作必要的计划。海军上将本森说，他没有从海军部长丹尼斯那里得到任何进行战争准备的明确指示。“没有一份战争计划写在纸上”，“我只是概略

地说明总的方针”（雷蒙·奥康纳著《殖民地时代至今的美国防务政策》第179页）。美国参战后，负责指挥美舰在欧洲海域作战的海军少将休·罗得曼，赴欧前既没有得到任何政策性指示，也没有得到任何计划，甚至到欧洲时向谁报到都不明确。韦格利评论说："如果要问美国对哪一次战争缺少准备，最恰当的回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韦格利著《美国现代陆军史》第73页）莫里斯·马特洛夫博士也评论道："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实施从战略上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首先击败哪个敌人，在何处击败以及怎样击败，美国在欧洲的伙伴们就这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决定。事实上，是他们填补了美国战争计划的空白，提出了基本的战略。"（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24页）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基在《美国军事史》中说："这个国家充满着各种纸上谈兵的计划，但却可悲地在一场它未曾预见到的战争面前显得毫无准备。"（阿伦·米利特等著《美国军事史》第331页）

3、战时武器装备的生产依赖于平时的工业基础和组织准备。在军火生产方面美国在战时的造舰计划完成的较好，但对陆军武器装备的生产却不够重视，以至陆军后来在欧洲西线作战中，不得不严重依赖英、法两国的大炮、弹药、坦克和飞机。然而，战争实践也教育了美国当政人物，战争中出现的“军事一工业复合体”起了很好的作用，它起源于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战后，美国保持并加强了这一复合体，从而增强了平时的组织准备。陆军也认识到“它的战时装备将不得不主要在战争开始以后才能生产出来，因此它对工业动员计划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253页）。1922年美国建立了跨军种的陆、海军军需局；总参谋部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动员计划；1923年陆军部为了加强动员计划的研究还建立了陆军工业学院。美军开始“把战争中的外交作用和经济动员计划的考虑引向对战争的性质进行更加开阔的哲学上的考察”（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255页）。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先欧后亚”战略与联盟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化战争，对各参战国军事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美国在战前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战略理论指导，但历史把美国推上了全球军事舞台，使美国在军事战略领域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国家战略方面，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走向参加战争并推进联盟战争；在军事战略方面，从战前单一北美作战计划走向应付多线作战和全面动员。

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战略环境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1918年11月11日，随着“贡比涅停战协定”的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火终于熄灭了。然而世界并未从此获得安宁。1919年1月，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重新瓜分世界，又埋下了新的祸根。

日本和意大利是战胜国，但在分赃中所获无几，为此，它们忿忿不平。战败的德国不仅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还被迫割让了本国的部分领土，因而更是复仇心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先后走上了法西斯道路。3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他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欲望越来越强，于是便先后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迈出了它妄图首先征服中国、继而征服亚洲的第一步。从此，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开始在亚洲形成。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第二个战争策源地也开始在欧洲形成。意

大利早就梦想独霸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地区，进而在地中海地区建立“大罗马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因分赃太少而十分不满。墨索里尼叫嚷要用武力为意大利人取得“阳光下的地位”，以实现其侵略扩张的夙愿。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英、法两国政府大搞绥靖政策，步步退让，不仅破坏了战前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联盟，而且使得本来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德、意、日法西斯处处得手，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战略环境下，美国奉行的是一条以“孤立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对外政策。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之一。它主张美国应孤立于欧洲之外，不卷入欧洲的纷争，意在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谋求自身利益。进入30年代后，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势头日甚一日。美国的当权者们固守“孤立主义”原则，打出“中立”的旗号，推行美国式的绥靖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抛出所谓“不承认主义”，实际上是放纵日本的侵略行动；1935年8月，正当意大利准备向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发动大规模入侵之际，美国国会匆忙通过一个中立法案，宣称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禁运。此后，在西班牙战争、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问题上，美国都“严守中立”，与英、法沆瀣一气，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了助纣为虐的不光彩角色。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美国一方面禁止向西班牙输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另一方面却无视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的事实，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卖给德国和意大利。佛朗哥叛军则通过德、意，源源不断地获得武器供应，用来屠杀西班牙人民。

美国在20～30年代奉行“孤立主义”，推行“中立”政策，有着复杂的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从经济上看，美国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忙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暇他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迷漫着和平主义

情绪，客观上为“孤立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从美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上看，当时的美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西半球地区大国的地位，没有更多的海外利益。

然而，从本质上讲，美国并不是真的要孤立于列强争夺之外，作“中立”派。相反，美国标榜的“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同它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一样，都是一种霸权主义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和利用德、苏、英、法等欧洲强国的矛盾，让这些矛盾在欧洲范围内发展，并在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解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美国“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6页）。

与“孤立主义”的国家政策相适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军事战略主要是注重本土和西半球的防御以及在太平洋与日本的争夺，并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对于欧洲方面，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人——德国，这一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则基本没有涉及。直到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的扩张野心暴露得一览无遗时，美国才转而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二、奉行“先欧后亚”战略

“先欧后亚”，或称“德国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它对于美国成功地实施两线作战乃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大影响。

1、“先欧后亚”战略的形成

如前所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美国当局囿于“孤立主义”的观念，一直把日本当作美国的主要假想敌，如何打赢一场太平洋战争是美国军事决策机构十分关注的问题。

1938年3月至9月，法西斯德国相继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其独霸欧洲、称雄世界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才开始把德国看作主要敌人。1939年4月，美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如美在两洋同

时受到威胁，那么，在太平洋上应采取守势。两个月后，这一思想在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主持制定的新战争计划——“彩虹－5”中得到体现。该计划设想，战争一旦爆发，美国将向欧洲和非洲大陆派兵，与英国等盟国部队协同行动，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直到对欧洲轴心国的作战胜利足以允许把主力调到太平洋时，再对日本发动决定性的攻势。“彩虹－5”战争计划的制定，标志着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从重视对日作战转向重视对德作战。这就是说，“欧洲第一”或“先欧后亚”的思想，已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

1941年1～3月，美英两国参谋部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全球战略问题，会议产生的文件称为《ABC－1参谋协定》。在这次会议上，英美双方就战略方针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指出：“鉴于德国是轴心国的首要成员国，因此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将使用于该战场。其他战场上美国部队作战的指挥均应有利于这方面的战事。”“如果日本参战，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至此，“先欧后亚”正式成为英美两国共同的战略方针。

美国在两线受敌的情况下，作出“先欧后亚”的战略选择，其主要原因有四条：

第一，美国垄断资本在欧洲的利益最大。据有关材料统计，至1941年底，美国在亚洲、大洋洲的投资合计为8.53亿美元，而在欧洲的投资却达20.06亿美元，几乎是亚洲、大洋洲投资总和的2.5倍。在对外贸易方面，欧洲的地位也明显超过亚洲。以1940年为例，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占它出口总额的41％，从欧洲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5％；对亚洲、大洋洲出口占总额的18％，进口占总额39％（主要是原料）。毫无疑问，美国在欧洲的巨大经济利益，是它制定战略方针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

第二，德国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中军事、经济实力最强、野心最大的一个。如果德国征服了西欧，那么，西欧巨大 的工业潜力

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进一步使它的军事机器得到强化。因此，德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当局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战胜日本，还不足以促使其他两个法西斯国家崩溃，而战胜了德国，则意味着对轴心国的战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美国把主要力量使用于欧洲，可以与苏联、英国这两个世界强国建立可靠的同盟关系，并充分借助它们的力量去打败德国，尔后苏联又可配合英、美对日作战。这样，美国便可以较小的力量和代价取得最后胜利。相反，如果英国和苏联战败，德国将与日本相配合，共同对付美国。那么，美国将处于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第四，从地理位置上讲，美国的城市和工业集中在大西洋沿岸，它离欧洲的距离比亚洲要近得多。由于大西洋交通线短，又有英伦三岛作为屯集兵力、进攻欧洲大陆和德国的理想基地，因此，向欧洲增兵要比向太平洋增兵更合算。

2、排除干扰，坚定而灵活地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能否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战争的胜负固然具有决定意义，然而能否在变化莫测的战争中始终清醒地审时度势，坚定而灵活地贯彻既定战略方针，争取和把握战争主动权，则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8 日，日军同时在广阔的战区——太平洋和东南亚发动了战略进攻。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日军相继攻占了泰国、马来亚、香港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据点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和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控制了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急剧恶化，在客观上对于贯彻“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造成很大的冲击。

当时，被日本的偷袭激怒了的美国社会，强烈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败日本。在美国军队内部，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海军作战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等高级将领，也站出来要求

反击日本，主张把重兵投入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等人的主张在美国国会内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一些共和党人甚至建议在华盛顿成立以麦克阿瑟为首的最高统帅部。菲律宾总统奎松此时也向罗斯福总统表示，如果美国不及时出兵增援，他就要求美、日两国都从菲律宾撤军。菲律宾宣布中立，这将意味着菲律宾将不再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种种压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没有动摇，始终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941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2 年 1 月 14 日，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美、英两国参谋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即"阿卡迪亚"会议，决定组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美、英首脑们一致认为，尽管发生珍珠港事件，两国仍将奉行"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美国政府在排除国内舆论干扰的同时，还面临来自盟国的干扰，这就是美、英军方在欧洲作战计划上的分歧。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英、美盟军统帅部内在执行美国人提出的"波列罗——围歼"计划还是执行英国人提出的"火炬"计划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是否应当继续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再次成为问题。

所谓"波列罗一围歼"计划是 1942 年 4 月美陆军参谋部提出的一项欧洲作战计划。按照这一计划，英、美两国应将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集结于英国，在 1943 年春天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经法国直接打入德国腹地。为了配合这一计划，还要在 1942 年秋天进行一次代号为"大锤"的较小规模的进攻，以便在法国海岸建立一个立足点。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出马歇尔等人前往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英国对"大锤"和"围歼"计划都不愿接受，而提出另一套打击敌人"软腹部"的主张，即首先出兵北非。

1942 年 6 月，丘吉尔赶到华盛顿，提出盟军准备不足，德军

防御坚固等种种理由，劝阻美国人不要过早发动进入法国的进攻。与此同时，英国提出了一项“火炬”计划，即英、美在北非联合作战，消灭德国的“非洲军”及其意大利盟军。英国的计划遭到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美国高级将领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只有集中兵力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欧洲大陆，才能对德国法西斯造成致命打击，尽早结束欧洲战事。美国将军们认为英国人的“火炬”计划是存心巩固他们在地中海的利益。

由于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各执己见，争论陷入僵局。愤怒的马歇尔将军在海军上将金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如下建议：如果美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波列罗—围歼”计划，而到其它地方作战，美国就应坚持把进攻矛头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换言之，对德国除空袭外将采取防御态势，而将军队主力转向太平洋。与此同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几个小时内就拟出一份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详细计划，提请总统审定。

在这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表现出把握战略大方向的才干。他在给马歇尔和金两人的回信中明确地答复道：我仔细看过了你们星期日拟制的计划，给我的每个印象是，它完全是珍珠港事件后德国希望美国采取的行动。其次，除占领许多并不影响今明两年世界形势的岛屿外，实际上计划并未提出使用美国部队投入战斗的问题。……因此，目前不能批准此项计划。

1942 年 7 月，罗斯福第二次派马歇尔等人去伦敦与英国商定作战计划。罗斯福指示他们，如果在实施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上无法求得一致，则商讨今年在另一地区实施一次作战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军们只得接受英国人的“火炬”计划，决定于 1942 年 11 月进攻北非。

对于英美之间的这场争论和结局，后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它的深层原因与是非曲直。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正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机智、果断与决心，才弥合了英、美两国在战

略问题上的危险裂痕，消除了当时贯彻“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一大障碍。

如果说美国领导人在对待珍珠港事件和出兵北非的问题上表现出贯彻“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坚定性，那么，他们在适时调整欧亚两大战区的兵力部署、正确处理主次战场关系的问题上，则更多地表现出运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灵活性。

3、优先考虑主战场，兼顾次要战场

在战争中，确定战略重点的目的是要在主要战场的决定性作战中集中兵力，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力量。这是达成战略作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早已被世界各国诸多军事家们反复强调的一条重要战略原则。美国将欧洲作为主要战场，兵力部署的重点也在欧洲。但是，美国在亚洲也拥有巨大的利益，太平洋同样是它绝对不能失去的战场。所以，在“先欧后亚”的总战略方针下，如何适当地调整两线的力量分配和兵力部署，既保障主战场的作战又兼顾次要战场的行动，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指导上的重要问题。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一直采取战略防御态势，企图尽量通过外交手段制止日本扩张。在军事实力上，美国在这一地区处于劣势。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在南亚发动了强大攻势，截至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占领了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在内的386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面积等于日本本土10倍多，人口达1.5亿。同时，日军在太平洋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岛、帝汶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直至缅甸的广阔防线。日本军队在防线内的岛屿上建立了可以相互支援的海、空军基地网。为进一步扩张战果，从1942年4月起，日军开始执行新的作战计划，企图逐步控制所罗门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一线，进而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交通线。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战争形势，美国在执行“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前提下，在兵力部

署上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首先，美国当局为在太平洋遏制日本，适当调整了原定的计划。在整个 1942 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集结了它一半以上的海外陆军师和三分之一的航空大队，总兵力为 35 万人。在海军力量的分配上，太平洋战场更是远远超过欧洲战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2 年年底。太平洋战场的美军由于得到及时的加强，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便从珍珠港失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1942 年 5～7 月，美太平洋舰队先后在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主力。从此，海上的主动权转入美国手里，整个太平洋战局发生了有利于美而不利于日的重大转折。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2 月，美军经过反复争夺占领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而揭开了太平洋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基于这种有利形势，1943 年初，美国领导入再次对两线的兵力部署进行了重大调整，决定在太平洋战场先行实施有限的战略反攻。

事实证明，美国领导人的这些战略决策并没有违背“先欧后亚”的战略总方针。就欧洲战场而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虽不可避免地对它产生了影响，但盟军在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和行动，基本上都是如愿以偿的。此外，美国对于太平洋战场的加强是以不破坏“欧洲第一”的方针为限度的。1944 年后，当欧亚两大战场都进入了战略进攻的关键阶段时，美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对于欧洲大陆的进攻应是高于一切的。在这一年中，美陆军向欧洲派遣了 26 个师，而向太平洋只派去了 7 个师。

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美国之所以能够既坚持重点，又兼顾全局，恰当地调整兵力部署，除主观指导正确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第一、美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拥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具备同时承受两线作战的能力。美国军事生产委员会计划统计局 1944 年 7 月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43 年，德、意、日轴心国军火生产的总和还赶不上美国，更不要说与整个同盟国相比了。德

军名将隆美尔曾无可奈何地说，既然德军潜水艇在大西洋争夺战中遭到了失败，而美军及其补给品已源源不断地运抵欧洲，那么德国“在凡是英美海上运输工具所能到达之处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行了联盟战略，实际上扮演了坐收渔利的角色。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军队都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作战力量。在欧洲苏德战场上，从1941年底到1945年初，苏军抗击了57.1%～70%的德国陆军师，而美、英两国共同抗击的德国陆军师，最多也只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亚洲，中国始终抗击和牵制着近80%的日本陆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正因如此，美国在两大战线上频频调整兵力部署，才能显得这般游刃有余。

三、坚持联盟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其全球规模上说，是一场两大联盟之间的较量。美国是在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才正式参战的。美国在战争中所推行的联盟战略，大体上也是在参战前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联盟战略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战时内外政策的诸多方面。

1、美国推行联盟战略的主要目的及其贡献

美国在战争中推行联盟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美国地缘政治和工业技术的优势，充当同盟国的“民主兵工厂”，提供物资支援，辅以海外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盟军的共同力量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并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争夺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联盟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长期奉行的一条原则：宁愿多花钱，也不愿多死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直接军费开支约为3500亿美元，多于其他各主要交战国；军人伤亡数约为4050399人，在各主要交战国中是最少的；美国从军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于其他各主要交战国。美国推行的联盟战略总的来说是颇为成功的，它对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推动了盟国在政治上互相磋商，在物资上互相支援，在军事上互相配合，从而有助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

美国联盟战略的首要贡献是坚定了各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并为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基础。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一经宣战，罗斯福就表现了高度的坚定性。他在战争宣言中以及尔后的多次首脑会晤中，反复强调同盟国的政治目标应当是彻底打败法西斯国家。在美英“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总统就宣布了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的最终目标。这就是说，美国参战是以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为目标的，不打败敌人决不停止战斗。这一作法是否明智，当时在美国的国会和舆论界曾引起很大的不安和辩论，但罗斯福政府却一直奉为主要的指导原则。彻底打败敌人，也是美国参战的首要战略决策。

美国联盟战略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以“租借法案”的形式，向西方盟国以及其它盟国提供物质支援。西欧诸国的沦亡以及德国在大西洋进行的潜艇战使英国的形势岌岌可危。1940年8月，美国总统冲破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决定支援英国。英国决定用它在大西洋属地上的军事基地换取美国50艘超龄驱逐舰，以增强英国运输船队的护航力量。罗斯福政府也决定以立法的形式对同盟国提供物质支援。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起初，美国制订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支援英国抗击法西斯德国，随着战争的扩大，它的适应范围日益扩大。1941年5月，该法案扩大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美国希望中国能把日本人牵制在亚洲大陆；1941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又正式宣布苏联享有“租借法案”的权利，希望苏联能在陆战上牵制德国这个侵略元凶。在整个战争中，“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扩大到38个国家。从1941年3月法案通过起至1945年9月战争结束止，美国按“租借法案”共支出500多亿美元。当然受援国也给美国提供了可贵的帮助，例如英联邦给海外美军的“倒租借”（提供必需的供应品、军事设施、劳务、运输等）即达67亿美元之多；苏联也以白金等稀

有金属和其他物资援助了美国；中国也为在华美军提供了空军基地、营房等设施。"租借法案"使美国在牺牲较小的情况下获得了安全，并为繁荣美国的经济创造了条件。

美国联盟战略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派出大批武装力量参加盟军的联合作战。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在全球形成亚洲—太平洋、欧洲—大西洋和北非—地中海三大战场。美国遵照联合作战的原则在欧、亚和北非战场上都派出一部分武装力量，担负了一定的军事任务。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美国现役军队总兵力约为241万余人，其中陆军51个师，飞机3000架。当时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而参加太平洋作战的只有15个陆军师，飞机1500架以及海军的基本兵力。美国在太平洋的正面战场包括两个战区，即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中太平洋战区主要由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及其陆战队负责，西南太平洋战区主要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太平洋美陆军负责。美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贡献在于通过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作战行动扭转了战局，并从1943年5月起与日军展开了岛屿争夺战。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全面转入反攻，对日本本土进行封锁和轰炸，在中苏等同盟国的有力配合下，最后迫使日本投降。

对德国纳粹的战争的主战场在苏联，次战场在西欧，而北非战场只是欧洲战场的一翼。美国是在1942年底与英国组成联军在北非登陆对德、意军队发动进攻的。在西欧战场，到1944年6月，随着诺曼底战役的展开，美军在盟军的编成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对战役的准备与实施开始起主导作用，美英联军的领导权从此落入美国人手中。

2、美英军队的联合作战及其矛盾

1942年7月罗斯福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派遣美军同英军一道开赴北非战场；二是在南太平洋发动有节制的反攻，从而满足了英国以及美军太平洋战区将领两方面的强烈要求。但是，欧、

亚两洲的军事形势大相径庭，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指导不能象它在太平洋战区那样完全由美国人说了算。在欧战中，美国是靠英国为基础的，因此美国的欧洲战略不能不是一种受英美两国军政外交影响的联合战略。于是，美英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建立联合司令部，以制订联合战略并指挥英美军队的联合作战。此后，美军的“四巨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私人参谋长威廉·科希海军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和陆军分管航空队的副参谋长阿诺德上将）与英国军事首脑组成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双方的战区野战部队组成联军部队，其司令官的国籍和军种取决于战区战争的性质和以哪个国家的军队为主体。联合参谋长会议对美国和英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实行全面控制。但实际上，太平洋战区的直接控制权是由美军自己掌握的。

美英军队的联合作战除了在大西洋的反潜作战以及在空中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之外，地面的行动主要有1942年11月8日在北非的登陆，1943年7月10日开始的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3年9月3日开始的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1944年6月6日开始的规模空前的诺曼底登陆以及随后的收复西欧大陆的大规模地面进攻，1944年12月中旬粉碎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1944年4月盟军在意大利发起全线进攻并取得彻底胜利，1945年2月盟军向德国腹地推进并在易北河与苏军会师。

在美、英联合作战中，始终存在着战略方针上的分歧。美国的战略主张是集中优势兵力，尽早越过英吉利海峡，直捣德国的心脏地区。这一方案也符合苏联提出的尽早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但丘吉尔则认为这一方案过于冒险，他受英国传统间接路线战略的影响，主张先在地中海、北非等外围地区牵制和削弱德国的力量，把宝剑刺向敌人“软腹部”，待时机成熟后再一锤定音。这一分歧到1943年有所发展。本来在美英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确定，在北非登陆成功并结束突尼斯的军事行动后，下一步进

攻的目标应当是西西里岛。但当时美国的参谋长们希望"把地中海的这一插曲赶紧结束"，以便抽出手来一举打过英吉利海峡。为了弥合这一分歧，1943年5月11日，当北非战局快要结束时，丘吉尔第三次访问了华盛顿，一再敦促罗斯福说服其三军参谋长们"正确地认识进攻意大利的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从大局出发，对英国的军事主张再一次作了妥协和退让。美国军方在总统的干预下，不得不同意进攻西西里岛。

美、英分歧的原因，除了军事思想的不同外，主要是双方各有打算。英国力图保持和恢复战前的传统势力范围，而美国除了意在打败法西斯之外，还想趁人之危，瓦解和夺取英国的势力范围，力图在战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

3、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的联合作战行动

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力，太平洋美军是抗击日本海军的主力。在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海战、空中轰炸及岛屿争夺战基本上是由美军进行的，太平洋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派遣了部分军队加入美军序列。在整个亚太战场，盟军的联合作战行动主要表现为在缅甸的反攻，其战略核心又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随即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主要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援助支援中国抗战以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转为正式同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这一战略有两大目标：一是"有效的军事盟友"，使中国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有力帮手；二是"忠实的政治盟友"，使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力量"。当时美国特别希望中国能顶住日本的进攻，大量牵制和消灭其有生力量，待美军主力转移到太平洋时，中国可以成为对日进攻的基地。因此，美国对中国加强了经济和军事援助。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说服丘吉尔推举蒋介石为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和印支）盟军最高司令官。随后，又任命史迪威

将军为中印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罗斯福为了支援中国坚持抗战，同意开辟一条从印度东北到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的“驼峰”援华空运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史迪威到任后立即指挥了第一次缅甸战役，但由于蒋介石的干扰，不真心抗日，加以英国人也不肯出力，造成这次战役的失败。于是美国改变了方针，由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进行地面作战转向由美国战略轰炸机依托中国的基地去轰炸日本。据美国陆军航空兵计算，要在中国维持700架B－29轰炸机，需要3000架空运飞机飞越令人生畏的喜马拉雅山“驼峰”，每月需空运的后勤补给超过15000多吨，这就超过了1943年美军的空运能力。美国最后选定了一项代替空运的办法，即在缅甸北部发动一次进攻战役，开辟一条印度—缅甸—中国云南的陆上通道。于是，盟军和日本在缅甸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缅甸战场从1942年5月到1943年底没有大的作战行动。1943年8月，为了加强指挥，美英商定成立独立的东南亚司令部，由英国的路易斯·蒙巴顿任司令，美国的史迪威任副司令。史迪威主要负责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兼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当时盟军的部队有英国驻印度的2个军、中国驻印部队2个军5个师，另在怒江东岸和日军对峙的有中国的4个军。1943年4月，蒋介石命令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统一指挥远征部队。日军驻缅兵力于1943年11月增至8个师团。1944年初，盟军拉开缅甸反攻的序幕，直至1945年5月2日盟军收复仰光，缅甸境内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才告结束。

总的来看，美国在推行亚太地区联盟战略的过程中，罗斯福在初期对蒋介石的期望很大。但蒋的意图不在真正抗日，而在于消灭共产党，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美国人对蒋介石成为抗日主力的期望一再落空。最后，美国不得不要求苏联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把苏联的影响引入远东地区。这一着也是罗斯福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四、均衡扩充陆、海、空三军

19 世纪末，随着马汉的"海权论"的出现和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美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海军建设上，企图凭借广阔的海洋保护自己并相机向外扩张。相比之下，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则发展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陆军人员少、装备差，主要担负本土防御任务，而陆军航空兵仅仅是隶属于陆军的一个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美国参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为了应付这场来自海上、空中、陆上的全面战争，美国必须合理地发展和协调一致地使用它的各种武装力量。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美国，及时完成了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

美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有过一段繁荣时期，战争结束时，总兵力曾达到 360 多万人。然而，好景不长，在传统军事战略的制约下，战后不到两年，陆军便减到 13 万人。到 1936 年，正规陆军只剩下 11 万人。马歇尔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陆军状况时曾抱怨说：我们没有野战军，只有微不足道的三个半师，而且还是以分队为单位分散部署在全国各地的。

1939 年上半年，欧洲战云密布，大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不得不开始加紧军事准备。1939 年夏秋，为适应可能卷入欧洲战争的需要，美国陆军多次扩充，到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前后，美陆军已拥有 36 个师，总兵力达 160 多万人。而到 1945 年 5 月欧战结束时，美国陆军的总兵力已高达 829 万多人，编成 89 个作战师。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始终是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抗击德、意军队的主要战略力量。为了在非洲和欧洲作战，美军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这支部队包括 47 个步兵师、16 个装甲师、4 个空降师、1 个山地作战师和 4 个海上运输旅，另外还有若干两栖部队、战斗工程兵部队、独立高射炮营、野战炮兵营和防坦克炮营。

与陆军的发展相比，美国空军的地位在大战期间上升的幅度就更大了，它不仅成为美军在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战略力量，而且最终成为与陆军和海军比肩并存的一个独立军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还只是陆军通信兵的一部分。到1926年，这支空中勤务部队才发展成为一个与陆军通信兵和工程兵平行的独立兵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空中力量的理论和航空武器装备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航空兵的建设也开始受到美国当权者的重视。1938年11月，罗斯福总统指示航空兵每年生产1万架飞机。1940年5月，他又要求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在整个战争期间，航空兵在军费、兵员等方面都享有优先权。因此在短短几年里，美国便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自19世纪末以来，海军一直是美军建设的重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在压缩陆军的同时，开始推行耗资数亿美元的大海军建设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成功地运用了马汉的海战理论，如占领基地和控制海上交通线，集中兵力进行舰队决战等。实践证明，这些基本原则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汉没有预见到飞机对海战的影响，他主张建立以战列舰为主体的舰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海上决战。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英、美、日、德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竞相发展战列舰，以便在未来的“日德兰式”海上决战中战胜对手。在这一时期，航空母舰虽然已有较大发展，但还未受到应有重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从珍珠港、珊瑚海等海战中及时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认识到制空权是现代战海的基本制胜因素，并开始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编组作战力量。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太平洋舰队以仅有的3艘航空母舰为骨干，组成特混编队，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扭转了战局，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1942年年底以后，“爱塞克斯”级新型航空

母舰被陆续派往太平洋战场。从此，美国海军开始大规模使用航母编队实施海上作战。当时，特混编队一般包括12艘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因此，美国海军很快便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随着战略思想的变化，美国的海军建设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发展战列舰为主，转为以发展航空母舰为主。此次大战中，美国共建造各种航母102艘，而同期服役的战列舰仅8艘。

五、简短的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虽然缺乏足以指导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战略理论准备，但是，战争实践提高了它从全球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多方面综合解决战略问题的能力，"在美国军事史上，制订战略第一次成为国家军事当局的一项很重要的正式任务"（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32页），从而改变了以往那种不关心战略问题的状况。战后，美国进入制定和研究战略问题的"繁荣时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算得上是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时期的美国军事战略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强调集中力量，首先击敌"要害"。这一原则贯穿于美国的战略指导和战役作战思想之中。这与美国"打一场'激烈而果断'的战争"以及"重视采取迅速、直接和彻底的解决办法"（《军事战略》第30页、33页）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在战略指导上，美国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轴心国的"要害"——德国的战略方针。美国认为，只要战胜德国，轴心国便会土崩瓦解。这就是美国在战争中坚持的"先欧后亚"战略。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集中力量首先击敌要害的原则，在美军的作战思想中具体表现为积极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同德军进行正面较量。从1942年4月起，美军就不断提出横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直接打入德国腹地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无法说服英国放弃打击"软腹部"的间接战略，美军的作战思想在联盟作战中没有

得到充分应用。而且，由于第二战场开辟过晚，德军已成强弩之末，美国这种作战思想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没有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足够的验证。

2、坚持联盟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曾有过联盟作战的实践。但是，这种实践显然没有升华为明确的战略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制定的一系列彩色作战计划，其“战略设想都是立足于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来保卫美国本土及国家利益”（《军事战略》第27页）。直到1939年6月，新出台的“彩虹计划”才正式提出与盟国并肩作战的思想，这标志着美国的战略思想发生了从单独作战到联盟作战的重大转变。在战争中，美国始终坚持巩固与发展反法西斯联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在军队建设上，美国放弃了传统的仅仅偏重海军的作法，建设了一支能够跨洋作战的庞大陆军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同时，美国还注意利用其科技优势，不断研制新式武器，领先掌握了原子弹，这一切，使美国最终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大国。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诸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概括地说，有两点非常重要。其一，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早已不满足其地区性强国的地位，于是，谋求世界霸权就成了美国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其二，美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地理环境优越，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这两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战略赖以形成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

下　　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

第八章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遏制战略”

一、杜鲁门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1945 年 4 月 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杜鲁门执政不久，便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战后，国际战略格局急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美国自身的地位和面临的战略形势与战时也大不相同。

1、美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战败，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严重创伤，而美国凭借远离主战场的地理优势，不仅是“未遭到大规模战争破坏的唯一大国”，而且大发战争横财，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急剧增强，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占了压倒的优势。40 年代后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占世界的 50%，工业生产总值占 60%，出口贸易额占 1/3，黄金储备占 3/4。美元成为国际通用可兑换的货币取得了与黄金同等的地位。美国还实际操纵了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美国科技发达，通过把原子能、计算机等尖端军事技术逐步转入民用，建立了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美国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

在军事方面，1939 年，美军总兵力只有 33．5 万人，国防预算不过 10 亿美元，除海军力量较强外，陆、空军力量都较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力量急剧膨胀。1945 年，美军总兵

力已达1200万人，国防开支829亿美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和仅次于苏联的强大陆军。美国占领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一部分，单独占领了日本，派兵进驻南朝鲜，接管了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美军有300多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还垄断着原子武器。因此，战后初期，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2、美苏两极体制开始形成

战后，社会主义制度终于越出一国的范围，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十月革命的深远影响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赢得的威望，苏联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之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承受了反法西斯主战场的沉重压力，实行了全民总动员。1945年，苏军总兵力达1136万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仅次于美国的海、空军，成为世界上第二军事强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英、苏三国领导人于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达成了"雅尔塔协定"，确定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理方案，在欧洲划分了势力范围；规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对日宣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同意将日本的库页岛南部和邻近岛屿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中国的大连商港国际化，旅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维持外蒙古独立，等等。"雅尔塔协定"为战后两极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战一结束，美苏战时同盟的政治基础便迅速瓦解，两国的战略利益出现严重对立。美国企图凭借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地位称霸世界，苏联则力图巩固并扩大其战争胜利成果。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战后第一次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以失败而告终。随着美苏矛盾的发展，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垒日趋明朗，两极体制逐渐形成。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市发表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亚斯特，一幅纵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了”。他主张美英结成同盟，反对“铁幕”后面“可怕的威胁”。这篇讲话正式宣告了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开始。美苏之间、东西方之间由盟友到对手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影响战后世界政治的重大因素。

3、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出现了广大的中间地带，这是战后国际形势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欧洲，大战结束后，法、意、希等国的共产党成为该国的第一大党，比、挪、奥、西等国的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威望。在亚洲，1945年至1947年期间，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成立了共和国，中国、马来亚、泰国等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武装的解放斗争。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制定了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蔓延为战略目标的“遏制战略”。

二、“遏制战略”的基本特征

1、“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同时又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

美国“遏制战略”的奠基人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美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在发给美国务院的8000字的长电中分析了“苏联战后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适当的手段，“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不久，凯南奉召回国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在1946年7月美国《外交》季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长文。他声称：苏联将“在一切它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

的正式疆界"；"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美国必须把苏联当作政治竞赛中的对手"；"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一种对苏联扩张趋势的长期而有耐心的、坚定而警觉的遏制"，"采取坚决包围的政策，在苏联可能危害西方国家利益的任何地方，坚决与之对抗"。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受杜鲁门之命于1946年9月24日完成了一项《美苏关系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把控制什切青到的里亚斯特一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其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之内，苏联决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苏联还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臣服于苏联而无力对苏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因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西欧、中东、中国、日本"，并控制"一切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以上均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二卷）。

凯南和克利福德的建议后来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基本依据。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演说》，声称："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此种选择往往不能十分自由。一种方式基于多数人之愿望，表现于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之自由。另一种方式乃基于少数人之愿望，以强制加诸多数人。此全赖于恐怖、压迫、报纸统制、无线电控制、圈定式选举及个人自由之压制。我相信美国之政策旨在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之征服企图。我相信我们必须协助自由民族依照其自己之方式，造成其本身之命运"。杜鲁门扬言："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决心"承担无限制的责任，领导自由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进行一场全球性的圣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美国对外政策文选》）。杜鲁门所提出的在全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被称为"遏制

战略”，亦即“杜鲁门主义”。

1942年5月22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为土、希提供援助的国会法令。从1942年年中到1949年年中，美国总共为希腊提供了6．48亿美元的援助。1947年11月，美、希成立了联合参谋部。美国派出18000名军事人员公开支持希腊反动派镇压希共领导的人民武装。1947年7月12日，美国又与土耳其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的协定》。在亚洲，美国则公开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达13．3亿美元；1948年4月2日，美国会又通过了总额达5．7亿美元的《1948年援华法案》。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之后，杜鲁门政府又把新中国纳入其“遏制战略”的范围。

2、“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

这种战略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二次大战时与苏联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法西斯，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限制苏联影响的扩大。从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虽几经变化，但都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并贯穿始终的。

（2）从古典的、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现代的、核时代的战略体系转变。尽管在“遏制战略”时期，美国尚未形成系统的核战略思想，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遏制战略”亦属核时代战略的范畴。

（3）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遏制战略”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别国事务少介入、坐山观虎斗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想，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战后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战略性质，实质上都是充当世界

警察，到处干涉、到处扩张、到处侵略的战略。

（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开始建立一整套独特的军事战略体系。由于美国经济发达、科技领先、军力强大，战后美军事战略思想日趋完善，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

（5）从发展缓慢到不断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军事战略发展比较缓慢。但从“遏制战略”开始，根据形势变化、力量对比、技术进步和实践经验，美国军事战略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大体上10年为一个阶段，花样不断翻新。各种各样的战略不断涌现，令人眼花缭乱。战后美国曾几度掀起战略研究热潮，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和思想库在这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3、“遏制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国防立法和国防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同步进行

战后初期，美国的国防立法和国防体制远不能适应推行“遏制战略”的全球战略目标的需要。陆、海军依然分立，空军仍以陆军航空队的形式存在，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国防立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构。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审议，美国国会于1947年7月26日通过了美国的第一部完整的国防立法——《国家安全法》。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美国设立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和战略，处理重大国家安全事务；建立了美军最高统率机关——国家军事部，将陆军部、海军部和新成立的空军部统一纳入国家军事部的建制。詹姆斯·福莱斯特尔于1947年9月17日就任国家军事部部长。国家军事部名义上虽有权统帅三军，但实际上各军种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陆、海、空三军部不仅负责本军种部队的建设和作战指挥，而且仍然是美政府内阁中的独立的部级单位，拥有直接向

总统和国会的建议权以及向预算局申请经费权，而国家军事部却不是内阁中的一个部。福莱斯特尔由于无法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于1949年3月27日辞职，路易斯·约翰逊接任军事部部长。

为了加强三军集中统一领导，美国国会又于1949年8月10日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决定将国家军事部正式改名为国防部，并成为内阁中的一个部。国防部长作为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有权管辖三军，而陆、海、空三军部则由独立内阁部降格为直属国防部长领导的军种部，三军部长作为国防部长的主要助手分别领导自己的军种部，取消了三军部长直接向总统和国会的建议权及向预算局的申请经费权。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机构，总统参谋长的职称改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三军的最高军职军官，充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顾问，并负责协调三军的计划和组织工作。这次改组不仅在立法上加强了国防部长的权力，而且在组织上基本确立了三军统一指挥体制。

三、"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1、设想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常规战争，原子弹只作为讹诈工具

"遏制战略"在军事上基本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依据的。战后头几年，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是，美国当时只把原子弹当成一种威力巨大的炸弹而已，并未大量生产，更未形成核战略体系。美国对未来战争的设想仍然是准备打一场传统的常规战争，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全面战争，而且最可能是与苏联在欧洲进行的大规模常规战争。《纽约时报》评论员鲍德温曾于1947年指出："在最近10至15年内，如果发生新战争，美国不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而且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增加原子弹仅仅增加了美国战略武库的威力。"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出版）一书中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所制定的战略并不是依靠原子武器的，而是把原子武器当作摧毁敌人工业中心的一种更为

有效的爆炸物”。因此，当时美军的基本战略构想仍是依靠全面动员战胜敌人。

2、推行“马歇尔计划”，加强对西欧的控制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说中提出了一项《欧洲复兴方案》，声称美国打算“帮助欧洲走上复兴的道路”，“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实现”。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要求在1948～1952年之间为此拔款170亿美元。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2日，杜鲁门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使该计划具备了法律形式。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拔款援助西欧各国，以复兴战后经济，但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向美国提供战略物资，拆除关税壁垒，放松或取消外汇限制，保障美国私人投资的权益，等等。英、法、意、西德等16个西欧国家先后接受了上述条件，并分别同美国签定了双边协定。

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后因执行顺利而于1951年底提前结束，并为《共同安全计划》所取代。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说：“马歇尔计划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花的代价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少得多，原来预计在4年多的时间内用170亿美元可以胜利地完成欧洲经济恢复工作，结果只花130亿美元就完成了。马歇尔计划将作为美国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而载入史册。我相信，全世界现在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是很难避免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杜鲁门在这里一语道破了“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的，即遏制共产主义，并为美国全面控制西欧铺平道路。

3、推行“第四点计划”，以外援作为向第三世界扩张的敲门砖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第四点是“技术援助和开

发落后地区的计划”，后被称为“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声称，美国的对外援助将从临时性转入长期性，在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之外还要提供技术援助，旨在解决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贫困问题，而“共产主义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满的土壤里滋长起来的”。

1950年秋，美国成立了“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合作署”，负责“第四点计划”的实施。同年底，美国已和33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推行“第四点计划”的协定。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案》，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也由经济转向军事，各种对外援助均纳入“共同安全计划”之中。对外援助成了美国对外扩张、获取市场和原料的敲门砖，成为诱压受援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并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工具。

4、多方拼凑军事联盟，共同包围遏制社会主义阵营

杜鲁门政府认识到，要推行“遏制战略”，包围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单靠美国自身力量是办不到的。美参议院于1948年6月11日通过《范登堡决议案》，授权杜鲁门政府广泛组建“区域性和其他集体的军事联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951年在参议院作证时说：“我们奠定的我国安全的基础，除了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的实力以外，就是集体安全。我们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最基本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地存在战争威胁，我们就同我们的盟国绝对地联合起来行动。”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总结了美国组织军事集团的意图：(1)“用一个联盟体系把苏联势力地区包围起来”；(2)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在战时承担义务”；(3)使美国向外国派遣驻军和干涉别国内政“成为合法”；(4)“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拼凑军事联盟。1947年至1951年，美国先后和41个国家和地区订立了双边或多边军事协定，其中主要有：1947年9月2日美与19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的“里约热内卢公约”(即“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1949年4月4日与12个西欧国家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2月加

入，西德于1955年5月加入，西班牙于1982年5月加入)；1951年8月30日与菲律宾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同年9月1日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美澳新条约”；同年9月8日与日本缔结的“美日安全条约”。通过一系列军事联盟，美国将盟国纳入其“遏制战略”之中，使冷战形势更加严峻。

5、建立全球军事基地网，维持前沿部署

战后，美国为了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继续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海外军事基地，一方面新建一批战略地位重要的军事基地。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美国占领了原日本统治的琉球群岛、琉璜岛、小笠原群岛以及散布在中太平洋的许多岛屿，还在日本本土、南朝鲜、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地加紧修建基地，形成了一条从东面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弧形军事基地网。在欧洲，美国除在西德建立了大量军事基地外，在英、法、意、西、挪也拥有军事基地，构成了一条从西面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弧线。在北非和中东，美国在摩洛哥、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土耳其等地也建立了军事基地，从南面包围社会主义国家。此外，美国在加拿大、格陵兰、冰岛等地也有战略空军基地。这样，美国就建立了一个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环球基地网，并在海外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沿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从而完成了从军事上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部署。

6、优先发展空军，以达到陆、海、空三军基本均衡发展

美国空军的前身是陆军航空兵，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B—29战略轰炸机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后，航空兵便成为当时唯一的核武器投送力量，其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1946年3月，美国在陆军航空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空军司令部。1947年9月，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空军部正式成立，空军成为与陆、海军并列的一个独立军种。

由于航空兵在战争期间战果辉煌，加之它又是战后新建立的

一个军种，基础比较薄弱，因而杜鲁门政府强调优先发展空军，大力增加空军的兵力和军费，同时相应发展陆军和海军，以促使三军均衡发展。在兵力方面，1947年三军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陆军43．3%，海军37．4%，空军19．3%。到1952年，陆军稍有上升，占44%，海军下降到29%，而空军则迅速上升，占27%。在军费方面，三军在1949财政年度军费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陆军50．2%，海军31．5%，空军14%。可是，到1952年度，陆军下降到40%，海军下降到25%，而空军却上升到32%，三军趋于平衡。

7、适应柏林危机和侵朝战争的需要，重新扩充军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满足国民要求安宁和恢复正常状态的愿望，美国进行了战后大规模复员，三军总兵力由1945年6月的1212．4万人，压缩到1948年6月的144．5万人。国防开支由1945财政年度的846亿美元削减至1948年度的91亿美元。然而，为了推行"遏制战略"，杜鲁门政府于1948年6月借"柏林危机"之机恢复了征兵法，重新扩充军备。至1949年6月，美军总兵力又上升到161．5万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于27日命令美军直接参加侵朝战争，并命令美第7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公开暴露了美国在亚洲以新中国为重要遏制对象的真面目。侵朝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向杜鲁门提出将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建议，力主摧毁中国的工业能力，支援蒋帮进攻大陆"部分脆弱地区"，甚至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但是，"杜鲁门政府坚持认为，苏联才是最危险的共产主义国家，欧洲才是共产主义和西方世界对抗的至关重要的竞争场所。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远东扩大这场战争只会削弱西方对抗苏联的能力，而且如果把更多的部队投入一个次要战场，结果势必危及欧洲。政府还认为，对中国和朝鲜使用原子弹，就要冒不能接受的扩大战争并引起美国盟友反感的风险"（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

史》)。然而，麦克阿瑟仍然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有鉴于此，杜鲁门不得不于1951年4月1日解除这位五星上将的一切职务。

为了适应侵朝战争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951年6月通过了“普遍军训计划”及新的“兵役法”，进行了局部战争动员。1953年6月，美军总兵力猛增至355.4万人，达到战后的最高峰。1953财政年度军费激增至528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例高达69%，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4%，创造了战后的最高纪录。

侵朝战争期间，美军大力发展常规军备，尤其是空军的力量得到迅速的加强。到1952年年中，空军扩充到95个联队，开始大量装备B—47中程战略轰炸机，第一架B—52洲际战略轰炸机也于1952年4月进行了试飞。与此同时，美积极研制氢弹，并于1952年10月31日在南太平洋的恩尼维托克岛上进行了首次试验。1952年美还制成了280毫米原子炮，并着手研制可以发射核弹头的战术导弹。

四、“遏制战略”遇到的问题

“遏制战略”的推行增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包围。但是，“遏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1、苏联迅速打破美国核垄断，对美国提出了新挑战

杜鲁门政府低估了苏联的军事科技潜力。“大多数美国人、甚至知情者都盲目夸大美国可能持续垄断原子弹的时间。”(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出乎美国意料之外，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宣告美国核垄断地位的破产。苏联拥有原子武器，使美国本土从此丧失了得天独厚的“战争庇护所”的地位，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建立在传统的常规战争构想基础之上的“遏制战略”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就核武器的发展和应用制定相应的核战略。

2、东亚形势急转直下，“遏制战略”出现严重危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解放战争的

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东方战线上给了美国“遏制战略”致命的一击。侵朝战争是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重要体现。但是，在中、朝人民的联合打击下，侵朝美军和“联合国军”节节败退。“朝鲜战场没有象麦克阿瑟指望的那样被封锁而得不到增援和给养。大批中国军队迫使美军一直溃退到三八线以南才停了下来，汉城再次失守，面对这种意料不到的灾难，麦克阿瑟一反乐观主义的态度而陷入绝望之中。”“杜鲁门政府认为朝鲜和亚洲不是与共产党人拼搏的主要战场，而是一个牵制性战场。他们仍然惧怕苏联对西欧和美国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杜鲁门政府把1951年说成是美国的“危机年”。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首次在没有获胜的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3、美领导集团围绕国防政策发生激烈争论

杜鲁门执政期间，美国防部长曾四易其人，反映出领导集团内部对“遏制战略”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1947年，美国国家军事部设立后的第一任部长由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出任，但是，福莱斯特尔无法弥合分歧。陆军和空军都赞成制订一个强有力的联合计划，而海军却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因联合而受损。芬勒特委员会和布鲁斯特一欣肖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导致海军和空军之间就各自的战略任务发生争执。空军赞同上述两项报告的基本结论，指责海军发展战略轰炸机和超级航母是想抢夺空军的特殊使命。福莱斯特尔于1948年3月主持召开了三军参谋长基韦斯特会议，明确三军的任务区分，但三军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福莱斯特尔于1949年3月27日辞职。一年多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生涯使福莱斯特尔失去了心理平衡，两个月后他因神经失常而从16层楼上跳楼自杀。

福莱斯特尔的继任者路易斯·约翰逊任职期间，三军争论有增无减。约翰逊上任不久就撤销了海军超级航母的建造计划，触发了“海军将领的反叛”。海军的一些将领们联名抗议，迫使国会

进行调查。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和侵朝战争爆发，加深了美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杜鲁门为了推卸责任，于1950年9月19日把约翰逊当作替罪羊解职，将马歇尔由国务卿调任国防部长。1951年9月12日马歇尔退休后，由其副手罗伯特·洛维特继任。这时，又爆发了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关于朝战方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后以麦克阿瑟被解除一切职务而告终。

由于"遏制战略"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问题，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根据苏联可能拥有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生产能力，着手复查美国在平时和战时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对美国战略计划的影响"。据此，美国务院和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小组，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保罗·尼采的主持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全面审议。同年4月7日，尼采特别小组向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个题为《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计划》的报告，即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再次肯定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必要性，认为"面对苏联扩张主义和日益增长的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力量，美国有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1) 无所作为；(2) 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3) 退缩至西半球；(4) 增强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实力和国力，以矫正力量失衡。文件否定了前三种选择，肯定了第四种选择，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无须进行战争就可以既遏制苏联的扩张，又通过以持久的实力与苏联相对抗，逐渐对它施加影响，迫其改变苏维埃制度。美国应当扩大进行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能力，目的在于造成一种军事均势。这种均势将不把军事实力用于战斗，而是借用军事实力去遏止战斗，然而又能使美国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文件建议："(1) 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2) 在加强力量的同时，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进行谈判。这样既可赢得舆论的支持，又可减少发生战争的危险。(3) 大量增加税收

以支持军费开支。(4) 在美国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体系。(5) 从内部破坏苏联集团的制度"(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杜鲁门于1950年4月25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一文件专门进行了讨论，然后签署了这一文件，同意将其作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对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重大修补，更加强调以军事实力作为推行美国全球战略的后盾，其"借用军事实力去遏止战斗"的思想为美"威慑"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简短的评论

1、"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这种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合二为一的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防机构去规划和运筹统一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均由国家最高行政首脑总统提出和制定。

2、"遏制战略"的提出，在政治上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在军事上表明两大阵营以欧洲为重点的重兵对峙格局初步形成，在外交上反映出美苏战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加剧。从美国把苏联当作主要对手加以遏制这一战略目标看，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80年代末，美国军事战略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为达此目标的手段虽不断翻新，但遏制思想却贯穿始终。联盟战略、前沿部署、对外援助、基地体系等许多重要的战略原则，也都是在"遏制战略"时期就确定下来的。1986年11月美国防大学出版的题为《遏制战略的理论与政策》一书认为，美国后来形成的"威慑战略"实质上就是"遏制战略"的发展。

3、《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一书认为，"遏制战略"和"威慑战略"一样，都是"一种消极的、防御的、甚至被动的战略"，其着眼点是苏联的影响在哪里扩大，美国就在哪里进行遏制和防

堵。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的发展尚处于不甚完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处于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战略向战后的平时战略、从传统战略向核时代战略的过渡阶段，美国系统的核时代的国家战略体系尚未形成，因此“遏制战略”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内在矛盾。例如，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却在亚洲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准备的是全面战争，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确立全新的战略思想，但对于未来战争的设想仍是依靠传统的动员战略；发展核武器需要大量投资，但从事常规战争却占用了大量国防经费，等等。“遏制战略”既未能限制苏联实力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也未能将新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和美国侵朝战争的失败，标志着“遏制战略”的破产。

第九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1952年4月29日，艾森豪威尔辞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职务，返美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在竞选中作出“结束朝鲜战争”、“改变杜鲁门的防务政策”等许诺，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以压倒多数当选为第34任美国总统，并于1953年1月20日就职。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初面临着如下的战略形势。

1、朝鲜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

朝鲜战争的失败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5年，美国再次进行局部动员，对一个小国大动干戈，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先进武器，结果损兵折将，在中朝人民的打击下一败涂地。美国参战兵力累计达572万人，死5.4万人，伤10.3万人，耗资1646亿美元。朝鲜战争的巨额开支导致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侵朝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美国人民举行和平示威大会，强烈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所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2、美国失去核垄断地位，但仍拥有核优势

苏联不仅拥有了原子弹，而且开始拥有远程战略袭击兵器，美国本土成了核攻击的目标，美国核垄断遂被打破。如果说在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候美国还可以没有系统的核战略的话，那么在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之后，美国就不能不去认真考虑和设计核战略，研

究和制定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了。当然，这时美国虽已丧失了核垄断，但还握有明显的对苏核优势。在核武器的生产和储备方面，美国仍遥遥领先于苏联。在核运载工具方面，美空军在1953年初已拥有400架可从世界各地起飞向苏联本土投掷核武器的喷气式轰炸机。相比之下，苏联的核储备不仅极为有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核运载工具仍较落后。

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产生经过

艾森豪威尔上台不久，即指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新形势制定一项新战略。1953年5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计划委员会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其中心思想是强调更加依赖战略空军和核力量。同年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在海军部长的"红杉"号游艇上召开的会议提出一项被称为"红杉计划"的战略报告。该报告同样强调进一步发展战略空军，主张依靠盟军进行地区防御，加强美本土战略预备队，减少海外驻军，以节约美国的军费开支。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和"红杉计划"，决定放弃在象朝鲜战争那样大规模的有限战争中不使用核武器的方针，改取无论何时只要军事上需要就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不仅强调使用战略空军投掷的核武器，而且强调广泛使用刚刚投入现役的战术核武器；不仅重视在全面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且要求在有限战争中也使用核武器。由于打算在各种情况下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核武器，美军就没有必要拥有大量常规部队和庞杂的常规武器，从而既可减少美国的军费开支，又可以使敌人因惧怕遭到核打击而不敢轻举妄动。

在上述一系列研究和文件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4年1月12日，在纽约外交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外交政策的演变》的演说，公开阐明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主张。他说："为了保证维护永久安全所必要的持久力量，迫切需要改变方针"；"永远把美国陆军放在亚洲，使我们没有战略预备队，不是一个妥

当的军事战略。永远支持其他国家，也不是妥当的经济政策或外交政策。永远支出巨大得足以引起实际上的破产的军事费用也是不妥当的"；"地方性的防务始终是重要的。但是，仅仅地方性的防务决不能遏止共产主义世界庞大的地面部队。地方防务必须有进一步的具有巨大报复力量的阻遏力来加强"。"目前的基本决定是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杜勒斯的这一讲话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权威性论述。

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概括地说，这个新原则是这样的：我们不让共产党在全世界各地发动小规模的战争，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置于死地；我们将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机动报复力量，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与地点来对付侵略的主要策源地"（1954 年 3 月 14 日《纽约时报》）。

三、"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1、侧重打"闪电"式的全面核大战

"大规模报复战略"改变了"遏制战略"侧重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样式的常规大战，转而依仗美国的核优势玩弄核讹诈政策，明确提出以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为中心来制定全盘战略计划；要么不打，要打就是"闪电"式的全面核大战。在核武器的使用上，强调在战争初期以战略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速战速决，要求具有一举摧毁敌人主要工业生产基地、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部队，使对方丧失还击能力的"第一次打击能力"。

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设想的未来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不经过传统的明显的威胁阶段而突然爆发；交战双方的前后方都会同时遭到攻击，美国本土也不例外；战争的破坏力大，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在短期内就会遭到摧毁；战争进程短促，几个月就可决定胜负。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甚至认为，"未来大战中任何一方，只要发起 2～3 次核突击就能取胜。大战只要几天就可结束"（1958

年4月1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说:"新的战争一定会从美国遭到突然袭击开始,这是战后美国战略思想的基本概念";"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对侵略者施以最大限度的破坏,我们最优良的战略是用核武器轰炸敌人的工业潜力"。

2、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大力发展核武器,维护美国的核优势地位,威慑苏联使之不敢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一旦威慑失灵,美将以核力量为"剑",以常规力量为"盾"对苏进行大规模报复,克敌制胜。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美国的导弹核武器发展很快。三军的导弹采购费用从1953财政年度的2.95亿美元猛增至1957年度的20.95亿美元;同期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费用从9.95亿美元增至13.9亿美元。1954年2月至5月,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比基尼和恩尼威托克岛进行了6次氢弹试验,最大的一次当量达1500万吨。1956年5月4日,美国又在恩尼威托克岛进行了首次氢弹空投试验,氢弹从此进入实用阶段。美国核武器生产数量逐年增加,品种和型号逐年增多。到1960年,美国已制成当量由数吨至千万吨级的各型战略、战术核弹头,包括航空炸弹、核炮弹、核地雷、核鱼雷、深水核炸弹以及导弹和火箭核弹头等,共约3.5万枚。

在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1954年以后,美国加紧研制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和各种战术导弹和火箭,并陆续装备了三军部队。到1960年,陆军装备的战术核武器有"红石"、"下士"、"曲棍球"导弹和"诚实约翰"、"大卫·克罗克特"火箭,以及能发射原子炮弹的280毫米原子炮和203毫米榴弹炮。海军装备的核武器有"北极星"战略导弹潜艇、"天狮星"巡航导弹潜艇和攻击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和攻击潜艇陆续装备了防空、反潜等各种导弹和火箭,战略空军装备了"斯纳克"飞航式导弹、"宇宙神"远程战略

导弹、“雷神”和“丘比特”中程导弹。战略轰炸机部队装备了“大猎犬”空对地导弹；战术空军装备了“斗牛士”和“马斯”战术导弹、“响尾蛇”、“猎鹰”、“巨隼”等空对空导弹和火箭。导弹、核武器的大量装备三军，改变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只有空军拥有导弹核武器的状况，并开始形成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导弹潜艇“三位一体”的战略袭击兵器体系。

为了适应核力量的发展，美国于1960年12月成立了直属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负责制定“统一战略计划”，确定战略核袭击目标清单。

3、削减军费和现役兵力，扩充后备役人员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费开支又逐年下降，由1953财政年度的528亿美元降至1960年度的481亿美元，军费占政府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从69％和14％降至52％和9％。为了将更多的军费用于发展导弹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幅度削减了三军现役兵力：由1953年6月的355．4万人减至1960年6月的247．6万人。

为了适应战时迅速动员的需要，美军在削减现役兵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后备役人员。1954年至1960年，美军各类后备役人员由248．6万人增至414．6万人。其中联邦后备队由209．8万人增至366．8万人，国民警卫队由38．8万人增至47．8万人。在三军后备役部队中，美国着重扩充陆军后备役部队。1960年底，陆军第一类后备役兵员达144万人，编有50个师、8个装甲骑兵团、11个独立旅和其他独立单位。

4、大量压缩陆军，重点发展空、海军

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杜鲁门政府三军均衡发展的原则，重点发展空、海军，大量压缩陆军。从1953年6月到1960年6月，陆军兵力减少了66．1万人。陆军现役师由19个减至14个。在这14个师中，只有驻欧洲的5个师和美国国内的1个师齐装满员。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期间，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兵力

和军费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2 年 6 月至 1960 年 6 月，陆军在三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 44%降至 35. 2%，军费由 157 亿美元下降至 93. 9 亿美元，在军费总额中所占比重从 40%下降至 22%；海军在三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 29%上升到 31. 9%，由于发展“北极星”核动力导弹潜艇，海军军费由 99. 3 亿美元上升到 116. 4 亿美元，占军费总额的比例由 25. 6%上升到 28%；空军 在三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增加最多，由 27%增至 32. 9%，军费由 127. 4 亿美元猛增至 190. 6 亿美元，占军费总额的比重由 32. 8%上升到 46%，几乎相当于陆、海军军费的总和。

5、扩充海外军事基地，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包围

为了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谋求建立区域性联盟和签订军事条约，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增建战略轰炸机和中程导弹等军事基地。

1953 年 10 月 1 日，美国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 年 9 月 8 日，美国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 、泰国等国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防务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 年 12 月 2 日，美国与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5 年 11 月 21～22 日，伊位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英国等巴格达条约国举行部长会议，宣布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后又参加了该组织的几个委员会。1959 年 8 月 19 日，该组织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1960 年 1 月 19 日，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新的“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美国在英国、西班牙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战略导弹潜艇基地，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建立了中程导弹基地，在西德、南朝鲜、冲绳和台湾建立了战术导弹基地，在日本、冲绳和关岛增建了战略轰炸机基地，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包围。

6、在第三世界主要依靠当地人打局部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强调，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武装斗争，主要依靠当地武装进行镇压，美国主要以核武器相威胁，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因此，美逐步减少了海外第一线的兵力，使之占美军总兵力的30%左右。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称，“美国的政策是鼓励各国建立自己足够的部队，以便在正常情况下能维持社会治安，并且能在没有外来大规模干涉的情况下对付叛乱或颠覆活动等地方性麻烦。如果当地人民有困难，美国愿意随时提供轻型部队予以帮助”。

为了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杜勒斯在1956年1月16日的对外政策演说中提出了“战争边缘政策”。他说：“当然，我们过去曾被带到战争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而又不卷入战争的本领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掌握这种艺术，你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如果你企图从那里跑开，如果你害怕走到边缘上，你就失败了。”“战争边缘政策”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具体运用，它力图以大规模的核报复相威胁，“走到战争边缘”，而又尽量避免卷入战争。

7、围绕使用核武器考虑作战行动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下，美军在作战行动方面强调突然性、机动性等一些原则，否定了陆军关于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兵器的观点；重视突然使用核武器以粉碎当面之敌，然后向战场全纵深实施快速进攻，消灭敌军基本集群，占领重要政治经济中心，迫敌投降。为此，美军组建了专门适合原子条件下作战的机动性强的五群制师。每个师编有火箭核武器，减少了常规火炮，在攻防战斗中均强调大量集中使用核武器。例如，师在进攻中可得到5～7枚核弹的加强，从而大大提高了师的进攻能力。军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都围绕利用核突击效果来制定。

四、“大规模报复战略”遇到的问题

1、美苏间“相互威慑”的战略格局开始形成，动摇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

"大规模报复战略"依靠占优势的核武器作为进行威胁和讹诈的"绝对武器"。然而，美国领导人低估了苏联发展核武器的潜力。苏联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又于1953年8月12日试验成功氢弹，只比美国晚10个月。不仅如此，苏联在发展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的步子比美国还要快。1957年10月4日，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表明苏联巨型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走到美国前面。美国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已经靠不住了，美国可以"报复"苏联，苏联同样可以回敬美国。1955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查了美国的军事政策，首次正式承认美苏之间出现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美苏在遭到核突袭后，仍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报复能力，因此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界强烈要求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重新审查，就连最早提出这一战略概念的杜勒斯也改变了看法。他在1957年10月美《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称，今后美国"有可能减少对大规模报复力量威慑作用的依赖"，运用"机动的或配置于适当地点的战术核武器来保卫美国的安全"。1959年4月15日，杜勒斯辞职，新任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对国会说："我不能想象会有任何一个总统要使我们卷入一场全面的核战争，除非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自己正处于遭受彻底毁灭的危险之中。"这些言论都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信念已经动摇了。

2、对局部战争缺乏对策，常规力量受到削弱

"大规模报复战略"认为，只要拥有强大的核报复力量，就可以威慑对方，使之不敢发动任何战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处于既不敢打核大战，又无力应付局部地区冲突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任期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局部地区冲突，例如1954年4月越南抗法的决战——奠边府战役、1956年10～12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以及第二次中东

战争等，都显得十分被动，拿不出有力的对策。

实践表明，世界所面临的最经常、最现实的战争危险还是来自局部的、有限的、地区性的常规武装冲突，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却强调要么不打，要打就是全面核大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片面强调了导弹核武器的发展，而对付常规有限冲突的能力却受到削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5年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报告中承认，"除非美国发展适用于有限战争的多种能力的常备部队，否则美国也只好在大规模毁灭和屈服于局部侵略之间作出抉择"。

3、盖瑟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的军力已落后于苏联，出现了"导弹差距"

1956年春，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一个由实业家罗恩·盖瑟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全面审议。1957年10月，盖瑟委员会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不久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导弹差距"问题，认为苏联卫星上天表明，苏联在弹道导弹的研制方面已领先于美国，美国在核潜力和常规战争能力两方面都危险地落到了苏联的后面；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一直过于依赖战略空军司令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而未能对于遭到苏联核突袭后的还击能力给予足够的重视。报告建议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重点发展生存能力强的"第二次打击核能力"，并加强应付有限战争的常规能力。盖瑟委员会的报告为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人提供了有力武器。无独有偶，1958年1月，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国防政策研究机构，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盖瑟委员会基本相同的结论，既要求修改核战略，又要求重视打有限战争的能力。

4、"大规模报复战略"受到军内外人士的强烈抨击

"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不久，就受到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的批评。乔治·凯南在1954年所著《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一书中

写道，"总体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有限军事行动是唯一可以达成任何真正目标的战争"。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伯纳德·布罗迪1954年11月在一篇题为《无限的武器和有限的战争》的文章中，对于核报复力量能否有效地遏止有限战争深表怀疑。同样的论点在一些非官方的"独立分析家"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他们都不同意那种认为核武器是一种"战略上的万全法宝"的看法，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不得要领的战略"，他们认为今后"更可能发生的仍是有限战争"。

在军队内部，争论尤为激烈。空军将领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坚决支持者，而陆军将领一直持反对态度。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坚决反对过分依赖核武器以致削弱美军应付有限战争能力的做法，并于1955年忿然辞职。马克斯韦尔·泰勒接任陆军参谋长后，更与艾森豪威尔的战略主张大唱反调。在历次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泰勒都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严厉的抨击。1956年，泰勒曾为《外交》季刊撰文，披露美国领导集团在战略上的分歧，但该文因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干预而未能公开发表。1959年，泰勒在担任4年陆军参谋长退休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题为《音调不定的号角》的理论专著，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全面系统的公开批判。至此，"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彻底修订已在所难免。

五、简短的评论

1、"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战略和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核战略，均是很不完备的。首先，"大规模报复战略"缺乏对付局部战争和常规冲突的有力对策，把复杂的军事战略问题归结为简单的依靠核武器这种"万应灵药"。其次，即使从核战略的角度看，"大规模报复战略"也过于简单化了，声称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核大战，妄图依靠挥舞核大棒吓倒对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可信性是很低的。泰勒认为，"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意大利杜黑将军的"空权论"的继续和发展，它把战略轰炸奉为

致胜之本（泰勒著《音调不定的号角》，1959年版）。

2、如果说美国的军事战略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尚和国家战略混为一体的话，那么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军事战略已与国家战略区分开来。“大规模报复战略”从属并服务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战略——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削减军费开支，增强美国经济实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美国第一线的防御是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军费开支过大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里科德著《修改美国军事战略》）。依赖核优势，集中发展核力量，削减常规力量，正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节省军费开支的一项主要措施。然而，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军事战略仍基本上是由国防部以外的文职官员提出和制定的，国务卿杜勒斯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从战略决策程序的角度看，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分家”尚未完成。

第十章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

一、肯尼迪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1960 年 11 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以微弱多数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5 任总统。肯尼迪政府是美国在国际上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上台的。

1、第三世界广大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1955 年的万隆会议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推向高潮。1956 年，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先后独立，埃及赶走了英国老牌殖民主义的势力。1957 年，加纳独立。1958 年，几内亚独立，黎巴嫩人民推翻夏蒙反动政府，伊拉克自由军官推翻费萨尔反动王朝。1959 年，古巴共和国成立。仅在 1960 年 1 年内，非洲就有 17 个国家宣告独立。1961 年 9 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不结盟运动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实践表明，"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制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核武器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肯尼迪在 1961 年 1 月 29 日提出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过去 10 天的分析表明，在每一个主要的危机地区，时势的潮流一直在下落，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在老挝寻求给予人民以自由，给予他们的政府以独立。在非洲，刚果发生了内讧、政治骚乱和社会混乱。在拉美，共产党代理人已经在离我们的海岸只有 90 英里的古巴建立了基地。为了对付这一连串的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检查和改善我们的全套工具——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这三者同样重要"。

2、美苏争夺势力范围和军事优势的斗争愈演愈烈

1959年9月15～27日，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战后美苏首脑的首次会谈，但会谈在美苏关系方面未获任何实质性进展，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苏联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则力求维护其霸权地位，保住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从60年代初开始，美苏都竭尽全力发展以“三位一体”的战略袭击兵器为中心的导弹核武器，展开空前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导弹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装备都达到了新的高潮，数量的增长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美国的核武库在60年代初期达到了高峰，计3.5万枚，总当量约300亿吨，苏联的核武库也迅速扩充至2万枚，总当量约200亿吨。美苏之间逐步形成了“相互威慑”的战略格局。

另一方面，继盖瑟委员会之后，肯尼迪也于1958年提出了“导弹差距”的问题，他指出：“美国正在迅速地走向导弹落后于苏联的危险时期”；“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将失去其大部分作用”；“到总统选举年的1960年时，美国核报复力量的脆弱性和据推测的苏联核运载能力的领先地位，即所谓导弹差距，已经变成了战略研究的主题，并且正在进入竞选运动的公开辩论”（韦格利著《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基辛格在《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写道：“关于导弹差距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论。一般认为，从1961年一直到1964年底，苏联拥有的导弹比美国多。唯一的争论在于这种差距的意义。”尽管事后证明，当时所说的“导弹差距”并不存在，苏联的导弹核力量显然是被夸大了，但美国的核优势的确已大为削弱。美苏间“相互威慑”战略格局的出现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灵活反应战略”的产生经过

1959年12月，美前陆军参谋长泰勒出版《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猛烈抨击“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用“灵活反应战略”取

而代之。泰勒在书中写道："我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来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它只能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却未能保住小和平，即没有消除局部地区的骚乱。……因此，我建议用'灵活反应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泰勒的上述主张由于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变化，迎合了美国大垄断财团、尤其是在亚非拉有着广泛利益的洛克菲勒财团的需要，因而得到美国政界和战略界的广泛支持。

肯尼迪原为民主党参议员，他在美国的战略大辩论中积极支持泰勒的观点。1958年8月14日，肯尼迪在参议院关于"导弹差距"的发言中，也尖锐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一直处于一种困境"，只能在"要么毁灭世界，要么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必然是使美国在战争边缘上犹豫不决，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我们的敌人"。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放松了军事力量建设，致使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导弹差距"，美军的常规力量也"不断遭到削弱"。这样，苏联就有可能"通过卫星外交、灌木林火式的有限战争、间接的非公开的侵略、恐吓、颠覆、内部革命、提高威望或影响，以及对我们的盟国进行恶毒的讹诈等手段缓慢而稳步地前进"，使"自由世界的边疆慢慢地被吞食掉"（肯尼迪著《和平战略》）。

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全盘接受了泰勒的战略主张，决定采纳"灵活反应战略"作为肯尼迪政府的军事战略。为了贯彻这一套新的战略思想，肯尼迪重新启用已经退休的泰勒，任命他为总统军事助理。1962年10月，他又破例让泰勒重新挂起现役上将军衔、并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三、“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1、全面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

“灵活反应战略”从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出发，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把战争样式区分为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三种。核大战指的是美苏都直接卷进去的、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有限战争指的是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武装冲突，美国无须全面动员，只需派出有限的部队就可应付。特种战争指的是正规战争以外的战争，如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等。

肯尼迪政府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发展方面重核轻常规的做法，主张“保持一支强大的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和一支能够进行广泛军事活动的军队”(1962 年 8 月 23 日肯尼迪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上的讲话)，即建设一支用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以便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用适当的武器和部队打任何样式的战争，既能打核战争，也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正规战争，又能打特种战争。

2、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方针

肯尼迪政府认为，核大战虽仍有可能发生，但不大可能是有计划、有预谋地突然爆发，而很可能由常规冲突升级引起。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 1960 年以前，几乎所有的战略分析人员都以为未来的核战争将会突然地大规模地爆发，从突袭美国本土开始，报警时间只有 15 分钟，到了 60 年代，随着战略思想的变化，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认为，在核恐怖均势下，苏联对美国发动一场事先计划好的全面核袭击的可能性较小，较大的可能是由欧洲爆发两大集团的常规战争，彼此动用战术核武器，进而导致美苏核大战。这种观点已在美国被普遍接受。”(1969 年 10 月兰德公司研究报告《限制核战争的破坏》) 美国陆军 1962 年版《作战纲要》也指出，“全面战争是敌对的大国或联盟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所进行的武装冲突，其特点是不受限制，而且双方都使用核武器袭击对方的本土”。《作战纲要》特别指出，只有

“当国家不能以其他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才进行这种战争。美国当时的全面核战争计划，是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中国为次要作战对象，苏、中的战略目标都列入美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拟订的“统一作战计划”之中。

肯尼迪政府上台不久，东西方之间就发生两次严重的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都曾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61年6月，当时赫鲁晓夫提出限期半年内签订对德和约，变西柏林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突击修筑了“柏林墙”。于是，肯尼迪宣布提高战略部队战备等级，增派部队进入西柏林，并征召25万名后备役人员入伍，扬言美国“将为保卫柏林而战斗”，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最后，由于赫鲁晓夫宣布取消签订对德和约的限期，危机方告缓解。

1962年10月，又发生了美苏关系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古巴导弹危机。10月14日，美国U－2飞机侦察确认，苏联在古巴已秘密部署了30余枚射程为2200公里的中程导弹，具有摧毁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杀死美国8000万人口的潜力。10月23日，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行封锁，海军180艘舰艇进人加勒比海海域，战略空军的B－52轰炸机装载核弹升空值班，10个陆军师开始向佛罗里达州调动待命。在美国的战争威胁下，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下撤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危机始告结束。

形势的发展要求美国制定新的较完整的核战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针对美苏“相互威慑”的战略态势，首先于1962年提出了一个“限制毁伤”的核战略方针，主张在核战争中用进攻性核武器先行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摧毁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基地，以减少对方还击时美国所遭受的损失。他于1962年6月在密执安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已得出结论，认为在可行的限度以内，应该以与过去看待比较常规的军事行动计划几乎相同的方式去看待一场核大战的基本军事战略，也就是说，因大规模进攻而引起

的核战争的主要军事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人口。联盟军事力量本身的实力和性质使我们即使面对大规模突然袭击时，也还有可能保留足够的打击力量，并在一旦迫不得已时摧毁敌国社会。换言之，我们正在给予某个潜在对手最强不过的刺激，使他们不敢攻击我们的城市。”麦克纳马拉这一“限制毁伤”的理论要求加强防空、反导弹和民防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防微粒掩蔽部，要求为美国 1/4 的人口提供防护。

由于打击军事目标所需的核武器数多质高，费用昂贵，加之当时美国的核武器命中精度尚差，并不具备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因此到 1964 年，麦克纳马拉又修订了核战略方针，正式提出了“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改为以城市和工业中心为主要核打击目标，以在报复性核打击中摧毁对方城市相威胁，使对方不敢对美国发动核袭击。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应拥有一支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在还击中一举摧毁苏联 20～25%的人口和 50%的工业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毫无疑问，这么重大的损失对于任何一个 20 世纪的工业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损失。”(1969 年度美《国防报告》)由于美苏都具有了这种第二次打击能力，用美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话说，美国和苏联就象“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除非想自杀，否则谁也不会轻易去攻击对方。因此，这种互以对方城市作为“抵押品”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又被称为“打击财富战略”或“相互威慑战略”。

为了建设一支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力量，美国大力加强了“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1961 年至 1968 年，美国战略导弹由 159 枚增至 1710 枚，其中洲际导弹由 63 枚增至 1054 枚，潜射弹道导弹由 96 枚增至 656 枚。至此，美战略导弹数量已达饱和，不再增加，重点转向提高质量，发展生存能力较强、命中精度较高的“民兵”Ⅱ型洲际导弹和“北极星”A3 型潜射战略导弹，陆续淘汰隐蔽性差、反应时间较长的“宇宙神”和“大力神”Ⅰ型洲际导弹和“北极星”A1、A2 型潜射导弹。60 年代后

期，美又开始研制“民兵”Ⅱ型和“海神”多弹头战略导弹。在战略轰炸机方面，美国将850架B—47中程轰炸机全部退役，大量装备B—52远程轰炸机，并开始生产FB—111可变翼战略轰炸机。在战略防御力量方面，除继续改进对付轰炸机入袭的北美防空体系外，大力研制“奈基”X反导弹系统。为了提高战术核武器的威力，美军更新了地对地战术导弹。1962年，美开始用“中士”和“潘兴”等第二代战术导弹取代“诚实约翰”和“小约翰”火箭。此外，美还新增 加了可发射原子炮弹的155毫米火炮。

3、以同时打“两个半战争”作为常规作战的指标

“灵活反应战略”以能够同时打“两个半战争”作为常规作战的指标，即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同时在第三世界打一场较小规模的常规战争。因此，60年代美国的常规战略又被称为“两个半战争战略”。

肯尼迪政府认为，苏联是美国争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因此，美国必须在欧洲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准备打一场大战。60年代，美国的大部分作战想定、预案和演习，都是以是欧洲局势紧张、苏军进攻西德导致美苏和北约华约两大集团在欧洲打一场大战为背景的。

肯尼迪政府认为，“在亚洲，共产党中国的无情压力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安全”（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国情咨文》）。美国必须在亚洲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准备打另一场大战。

针对亚非拉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肯尼迪政府主张美国应随时准备在这些地区打“半个战争”——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这种小规模局部战争的战场“是在整个地球的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土地上”。

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为满足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需要，美军需要拥有28个地面部队师和41个战斗机联队。“这种能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期内从未达到过。”（基辛格著《白

官岁月》）

4、重点准备打有限战争

美军认为，有限战争就是在"有限的地区"、使用"有限的手段"、进行"有限规模"的作战。美国陆军1962年版《作战纲要》指出："有限战争的特点是，交战双方对于战争的一个方面或数个方面，例如目标、武器、地区或兵力等，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由于限制的程度不同，有限战争的规模、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美国有限战争问题权威罗伯特·奥斯古德在《有限战争：对美国战略的挑战》一书中称，"限制战争的目标是限制战争的关键"，美国迫切需要"制定一种可以对战争实行限制并能胜利地进行有限战争的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核心就是重视有限战争的作用。肯尼迪说，"核大战虽对美国的生存威胁最大，但不是最可能发生的战争，发生较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肯尼迪1963年度《预算咨文》）。肯尼迪政府把有限战争作为推行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认为有限战争既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干预世界任何地方的局部冲突，又可以使战火不致殃及美国本土。泰勒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说，"慑止全面战争是必要的，慑止或迅速赢得一场有限战争同样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那场我们未能迅速取胜的有限战争就会一点一点地消耗我们，或者使我们卷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中去，这场冲突可能会发展成为我们都想避免的全面战争"。

5、重视特种战争手段的运用

肯尼迪政府将特种战争作为向亚非拉进行扩张和对付民族民主运动的一种有力工具。所谓特种战争就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主要利用当地人打当地人的低于正规战争水平的反游击战、"反颠覆"和"反叛乱"等作战行动。肯尼迪政府认为，对付亚非拉人民革命，"不在于使用核武器，甚至也不在于使用庞大的常规部队，而在于综合采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美国除了对亲美

政权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外，在军事上则是“用连、排、班、甚至单兵”进行一种“不象战争的战争”。1961 年 4 月 17～19 日，作为特种战争的一次尝试，美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猪湾登陆，结果被卡斯特罗政府军一举全歼。从 1959 年开始，南越人民展开了反对亲美的吴庭艳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肯尼迪政府从 1961 年 10 月起派出军事顾问团支持南越反动政权打内战，将南越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认为，特种战争是美国“最容易遇到和最可能进行的一种作战行动，这种作战行动所需的部队、装备、训练和战术，同大规模常规战争大不相同”（1964 年 1 月 27 日麦克纳马拉在国会的证词）。为了从事特种战争，肯尼迪政府于 1962 年设立了“特别委员会”作为特种战争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特种战争的基本政策，并协调各部门在特种战争中的活动。陆、海、空三军都建立了特种作战机构，具体执行特种作战计划。在进行特种战争的国家里，成立“国家指导组”，由美国大使领导驻在国所有的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宣传、情报机构进行特种战争的各项活动。此外，陆、海、空三军分别组建了特种部队。陆军特种部队是进行特种战争的主力，1961 年有 3 个特种作战大队、1800 人，1965 年增至 7 个大队、14000 人。空军于 1965 年建成 6 个空中突击中队，约 3000 人。海军特种部队辖有 18 艘快速炮艇。

6、采用“逐步升级”的作战指导思想

1965 年，美国哈得逊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康恩在《论逐步升级》一书中“用比喻性的阶梯表明，在低级危机和全面战争之间有许多相当连续的道路。这些道路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非通过不可，但是却有可能要通过”。康恩设想，从低级危机到全面战争之间，可区分为以下 6 道门槛、7 个阶段和 44 个阶梯：

（1）由冷战进入危机潜伏期，包含政治、经济和外交姿态等 3 个阶梯。

（2）跨过局势平衡的门槛，进入传统性的危机，包含显示实

力和军事对峙等 6 个阶梯。

(3) 跨过核战争不可设想的门槛，进入危机深化，包含常规战争、核最后通牒等 11 个阶梯。

(4) 跨过不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进入危机激化，包含有限核战争等 5 个阶梯。

(5) 跨过本土庇护所的门槛，进入惩戒性的全面攻击，包含攻击少量城市和工业中心、全民疏散等 6 个阶梯。

(6)跨过全面战争的门槛，进入攻击军事目标的全面战争，包含大规模攻击城市和工业中心等 6 个阶梯。

(7) 跨过不全面袭击城市的门槛，进入攻击民用目标的全面战争，包含大规模攻击城市和工业中心等 6 个阶梯。

康恩的"逐步升级"理论是灵活反应战略的具体化，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逐步增大军事压力，逐步扩大战争，力求把军事行动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约翰逊政府在南越战场上就是根据逐步升级的理论，将特种战争逐步升级为有限战争的。

7、以常规部队为"剑"，以核力量为"盾"

泰勒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写道："在未来的战争中，打有限战争的部队将起积极的作用，而原子报复力量则只起消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欧洲和远东的地面部队是美国赖以使其原子宝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盾牌。而现在，它的任务已经改变，原子报复力量已经变成击退敌人原子攻击威胁的防御盾牌，而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则是一把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所以，这把宝剑的质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义。"

为了加强常规部队这把宝剑，美国军费又连年增加，由 1960 年度的 481 亿美元增至 1969 年度的 825 亿美元。三军兵力也不断增加，从 1960 年 6 月的 247 万人增至 1968 年 6 月的 354.7 万人。三军之中，陆军建设处于突出的地位，因为当局要求陆军的现役兵力必须"能保证在不征召第一类后备役人员服现役的情况下，应

付在世界相距很远的几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紧急情况”（1962 年 10 月 8 日美陆军参谋长泰勒在陆军协会年会上的讲话）。1961 年至 1968 年，陆军现役兵力增加了 98 万人，现役作战师由 14 个增至 19 个，独立旅由 2 个增至 10 个。1964 年，陆军师又由“五群制”全部改编为“三旅制”，增加了常规火炮和轻武器数量，并提高了机动能力。与此同时，海、空军的实力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6、麦克纳马拉对国防部的改革

麦克纳马拉原任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1961 年起担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达 7 年之久，他把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套经验应用于国防部，对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制定以及国防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被称为“麦克纳马拉革命”。

麦克纳马拉用系统工程和运筹学等科学方法，设计整个军事改革的蓝图。在纵的方向上，依据对未来国防战略环境的预测，以国家战略为指针修改和制定军事战略，然后再依此制定作战预案和军队建设计划，进而拟制编制、训练、武器系统研制等改革计划。在横的方向上，打破军种界限，按照平时管理及未来作战的需要，把整个国防大系统按职能分为战略部队、一般任务部队、情报和通信、空海运、后备役部队、研究与发展、补给保养、训练和医疗、行政管理和军援计划等 10 个分系统，再根据对国防系统整体优化的原则，确定每个分系统的任务及其组成。

“麦克纳马拉革命”把军事战略、国防预算、部队需求和武器研制有机地联系起来，把远期、中期、近期计划紧密地衔接起来，建立了统一完整的“规划、计划和预算制度”。从 1962 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制定一次“国防报告”，包括当年的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军事预算、三军建设、装备发展、全球部署以及今后五年的国防规划，等等。麦克纳马拉所确立的“规划、计划和预算制度”使美国国防部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工作趋向集中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对美军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并一直沿用至今（约顿和泰勒著《美国国家安全》）。

9、北约采纳“灵活反应战略”作为联盟的共同军事战略

1967年12月，北约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采纳“灵活反应战略”作为北约联盟的共同军事战略，以取代1956年以来北约所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根据“灵活反应战略”，北约将担负中欧战区作战的部队编为4个梯队：在西德东部前沿部署的地面部队担负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由直升机运载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组成的预备队，负责为第一线部队提供紧急支援；再后是可以从海上和空中投入战场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是战略轰炸机部队，负责摧毁对方纵深内的战略目标。一旦欧洲发生战事，将按照灵活反应和逐步升级的战略思想并根据冲突的规模，分梯次将部队投入作战。如果判定对方发起了全面战争，则可动用西欧的战术核武器、甚至美国本土的战略核武器进行攻击。

四、以越南作为“灵活反应战略”的试验场

肯尼迪任参议员时，曾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1954年的决定，不采取直接军事干预行动去救援被困在越南奠边府的法军。但是，肯尼迪在出任总统后却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把越南南方人民反对吴庭艳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渗透扩张”，并依据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断言一旦南越吴庭艳政权垮台，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就会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在越南问题上，肯尼迪政府既错误估计了形势，又推行了错误的政策和战略。肯尼迪上台伊始，即决定把南越作为“反叛乱作战”的特种战争试验场，扬言要在18个月内“平定南越”。1961年10月，肯尼迪采纳了泰勒到南越考察后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吴庭艳政府增加援助，并增派顾问人员。1962年2月8日，美成立驻南越“军援司令部”。1963年11月肯尼迪被刺身亡时，美在南越的“军事观察员”已增至23000人。

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于1964年8月5日借口美国1艘驱逐舰遭到越南北方鱼雷快艇袭击的“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进

行大规模空袭。1965 年 3 月，美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在南越登陆，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1968 年约翰逊政府下台前夕，侵越美军兵力已增至 54 万余人。陆军 19 个师中有 7 个师，陆战队 3 个师中有 2 个师，空军 28 个战斗机联队中有 9 个联队，均在越南参战。约翰逊政府原打算在 1 年之内解决战事，然而事与愿违，战争逐步升级，越打越大，美军在越战泥沼中越陷越深。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连遭挫败，标志着“灵活反应战略”失灵，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陷入了困境。1968 年 2 月 29 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引咎辞职，由克拉克·克利福德接任。1968 年 3 月，美国开始同越南北方在巴黎举行和谈；同年 10 月，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五、简短的评论

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到了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已较为完备，主要表现为：

1、进一步理顺了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肯尼迪政府以软硬兼施、战和并重的“和平战略”作为其国家战略，他在 1961 年 1 月 29 日的《国情咨文》中说，“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握着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束箭。我们要对这两者予以同样的重视”。“和平战略”总的战略企图是：分化中苏、颠覆东欧、控制西欧、接管非洲，重返亚洲，保住拉美，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大家庭”。在“和平战略”指导下，美、苏、英三国于 1963 年 7 月 25 日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和平队”；推行“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灵活反应战略”则是“和平战略”的军事支柱，是总统徽章上美国之鹰爪中的箭。

2、一改过去由国务院官员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先例，军事战略首次由军方人士提出和制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和带头执行者，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的奠基人，又是国防改革的急

先锋。

3、军事战略的内容日臻充实，层次日渐分明。军事战略之下明确区分出核战略和常规战略。在核战略方面，“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尽管仍有浓厚的“大规模报复”的色彩，但在“第二次打击力量”、“有限核战争”等方面颇有创新。常规战略的发展尤为突出，“有限战争”理论得到较充分的论述，“剑盾关系”的摆法比较恰当，“灵活反应”和“逐步升级”的战略思想不失为较有见地的战略原则。迄今，这些原则仍是美国也是北约现行的基本战略原则。

4、60年代“灵活反应战略”之所以失灵，其根本原因是对该战略运用不当。既然美国的基本国策是独霸世界，就应以欧洲为军事战略计划的重点，但执行中却以镇压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为主要对象；本应采用特种战争的手段对付战线不固定的游击队，但却采取了正规消耗战的战法去从事非正规战争，结果在侵越战争中越陷越深。美国国务院顾问巴特勒认为，“灵活反应和有控制的逐步升级的战略对于欧洲型的、势均力敌的敌对双方之间的冲突可能更为适用，而不适用于对付不发达地区的反叛乱作战”（1975年11月美《空军大学评论》）。

第十一章 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时期的"现实威慑战略"

一、尼克松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侵越战争的失败使民主党政府声名狼藉。1968 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多数战胜汉弗莱，于 1969 年 1 月出任第 37 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在美国处于内外交困的战略形势下走马上任的。

1、美国深受"越战后遗症"的困扰

侵越战争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事的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大、花钱最多、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从 1964 年 8 月"北部湾事件"到 1973 年 1 月签署巴黎和平协定，美国先后有 874.4 万人赴越南参战。1969 年，侵越美军最高兵力达 55 万余人。在战争中，美国耗资 3520 亿美元，美军死亡 57718 人，伤 153303 人，比侵朝战争失败得还惨。侵越战争的失败对美国在战略上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深深陷入"越战后遗症"的困扰之中。尼克松声称，"在我就职的时候，美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越南战争。在过去这一年里，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个问题更费我们的心思，更花我们的精力了"（1970 年 2 月 18 日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

在政治上，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再打越战式的战争"已成为美国举国上下一致的口号。尼克松就是打着"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上台的。美国国会于 1973 年 11 月通过《战争权力法案》，力图限制总统用兵的权力，要求总统在派兵卷入外国武装冲突之前同国会磋商，并在出兵 60 天内取得国会批准，否则必须撤军。

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失调的现象。美国的全球军事实力地位，尤其是在欧洲的实力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显然无法再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了”（美副国务卿西斯科 1975 年 5 月 4 日在华盛顿大学的讲话）。

在经济上，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激增，通货膨胀空前严重，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之中。美国经济在世界所占比重急剧下降。1969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20～25%，出口贸易额占 15%，黄金储备占 27%，比 60 年代初期所占比重下降了一半。美国经济大国地位的下降，动摇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2、苏联乘机坐大，取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均势地位

苏联利用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泥足深陷之机，大力扩充实力，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在经济上，苏联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 50 年代初仅相当于美国的 30%上升到 1970 年的约 60%。在军事上，苏联不仅扩大了常规兵力优势，而且在核力量方面也已赶上美国。美国战略导弹数量从 1967 年之后被冻结在 1710 枚的水平上（内含潜射战略导弹 656 枚），而苏联战略导弹数量却在不断增多，到 70 年代初期已达 2358 枚（内含潜射战略导弹 740 枚），而且也拥有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从而使美苏出现了核均势，“相互威慑”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

苏联依仗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逐渐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对此，美国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华尔街日报》刊载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苏联推行一种扩张政策。这种政策在许多方面威胁美国的切身利益：我们在获得原料方面的利益，在战略性的海上和空中联系方面的利益，在保持力量均势方面的利益。苏联不断进逼，来包围北约组织和日本，并且谋求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增强力量”（1975 年 5 月 12 日《华尔街日报》刊载罗斯的文章）。

3、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

60年代，国际关系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一百多个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形成了一支新兴力量，占全世界人口70%以上，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生力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北约集团内部分歧表面化，美国控制能力大为削弱。法国于1966年3月退出北约军事机构，并赶走驻法美军。日、美矛盾也日益加剧。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之间矛盾尖锐化，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兄弟邻国反目为仇，兵戎相见。基辛格说，“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极世界已经消失了。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竞争、军事技术的发展、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已经造成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一个力量多中心的世界，新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世界，它笼罩着核危险的阴影，具有必须互相依靠的新特点”(基辛格1975年6月18日在纽约市日本协会的讲话)。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堪萨斯城讲话，哀叹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明确提出正在形成五大力量中心。他说：“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现在，当我们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时，我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当我们展望今后五年、十年或许十五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被迫进行战略调整，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

二、“现实威慑战略”的产生经过

1、“现实威慑战略”产生的基础——“尼克松主义”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就任总统半年之后出访亚洲途中，在关岛对记者谈话时声称：“众所周知，越南战争是一场可怕

的令人沮丧的战争"；"我们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象在越南那类冲突中去的政策"；"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发号施令"；"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保持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盟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就国内安全问题而言，就军事防务问题而言，除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而外，美国将鼓励，也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尼克松在上述讲话中提出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对外政策咨文中，把本来只是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正式发展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并把"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项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大支柱"。尼克松说："其他国家现在有能力而且有责任应付局部的争端，而过去这些争端可能需要我们进行干预。我们的贡献大小和能否取得成功，将不取决于我们怎样频繁地卷入其他国家的事务，而取决于我们的政策的持久力。这就是我在关岛所宣布的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主旨。它的中心主题是：美国将参加各盟国和朋友的防务和发展活动，但是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负起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只有在我们的帮助真正起作用、而且被认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以帮助"。"首先，美国将履行一切条约义务。其次，如果我们的盟国或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受到一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核保护。第三，至于对付其他类型的侵略，美国将根据有关方面的请求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期望直接受威胁的国家在为自身的防御提供所需人力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由此可见，尼克松已把"亚洲人打亚洲人"

的政策推而广之，发展成为适用于全球的“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政策。“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美国出钱出枪，提供核保护伞和海空支援，驱使盟友打头阵，以仆从替美军，用武器代人力，拿金钱换生命，力图从地区冲突中脱身，以最小的代价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表明，尼克松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实行战略转变，在所谓五大力量的关系格局中玩弄“大国均势”政策，政治上着力利用中苏分歧，军事上把盟友推上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以便纵横捭阖，利用矛盾，争取主动，谋求喘息，恢复实力，重振霸业。实质上，这是“奉行一条介乎充当世界警察和回到孤立主义这样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谨慎的中间路线”(1971年度美《国防报告》)。“尼克松主义”是整个70年代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也是“现实威慑战略”产生的基础。

2、“现实威慑战略”是在推行“尼克松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灵活反应战略”是在肯尼迪上台以前就提出来的。而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经过差不多两年时间的酝酿，才正式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的概念。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咨文中曾提出，“战略理论应该依照苏联战略能力的继续不断增长的情况予以仔细研究”；“为使理论和能力一致，我们选择了最恰当地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我们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一般任务部队，它可对付在欧洲或亚洲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又能援助盟国对付亚非的非中国的威胁，还可应付其他地区发生的紧急事件”。“一个半战争战略”实际上只是美军常规部队的作战指标。1970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又提出美国应采取“零个战争战略”，“要以威慑取代战斗”，回到依靠大规模的核报复来遏止一切战争的老路上去。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直到1971年1月27日，莱尔德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时才提

出以“现实威慑战略”作为70年代美国的军事战略，并正式被尼克松政府所采纳。莱尔德说：“我们将不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但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根据尼克松主义，我们拥有，我们保证，而且我们将使用必要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来补充我们那些决定抵抗侵略的朋友和盟友的武装力量。有了美国的援助，他们将在最大限度内自己进行防务工作，这将成为70年代现实威慑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

后来，莱尔德又对“现实威慑战略”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1972年度《国防报告》中说：“现实威慑战略是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换了包装的过去政策的继续，那就大错特错了。过去的政策是响应性和反应性的，我们的新战略则是积极的和主动的。过去政策的焦点在于遏制和妥协，新战略则强调有分寸、有意义地卷入，并以实力为后盾进行有力的谈判。现实威慑战略将通过足够的实力和全面的伙伴关系为自由世界进行有效的谈判奠定不可缺少的和现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它的目的不在于应付危机，而在于防止战争。”“现实威慑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美国再次卷入象越南这样的局面。”莱尔德在1973年度的《国防报告》中说：“尼克松主义要求重新制定国家安全计划，即强调自由世界国家之间公平分担防务负担。在尼克松主义基础上制定的现实威慑军事战略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一个国家不需要依靠军事力量作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的手段。”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现实威慑战略”和尼克松主义的基本点一样，都是依靠当地人打当地人，避免使美国重蹈越战覆辙。

三、“现实威慑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1、将战争区分为四种样式，重点准备打常规战争

在1973年度的《国防报告》中，莱尔德首次明确将美国可能面临的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样式区分为以下四种：“（1）战略核战争：指美国本土遭到核武器直接攻击的战争，遏制这种战争，主

要靠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2）战区核战争：指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战区核武器，或牵涉到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战区核武器的战争，但不包括对美国本土进行的直接核袭击，美国仍负主要责任，拥有核武器的盟国也负一定责任。美国依靠战区核力量并准备升级到进行战略核袭击来遏制战区核战争。（3）战区常规战争：指苏联或中国直接卷入与美国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非核战争，例如欧洲的常规战争，由美国和盟国共同负责。美国除动用现役常规部队外，还需全面动员后备役部队及大量民用飞机和全部可动用的商船队。（4）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指除了苏联或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以外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在人力方面；但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危害时，美国将给予适当的帮助。为了应付这种战争，美国不需要进行全面动员，主要依靠现役部队。”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均认为，在上述四种战争中，战略核战争对美国的威胁最大，但爆发的可能性最小；战区核战争对美国的威胁较大，但爆发的可能性较小；战区常规战争对美国的威胁较大，爆发的可能性也较大；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对美国的威胁较小，但爆发的可能性最大。因此，美军需要重点准备应付的是常规战争。据此，三届政府都强调建设强大的常规力量。

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莱尔德说：“在70年代，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达到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却增加了。因此，如果要防止战争，我们就必须发展一支现实的可靠的常规威慑力量，我们必须最充分地利用我们世界各地的盟国所拥有的一切力量，以便建立一支威慑力量。”（莱尔德1971年7月27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年会上的讲话）

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说：“本政府军事战略的目标一直是抬高核门槛，而抬高核门槛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强大的常规

力量。如果没有牢固的常规力量地位，就会不由自主地趋向早日诉诸核武器。这是本政府和总统明确予以拒绝的。近年来美国军事战略的主旨一直是要抬高核门槛，以便使我们可以认真地在常规武器方面作出抉择，逐步尽可能地依靠常规能力。”（施莱辛格1975年7月1日对记者的谈话）

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也说：“核均势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人们认识到进行核交锋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只要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的优势，发生核战争的机会就非常遥远，结果是，如果我们将来进行战争的话，很可能还是一场以非核军事力量进行的战争。”（布朗1979年3月21日在休斯顿的讲话）

2、将常规作战指标由“两个半战争”降为“一个半战争”，以欧洲常规大战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基础

尼克松上台后不久，即明确宣布放弃肯尼迪政府确定的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作战指标。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的一般任务部队从未达到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能力；第二，由于中苏分裂，“苏联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应将美军的常规作战指标降为同时应付“一个半战争”（尼克松1970年2月18日《对外政策咨文》）。所谓“一个半战争”，就是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战区常规战争”，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福特和卡特政府继续采纳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构想。

根据尼克松主义“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总方针，“现实威慑战略”强调，对付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直接受威胁的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特别是在提供用于防务的人力方面”。因此，“一个半战争”的指标落到实处成了“一个战争”，美军只需重点准备打一场“战区常规战争”。在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之后，美国判明在亚洲同中国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于是，美国进一步明确，应集中力量准备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战区常规战争。施莱辛格说：“随着我们卷人越南局面的结束，我们

战略计划的重点便转向欧洲。我们军事力量的大部分已经或者很快将会以欧洲的一场战争为目标。”（施莱辛格 1976 年度《国防报告》）他还说“北约是美国承担的主要义务，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从易于受到伤害的角度看，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是欧洲。欧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线”（施莱辛格 1974 年 4 月 19 日在西德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尼克松政府为改变战略重点在欧洲而重兵深陷越南战场的战略失调局面，决心从越战脱身，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从亚洲收缩，加强欧洲。1973 年 1 月 27 日，美、越签署了结束越战的“巴黎协定”；3 月 29 日，美军地而作战部队全部撤离南越。随着美军从越南的撤出，美海外兵力从 1969 年的 125 万人减至 1973 年年中的 60 万人，其中亚太地区美军兵力由 92 万人减至 26 万人，在美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 26．7%降为 11．6%；驻欧美军则从 28 万人增至 31 万人，在美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 8．2%上升为 13．7%，从而改变了海外兵力部署与战略重点不相适应的被动态势。到 1978 年，驻欧美军兵力进一步增至 32 万人，而亚太地区美军兵力进一步减至 19 万人。1978 财政年度，卡特政府的国防预算中用于欧洲方向的为 400 亿美元，而用于亚洲方向的只有 50 亿美元。

卡特政府进一步明确，“美国军事政策的核心是保卫西欧”，美国决心协同北约盟国“在丧失最少领土的情况下，制止华约集团对西欧的大规模进攻，并确保迅速恢复战前边界”。为此，美指定陆军 16 个现役师、海军陆战队 3 个师、空军 226 个战术战斗联队均可全部用于欧洲战区；计划将欧洲的重装备储备由可供 2 个师之用增加到可供 5 个师之用，弹药等军需物资的储备从可供 30 天作战之用增至可供 90 天作战之用。卡特政府还提出了“调拨战略”，表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驻亚太地区的美军将调往欧洲驰援，并一度作出从南朝鲜撤走地而部队的决定，但后来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紧张而未付诸实施。

3、准备打短期战争，强调初战决胜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都认为，未来欧洲战争将是一场激烈而短暂的战争，其理由是：（1）越南消耗战的教训表明，持久作战对美不利，短期战争可以发挥美海空优势，避免人员的大量伤亡，“这是美国人民和国会愿意支持的唯一的一种战争”（1975年6月16日《华盛顿邮报》）。（2）从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来看，现代战争杀伤破坏力大为增强，战斗激烈紧张，作战进程加快。（3）西欧战区纵深不大，西德的蜂腰部纵深只有200余公里，从匈牙利西部边界至法国大西洋海岸约1400公里。当时判断，苏联对西欧很可能打一场不超过1个月的闪击战。美著名政论家米德尔顿在1975年所著《美国能打赢下一次战争吗》一书中甚至预测：“苏军要不了48小时就可以到达莱茵河畔，一星期之内就可以到达英吉利海峡。”

为应付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美军强调初战决胜。施莱辛格说：“华约部队看来是为了进行一场激烈的、短暂的战争而组建起来的。因此，欧洲战争的头几周可能至关重要。”（施莱辛格1976年度《国防报告》）1976年版美国陆军《陆战纲要》指出，“未来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初战”，必须改变“对初战总是无所准备”而待开战后再去进行人力和物力动员的状况，强调平时部署在欧洲的部队在战前就应作好准备，能够顶住苏军装甲集群的闪电进攻，为美本土预备队紧急增援赢得时间。美国国防部《1976财政年度关于人力需求的报告》说：“欧洲可能发生的冲突很可能比以往的任何战争更加激烈，时间要短得多，火力的显著增强导致这样激烈的程度，以致战争的结局很可能在头几天就被决定了。”

4、由继续推行“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到改行“抵销战略”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在大部分时间内，基本上继承了麦克纳马拉所制定的“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奉行“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核力量建设方针。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报复或

有把握在还击中摧毁对方的理论一直在美核战略中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要求在承受苏联大规模突袭后，仍能在还击中消灭苏联1/5至1/3的人口和1/2至3/4的工业能力。”（施莱辛格1975年度《国防报告》）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说：“核大国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在运用战略核部队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战略即相互威慑战略和打赢核战争战略，后者又被称为打击军事目标战略。在我看来，除非美苏能一致同意选择相互威慑战略，并据此组建自己的部队，否则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相互威慑是指交战双方具有明显的报复能力和意图，任何一方在遭到核突袭后仍有足够的力量在报复中摧毁对方很大一部分人口和工业，从而达到谁也不敢发动核袭击的目的。打赢核战争战略是建立在假设双方的核交战局限于只打击军事目标的基础之上的。采用打击军事目标战略代价高昂，又会增加发生核浩劫的可能性。事实上，美苏是互为抵押的，眼看着要输的一方是不会不打击对方的工业和城市而甘心失败的。战略核战争不论怎么打，双方最终都难免同归于尽”（布朗1975年3月在苏联科学院的讲话）。

1974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第242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中曾一度提出，应放弃“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而代之以着重打击军事目标的“有限反应”核战略。他认为，在美苏都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均势条件下，侧重打击城市是一种“自杀性的做法”。（施莱辛格1974年1月11日在美海外作家协会午餐会上的讲话）

根据施莱辛格的侧重打击军事目标的“有限反应”核战略，美国认为常规战争有可能升级为战区核战争，因而十分重视战区核战争和战区核力量的建设。施莱辛格在1976年度《国防报告》中说：“战区核力量有助于阻止华约使用核武器，并且同我们的战略核部队和常规部队一起成为制止各种可能的侵略的总体威慑力量。如果威慑失败，我们的战区核力量可使我们在早日使用战略核力量之外作出一些有限的和有控制的抉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1976年度《军事态势报告》称："战区核武器在慑止和控制冲突升级的过程中能发挥其长处。它的当量和射程有限，不致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它的命中精度高，打击军事目标时造成的间接破坏不大。如果通过直接常规防御未能防止侵略者入侵，那么动用战区核武器就能迫使敌人缩小其侵略规模，让出所占领土，避免打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或动用战略核武器打一场战略核战争。"据此，美国大力发展战术核武器。到70年代中期，在美3万枚核武器中战术核武器就占2.2万枚，其中部署在美本土的有10800枚、部署在欧洲的有7000枚，部署在大西洋舰队海上的有1000枚，部署在亚洲的有1700枚，部署在太平洋舰队海上的有1500枚(1975年2月美《国防箴言》杂志)。

1977年，卡特政府一上台就否定了施莱辛格的核战略，重新采用"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认为美国只要拥有可以在还击中摧毁苏联城市的充足的"核力量"，就足以遏制核战争，不必耗费巨资去发展打击军事目标的核力量。卡特政府对于施莱辛格的有限核战争观点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强调"美国国防计划的基石是，使用任何核武器都必将迅速升级为全面热核战争，从而使美苏双方都遭到毁灭"(布朗1977年2月24日在参议院军委会的证词)。后来，卡特政府发现苏联正大力发展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的战略核武器，并把打击美国军事目标列为优先打击的重点，认为美国如不采取对应措施，就会处于被动境地。于是在1980年8月，卡特宣布"一个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基础上的核战略不再是可行的"，并以"总统第59号指令"的形式批准把国防部长布朗提出的"抵销战略"作为美国新的核战略。"抵销战略"的重点由侧重打击城市改为侧重打击军事目标，由否定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转向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有限核战争作出有控制的反应的能力"，这实质上是施莱辛格有限反应核战略的翻版。

为适应核战略的变化，卡特政府采取一系列新措施：(1)扭转执政以来战略部队经费连年下降的趋势。1980财政年度经费增

至 108 亿美元，较 1979 年度增加 26%。(2) 大力提高战略核力量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3) 重新重视民防建设，重点由修建掩蔽部转向城市疏散计划，要求逐步做到在发出警报后的 1 周内从城市撤出 1.4 亿人，(4) 改进指挥和控制系统，发展新型空中指挥所，保证核战争中指挥不间断。(5) 进一步调整核打击目标计划。据透露，纳入美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第五号统一作战计划"中的苏联目标总数约有 4 万个，其中地下指挥所 700 个，洲际导弹发射井和核弹仓库约 2000 个，军火工厂 400 座，常规军事目标 3000 个。

5、承认无法重获对苏军事优势，改以维持"充足的军事力量"为目标

1970 年 2 月 18 日，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咨文》中承认，美已不可能重获对苏军事优势，因此只能退一步，"寻求达到一种最能恰当地称为'充足'的力量的战略目标"。所谓"充足的军事力量"就是与苏保持大体均势的军事力量，后来的福特和卡特政府也都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施莱辛格在 1976 年度《国防报告》中说："可靠的战略核威慑应能满足以下四项基本要求：(1) 我们必须在决定部队效率的基本因素方面，同苏联保持必要的均势。(2) 拥有一支具有高度生存能力的力量。(3) 这支力量既能针对苏联的行动实施预定的各种有限的反应，又有对改变袭击目标的命令作出迅速反应，以便阻止潜在的敌人可能发动进一步的袭击。(4) 我们拥有的核力量的类型和规模应使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同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旗鼓相当的。"卡特说："我们必须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同苏保持大体上的均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拥有充足的常规军事力量，足以减少对核打击力量的依赖程度。"(卡特 1977 年 8 月 24 日对美国退伍军人团的讲话) 布朗也说："我们的目的是实现稳定与平衡，而不是恢复优势地位。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以较少的力量和代价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布朗 1977 年 4 月 13 日在罗彻斯特大学的讲话)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70年代美军费和兵力均明显减少。1969财政年度美军费支出825亿美元，占政府支出的45%，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9%。1970～1974年度美军费支出均低于825亿美元。到1979年度，军费支出虽增至1163亿美元，但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下降为2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4.8%。1969年至1979年的10年间，美三军总兵力由335万人减至202.9万人，陆军现役作战师由19个减至16个，独立旅团由15个减至9个；海军陆战师由4个减至3个，舰艇由937艘减至462艘；空军联队由122个减至81个，飞机由15327架减至9200架。1973年6月，美军废止了征兵制，改行全志愿兵制。

6、推行"总体力量"方针，把盟国的军事力量也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之中

"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美国与盟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由盟国承担起自身防务的主要担子，美国则根据自身的利益对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军经援助和海空支援，力避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地面战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露骨地说："我们已从越南战争中吸取了这样的教训：美国在军事上的卷入代替不了一个国家动员自己的人民进行自卫的努力。我们也不会容许盟国敲诈我们，硬说它们的安全对我们比对它们更重要。"（基辛格1975年8月14日在伯明翰的讲话）他还说："战后初期，一切努力差不多都得完全由美国来进行。现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可以担负较大的责任。一般说来，美国不愿意承担长期在外国驻军的新义务；相反，它谋求以当地的能力来进行自卫。如果必要，而我们也认为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的话，我们将给予支持。"（基辛格1975年7月15日在布鲁明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施莱辛格也说："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我们不能期望建立并维持一支为警卫整个动乱的世界所必需的军事力量，我们也不能获得为同时保卫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我们的盟国在集体安全方面具有同等的利益，它们应当公平地分担一部分维持和平和防止冲突的重大

责任。"（施莱辛格 1976 年度《国防报告》）

据此，莱尔德于 1971 年提出了一个"总体力量"方针，把盟国军事力量纳入美全球战略计划之中，以缓解战线过长而美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莱尔德说："现实威慑战略强调加强伙伴关系，虽然要求美国在继续分担防务责任方面尽自己的本分，但也要求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更多地承担它们自己的防务责任。这是我们总体力量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莱尔德 1971 年 5 月 17 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谈话）他还说，"尼克松主义有一个同 1945 年以来一直遵循的其他国家安全原则截然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强调我们的伙伴的作用以及他们根据我们的一种新概念——总体力量概念——必须在共同防务中所起的作用"（莱尔德 1972 年 7 月 7 日电视讲话）。

莱尔德在 1973 年度《国防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应付地区性局部战争的"主要责任移交给盟国"，在兵力的运用方面提出了四种编组方案：（1）"联合力量"，即美军同盟军根据联合计划协同作战，如北约的共同防御计划；（2）"相辅力量"，即"主要依靠当地人力"，美国提供海空军支援，如美国对日本、泰国的作法；（3）"补充力量"，即美国只提供"必要的训练装备和补给品"，如美国对印尼、柬埔寨、以色列等的作法；（4）"单边的美国力量"，即美国单独出兵，但这仅限于"牵涉到美国的切身利害关系和履行条约义务的紧急需要"之时。在对外军援方针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特别强调"着眼于提高盟国的独立作战能力"，以减少对美军的依赖。

7、通过谈判与苏达成一系列制约美苏冲突的协议，美苏关系出现"缓和高潮"

尼克松宣布，谈判是其"争取和平新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声称"我们和苏联将能一起从对抗的时代走向谈判的时代"，"核力量对比已经鼓励人们进行谈判，而不是进行对抗"（尼克松 1970 年 2 月 18 日《对外政策咨文》）。在 70 年代前半期，美苏首脑频

频会晤，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制约美苏冲突的协议，美苏之间乃至东西方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和高潮时期”。

1971年9月3日，美、苏、英、法四国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有关西柏林地位的《四大国协定》，确认了西柏林的占领制度。这一协定虽未从根本上解决柏林问题，但在容易在欧洲心脏地区引起冲突的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妥协。

1971年9月30日，美苏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关于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协议》，双方承担义务，把可能导致美苏核战争的一切意外核事故立即通知对方。

1971年9月30日，美苏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关于改进两国之间直接通信联系的措施的协议》，使1963年6月20日双方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决定建立的“热线”进一步现代化，以加强高层对美苏危机的磋商和控制。

1972年5月26日，美苏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规定了双方各种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的限额，但对战略武器质量的发展和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均未加任何限制。上述协议和条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肯定了美苏战略核力量势均力敌的“相互威慑”局面，标志着美苏核军备竞赛正式进入冻结发射工具数量、全力更新质量的新阶段。

1972年5月29日，美苏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系的基本准则》，确认了双方防止迎头相撞的共同愿望。

1973年6月22日，美苏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声明双方的政策目的均在于排除核战争的危险和避免使用核武器。

1975年8月1日，美苏等东西方35国“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宣言》)，承认欧洲各国“边界不可侵犯”，“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胁”，决定加强欧洲安全、经济合作、人员交流和尊重人权等，使战后东西方缓和进入高潮。

8、由把中国看作对美国的“潜在威胁”转向谋求联华制苏

中国问题在70年代美国战略转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卡特曾说，“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卡特1977年5月22日在圣母大学的讲话）。逐步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改变美国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转而使苏联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从而在“大国均势”中造成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态势，这是尼克松主义及其“现实威慑战略”关键的一步棋。70年代，美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把中国看作对美的“潜在威胁”转向谋求联华制苏的过程。

1969年2月2日，尼克松就任总统后12天，就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后又通过法国总统戴高乐、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递信息：“美国想同中国对话”。1969年底，美停止了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经常巡逻。但与此同时，美仍把中国视为“对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和“70年代美国必须加以对付的力量”（莱尔德1969年3月19日在参议院军委会的证词）。

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复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议。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咨文》中声称，“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美愿意同中国“建立一种较为正常和较为积极的关系”；但又说，“构成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同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原则是类似的”，并扬言要保持对台湾的“条约义务”。

1971年7月9～11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尼克松1972年2月21～28日的中国之行作出安排。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当时，驻台美军有9000人。1973

年 5 月，中、美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联络处；同时，美开始从台湾撤军。1975 年，福特总统访华，他把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作为其“新太平洋主义”的四大要素之一。

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 1975 年度《国防报告》中还把中国称为美在制定战略计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第二个因素”，可是，他在 1975 年 12 月 12 日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谈话时则改口说：“中国脱离苏联的轨道而处于同美国半结盟状态，在世界军事平衡中成为起稳定作用的因素。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在依靠与中国人的不断联合来保持世界军事的均势。如果长此下去，美国会感到无比舒服”。

福特政府的第二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 1977 年度《国防报告》中也说：“我们主要的担心是苏联及其华约附属国的一般任务部队。在过去，我们还觉得有必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队考虑在内。但是，由于我们在外交上采取了主动行动，以及中国专心一意地注意苏联军事力量的加强，所以目前我们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约会协同起来向我们挑战。”

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在 1979 年度《国防报告》中更明确地表示：“美国不再在美中发生冲突的基础上计划军事力量。”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同时宣布，两国将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接受了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条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1979 年 4 月 10 日，卡特又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玩弄“一中一台”的把戏，保持美台间经济、文化和军售等实质性关系，甚至列入“保证台湾安全”的条款。

布朗在 1980 年度《国防报告》中进一步宣布：“美中之间的长期政治对抗已经结束”，两国的战略利益“并行不悖”。布朗后来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是牵制苏联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中美建交“加强了美国的安全，使美国摆脱在两条战线上同两个主要敌国对抗的局面，而苏联现在则必须为应付两条战线的安全

问题制定计划”。布朗在1981年度《国防报告》中声称："一个强大的、安全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准备向中国转让我们不向苏联提供的技术，包括可以用于军事的技术"。1980年1月24日，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四、基辛格与施莱辛格的战略辩论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福特接任第38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其任内并无重大建树，但美国国内围绕对苏政策及国防政策展开的一场战略大辩论却非常引人注目。辩论的一方以1973年7月起担任国防部长的施莱辛格为代表，另一方以福特政府的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两派在对苏的总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也都赞成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但在战略运用上存在尖锐分歧。总的来看，基辛格一派坚持对苏缓和和军事上的收缩政策，而施莱辛格一派则力主在对苏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面都应更加强硬。他们的主要分歧是：

(1) 关于"缓和"政策和美国安全利益的关系。争论的焦点是，美国70年代以来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是否对美有利。基辛格认为，缓和的目的是通过与苏"建立在利益方面的某种相互关系"，使之在国际上"采取负责行为"，在国内逐步发生"演变"。他认为"缓和"政策是一项比对苏"遏制"政策更为有效的政策。施莱辛格则认为，基辛格"对缓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缓和非但"没有改变苏联的行为"，反而成为苏联"混水摸鱼的许可证"；苏联"把铁拳套在缓和的丝绒手套里"，加紧向外扩张。1971年11月的印巴战争，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和1974年7月的塞土冲突，都有苏联插手。因此，对与苏缓和不能抱"任何幻想"。

(2) 关于美苏的核均势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双方的核均势能否长久维持。基辛格的回答是肯定的，认为在美苏双方都拥有"可以消灭对方数次"的核力量的情况下，"某些种类的军事力量

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使用的政治力量的增加”。美苏在军备竞赛中“谁也不会获得真正的战略优势”。施莱辛格则强调，美苏核均势“是不稳定的，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苏利用“缓和”为掩护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有可能逐步取得战略优势，使美沦为“二等国家”，这是美“决不能容忍的”。

（3）关于美国的核战略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美是否应放弃“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施莱辛格认为，鉴于苏正在发展打击军事目标能力，美应放弃“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改行“打击军事目标战略”，使美在核战争中具有包括打有限核战争在内的广泛选择余地。基辛格反对改行“打击军事目标战略”，认为这样势必要发展威力更大、命中精度更高的战略导弹，使苏联误认为美在追求能使苏丧失还击能力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从而使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推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

（4）关于核谈判策略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对苏作出让步，基辛格主张作出某些让步。如允许苏保持数量上的优势，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以达到“阻止苏联进一步发展核力量”的目的，施莱辛格则认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允许苏联在战略武器数量上领先，美国已经吃亏。因此，在新一轮谈判中，美应“坚定地讨价还价”，坚持“数量均等”的原则。他还认为，美应要求苏削减战略核武器数量，“向下平衡”，否则，美就应在提高核武器质量的同时，增加数量，“向上平衡”，以维持均势。

（5）关于对中苏分歧的利用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联合中国共同对苏。基辛格从“均势外交”思想出发，强调大三角关系中重点还是美苏关系，美应在中、苏之间玩弄平衡，利用矛盾，使美国处于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施莱辛格则强调，应突出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主张加快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甚至在军事上与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苏联。

这场战略辩论以 1975 年 11 月 19 日施莱辛格被解除国防部

长职务而告终，说明福特政府仍在推行没有尼克松的“尼克松主义”，基辛格在五大力量结构中玩弄平衡的“均势外交”仍占主导地位，而以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对苏强硬派的主张还成不了气候。尽管如此，这场辩论却在客观上为80年代里根政府的对苏强硬路线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70年代后半期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情况都被施莱辛格所言中，苏联果然利用“缓和”大力扩充军力并对外扩张。美苏“缓和蜜月”很快就成为过去。

五、卡特主义是对“现实威慑战略”的否定

1977年1月，民主党人卡特击败对手福特，出任第39任美国总统。卡特虽一再声称，要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策”取代基辛格的“均势政策”，但其政策的核心仍是通过“缓和”以抑制苏联，维持现状，保护美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因此，卡特的战略主张与尼克松和福特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尼克松和福特代表共和党温和保守派的立场，而卡特则代表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其主张更加温和而已。

卡特政府的全球战略，更多强调依靠经济手段，而不主张运用军事力量解决国际问题。在对苏关系方面，卡特对“缓和”抱有更大的幻想，一上台就提出准备就限制战略武器、防止核扩散、减少军火输出、中东和朝鲜等一系列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与合作。在对盟国政策方面，卡特主张加强美、欧、日“三边联盟”，使之成为“世界新秩序中强大而稳定的核心”。在对第三世界政策方面，卡特强调“更多注意发展中国家”，重点是“处理麻烦的经济问题”，减少军援，增加经援。

卡特政府的军事政策也比前两届政府较为软弱。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上，它认为“无须特别努力”就能保住力量均势。在核战略上，它反对“打击军事目标战略”，继续推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在军事力量建设上，它实行“单方面克制”，放慢MX机动洲际导弹的研制，取消B—1战略轰炸机计划，推迟中子弹生产，企图以此引起苏联的响应，“把美苏竞赛引导到非军事方面去”。在

全球部署上，它进一步收缩海外兵力，力避美军地面部队卷入第三世界的军事冲突。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它急于同苏达成协议。1979年6月18日，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然而，卡特政府一系列以克制求"缓和"的作法并未能换取苏联的响应，相反，苏联利用美国收缩调整之机，大力扩充军力，加紧对外扩张。70年代后半期，苏联在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柬埔寨等地连连得手。特别是1979年，国际局势，尤其是中东、西南亚地区的局势，明显地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突出的事件有二：一是1979年1月，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美国丧失了在中东的一个重要"政策支柱"，美驻德黑兰使馆60余名外交人员被扣作人质；二是苏联以阿富汗内部动乱为由，于1979年12月悍然出兵阿富汗，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构成严重威胁。

阿富汗事件打破了美国许多人士对美苏"缓和"的幻想。强硬派成立了"当前危险委员会"等组织，大声疾呼以强硬措施对付苏联的军事扩张。卡特于1980年1月21日和23日相继发表了《国情咨文》和《国情讲话》，声称过去3年中他"完全受了苏联的欺骗"，而"苏联的入侵行动使我对苏联最终目标的看法产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宣称美国正面临"历史上最严竣的挑战"，对苏联的扩张"仅仅在口头上谴责是不够的，必须使侵略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卡特提出，美国准备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各种手段，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抗击苏联扩张。这一政策被称为"卡特主义"，它改变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局部冲突力避军事卷入的立场，因此是对"尼克松主义"及"现实威慑战略"的否定。

为了贯彻“卡特主义”，卡特政府除了提出“抵销战略”这一核战略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强调“决不能将美国的军事计划建立在假定美国单方面克制就会使苏联响应的基础之上”，美国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布朗1981年度《国防报告》）。为此，卡特政府增加军费，大力加强美军现代化水平，1981年度军费实增3．4％。

（2）明确“半个战争”最可能在中东波斯湾地区爆发，把提高美军应付该地区局部冲突的能力作为备战的重点。布朗在1981年《国防报告》中说：“从孟加拉的吉大港至亚丁湾的印度洋沿岸的弧形地带的区域性动乱”对美国构成“最现实的威胁”，“中东这个高度不稳定地区发生可能导致美国卷入的冲突的可能性要比欧洲为大”，美军必须把“防务计划的重点由增强北约进行常规大战的初战能力”转向应付中东波斯湾的局部冲突上来。为此，卡特政府决定将从1977年就酝酿成立的“快速部署部队”的计划付诸实施，正式成立了“快速部署部队联合特遣司令部”，其任务是：平时制定针对“没有美军常驻地区”的应急计划，战时指挥临时编组的联合特遣部队参战。

（3）为了弥补美国自身力量的不足，改善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视借助盟国的力量。卡特政府要求北约盟国除承担欧洲地区的“主要防御担子”外，还要在围堵苏联的南下战略方面与美国分担责任，欢迎英、法派出舰队进入印度洋。在中东、西南亚地区，卡特政府更加注意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促进区域联系，增加军、经援助，谋求基地和港口使用权，为美国“快速部署部队”的活动创造条件。

“卡特主义”是美国对苏联政策趋向强硬的标志，也是美苏关系从“缓和”转向新的对抗的转折点。由于“卡特主义”是在卡特执政的最后一年才提出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一套对苏更加强硬的主张更能适应美国民心的变化，因此卡特最终以一个软弱总统的形象离开了白宫。

六、简短的评论

1、从1969年到1980年的12年间，美国总统三度易人，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变迁，发生了由共和党政府向民主党政府的更迭。但是，在这12年间，美国的基本军事战略却是一致的，即都是“现实威慑战略”。纵观“现实威慑战略”的产生、推行和发展，可以看出以下两个特点：

（1）重现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内涵的基本一致。“尼克松主义”及“现实威慑战略”的核心都是推行“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方针，力避美军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局部战争。

（2）“现实威慑战略”的许多内容在12年的演变过程中有些自相矛盾。例如：利用盟国打头阵和美军前沿部署之间的矛盾，对局部冲突由力避卷入到准备干预；核战略在“相互确保摧毁”和“打击军事目标”之间几经反复。此外，在70年代中期还杀出一个强硬保守派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与主流派的“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大唱反调。

2、“现实威慑战略”和“尼克松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是基辛格的“大国均势论”。这种理论强调“在联甲制乙、扶丙抑丁的纵横捭阖过程中谋求安全”，“实现以五强为中心的关系格局”；调整同两个对手的关系，联华制苏，造成一个有利于美的“大三角结构”；与西欧、日本建立“新的成熟的三边伙伴关系”，共同分担“全球义务”。其总的战略企图是：利用矛盾，争取喘息，摆脱困境，恢复实力，重振霸业。然而，美国这种以退为进的战略在苏联“勃列日涅夫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结果，“均势”搞不成，“缓和”保不住，出现了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对苏有利、在地区争夺方面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以“阿富汗事件”和美国参议院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为标志，美苏关系重新转冷。“尼克松主义”及其“现实威慑战略”最后以碰壁而告终。

第十二章　里根政府时期的“新灵活反应战略”

一、里根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1980年11月，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的优势战胜对手卡特，当选为第40任美国总统，并于1981年1月正式上任。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对苏强硬派在美国政坛重占上风。无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还是里根本人的竞选演说，都带有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明显印记和反苏反共的强烈色彩。里根的上台和美国保守势力的上升表明，在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美苏争夺态势明显对美不利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强烈要求调整军事战略，重振国威。里根上台时面临着如下的不利战略形势：

1、在军备竞赛中，苏联不仅已经迎头赶上，而且还出现了对苏有利的势头

1985年度美国《国防报告》称：“20年前，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从那时以来，苏联一直在稳步扩充军备，而我们却在限制我们的国防开支，以致在70年代我们的国防开支实际上下降了20%以上，因而丧失了我们拥有的优势。”

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美国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苏联既重视进攻性战略核力量，也重视防御性战略核力量。为了提高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苏联不断加强民防建设，而美国却长期忽视防御准备。”(1983年度美国《国防报告》)尤其使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苏联部署的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不仅数量多、威力大，而且在命中精度方面也接近美国的水平，对美国的洲际导弹固定发射

并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国防部惊呼，美国核威慑力量出现了“易受攻击之窗”。与此同时，苏联从1977年起大量部署机动性强、命中精度高、能携带3个弹头的SS—20中程导弹，并研制和部署了SS—21、SS—22、SS—23新一代短程战术导弹。这不仅使美国开始丧失战区核优势，而且也动摇了整个北约集团的灵活反应战略的基础。此外，苏联还在加紧研制对付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防御系统，并改进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防空系统。“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扩充和战略防御系统的改进，使美国威慑态势的可靠性受到威胁。”（1985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的优势几乎扩大到所有方面。“以总体作战能力衡量，华约部队提高了90%，而北约部队仅提高了40%。苏联已大量装备了最先进的地面武器系统。美国一向依靠的战术空军优势，现在也有些靠不住了。苏联海军力量也有显著发展，70年代苏联部署了7种新级别的大型水面战舰。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常规武器的质量已大有改进，对美国以质量优势抵销苏联数量优势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使人们对美国能否阻止苏联的进攻产生了怀疑。”（1985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的上述变化引起了美国朝野的严重关注。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美苏军事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对我们的基本战略概念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处于军事优势时制定的概念仍然有效吗？世界的变化如此深刻，以致有些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1986年美国《外交》季刊春季号）。

2、在全球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不利态势

苏联利用美国深受“越战后遗症”之害被迫进行战略收缩的机会，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加紧向外扩张。从1975年到1979年，苏联几乎“每年都入侵或控制一个不同国家”，先后发生了1975年11月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1977年3月支持雇佣军入侵扎伊尔、1978年12月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12月直接出兵占领阿富汗等重大事件。苏联举10万重兵进占阿富汗，打破了卡特政府

企图通过与苏联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一步缓和美苏关系，并以此牵制苏联扩张的幻想。1985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指出："随着苏联在阿富汗、叙利亚、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存在的不断扩大，他们实际上几乎包围了波斯湾地区。""苏联还利用间接的军事手段扩大它在全球的存在，并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3、美国还面临"第三世界的挑战"和"联盟内部的挑战"

1985年度美国《国防报告》称："美国在第三世界利益的扩大，以及第三世界冲突的增多，都迫使我们更多地注意那个地区"；"美国的出口现在约有39%输往第三世界。我们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中的一些国家"；"由于近年来先进武器不断扩散，尤其是苏联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加强了对恐怖活动、暴乱和侵略的支持，第三世界冲突的范围和程度日益扩大和加深，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严重威胁。"突出的事件是1979年2月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倒台，它使美国在中东丧失了一个主要的"政策支柱"。

另一方面，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公开的意见分歧，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北约欧洲盟国对于"共同承担防卫负担"半心半意。日、美之间，美、澳、新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发展。美国承认："从70年代末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美国对西欧和东亚已不再拥有压倒的主导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力量的变化将持续到下个世纪"（1988年1月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二、"新灵活反应战略"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里根政府把上述种种对美国不利的战略形势的出现，归咎于卡特政府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并单方面削弱美军实力。里根政府批评70年代美国奉行的"现实威慑战略"过分迷恋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而对苏联的常规挑战无能为力；由于集中关注欧洲，而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束手无策；提出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美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1982年2月8日美

国《国防报告》宣称："我们的国防政策不但因为我国安全受到新的威胁而过时，而且由未能认清和应付恶化了的全球军事形势而声誉扫地。过时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进行必要改革的绊脚石，我们必须与过去某些思想决裂，并且确立新的政策和思想。"

里根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战略方针，并在其第二任期的第一个《国防报告》（1985 年 2 月）中明确提出，新军事战略是"根据苏联威胁的增长而发展了的灵活反应战略"，因而称为"新灵活反应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内容是：

在核战略方面：推行"抵销战略"，侧重以苏联的军事目标为主要核打击对象；首次提出长期核战争的设想；推行"战略防御倡议"，力图建立攻防兼备的核战争体系。

在常规战略方面：采取"多条战线"、"灵活反击"的作战方针；把与苏联打一场长期常规战争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出发点，而把"低强度冲突"作为当前需要对付的"最现实的威胁"；建立一支既能灵活反击又能持久作战的一般任务部队；在军队建设方面，陆、海、空三军基本均衡发展，但海军处于较为突出的地位。

在地区战略方面：继续奉行"前沿防御"和"联盟战略"，坚守西欧、东北亚、波斯湾等对美国利害攸关的重点地区；提出"推回战略"，加强在第三世界广大地区与苏联的争夺，企图以多样化手段"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到它的国土范围之内"。

总的来看，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继承和发展了美国对苏强硬派的战略主张，其核心是以针锋相对的强硬姿态和机动多样的灵活手法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与 60 年代肯尼迪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相比，二者在以常规力量为"剑"，以核力量为"盾"，以灵活反应和逐步升级为基本战法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但 60 年代的"灵活反应战略"侧重对付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而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则重点针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

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与重整军备的措施结合较紧

里根政府上台初期，尚提不出一整套新的军事战略。在其第一任期内，里根政府首先对美国军队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例如，拟定了战略核力量现代化计划，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加强了特种作战部队的建设，等等。这些调整，一方面为里根政府提出新的军事战略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思想。1986年度美国《国防报告》声称：“1961年，肯尼迪政府系统地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把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结合起来，以提高威慑的效果。24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策依然是通过灵活反应实现威慑。诚然，由于苏联威胁的发展，我们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应不断发展。面对苏联军力的增强，为了确保美军的威慑能力，在我们的核计划和核部队中已经增加了反应的选择和能力。”

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与其重整军备的调整措施结合较紧。新军事战略以重整军备的种种实践为基础逐渐形成、丰富和发展，反过来又指导军队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收到较好的效果。里根政府强调，“美国在防务上的努力，要求在我们的军事战略和为执行这一战略所选择的部队结构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战略和部队结构必须统一进行规划”（1986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3、既重视发展和创新，又重视继承和连续

里根政府针对8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吸收前几届政府推行军事战略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批评过去的军事思想“已落后于形势”，必须大力进行改革，“使思想跟上最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战略思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应保持连续性，认为新军事战略必须保持某些基本的传统战略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展战后40多年来美国一贯奉行的“威慑”理论。

1986年2月5日美国《国防报告》称：“我们现在重建美国军

事力量是以什么样的战略作指导呢？一句话，我们的基本国防战略是威慑。”“我们力求成为强者，来维护我们生死攸关的利益，不是求助于侵略或战争，而是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防止战争。我们力图阻止战争，使潜在的对手相信，进攻我们的代价将超过他们希望取得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国防战略的核心，在战后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从威慑理论出发，里根政府再次肯定美国国防政策的四个基石：（1）可靠的、均衡的核和非核力量；（2）集体安全联盟；（3）前沿部署；（4）灵活反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里根政府又“为90年代的国防政策增加了四根支柱”：（1）可靠的核威慑和“战略防御倡议”；（2）可靠的常规威慑和军事力量的使用；（3）裁减与控制军备战略；（4）竞争战略（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3、和国家战略密切配合，成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

里根政府强调，“我们的国防战略必须坚定地服从于国家安全目标。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目标就是维护其作为自由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并使其基本制度与价值不受侵犯。其他目标都来自并服务于这一总目标”（1986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根据上述基本目标，里根政府从执政开始，就确定了下述四个国家安全战略目标：“（1）在经历了一段下降之后，面临苏联军事实力在许多关键领域赶上美国的情况，重新恢复美国的军事实力。（2）恢复美国的经济实力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3）恢复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国际威望。（4）恢复所有美国人的自豪感，并让全世界都知道个人而不是政府应当掌握自己的经济、精神和政治命运。为此，应协调地运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988年1月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是其国家战略——“里根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行“里根主义”的有力工具。“里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美国的国家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消

极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的新阶段。“里根主义”的核心是力图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到苏联的国土之内，因此又被称为“推回战略”。“里根主义”承诺：美国要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的侵略行动的地方进行抵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通过援助世界上的叛乱分子迫使共产主义退却（1988年7月美国《外交》季刊）。

三、“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战略方针

里根政府“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战略方针可概括为：全面扩充美国军事实力，推行“竞争战略”，力图恢复对苏相对军事优势；通过提高实战能力，增大威慑效果，提出“多层次威慑”的新概念，决心在一旦威慑失灵时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维护美国的利益；以核力量为后盾，以常规力量为主要作战手段，重点准备打常规战争。

1、全面扩充美国军事实力，推行“竞争战略”，力图恢复对苏相对军事优势

里根政府与卡特政府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承认不承认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不利于美国这一事实。里根政府认为，70年代尼克松、卡特政府热衷于“谋求一代人的和平”，“实行单方面的克制”，但“在美国停滞不前的时候，苏联却引人注目地以空前的速度扩充军事力量。如果这种趋势不扭转过来，就会导致苏联占据明显的优势”（温伯格1982年4月29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

为扭转这种不利趋势，里根明确提出“重建美国军事实力”的口号，把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重获对苏相对军事优势，作为调整军事战略的核心。温伯格强调，这种重整军备的决心是美国国防政策“最重要的变化”（温伯格1981年7月13日在美国国防大学的讲话）。里根政府的设想是：第一步，争取5年左右，即到80年代中期，扭转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不利于美的趋势；第二步，争取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重建对苏相对军事优势。

为实现上述设想，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全面扩充军

备。在第一任期的4年内，即从1982财政年度至1985财政年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军费年实际增长率平均高达7.6%，占政府支出平均为26%，占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6.2%。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如此连续大规模增加军费的现象实属空前。在其第二任期内，里根政府迫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减少赤字、逐步实现预算平衡的压力，放慢了军费增长速度，平均年增长率为2.1%，而且1989年度出现了军费减少1.1%的情况，但军费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却上升为27.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6.2%左右。在里根任期的8年（1981～1988年度）中，军费支出总计高达18786亿美元。

为了恢复对苏相对军事优势，里根政府于1986年2月5日在《国防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竞争战略”的新概念，声称“竞争战略”将成为“今后几年防务政策的重点”，主要用来“指导武器装备研究、发展和采购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修订战略理论和作战指导思想，并改革组织机构”。

“竞争战略”的提出使美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强调美军的各项防务计划都要以苏军为对象，以美之长，制苏之短，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通过长期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里根政府认为，在美苏竞争中，技术领先是美国最大的优点，也是苏联的主要弱点。美国国防部估计，在与武器装备发展关系密切的20项关键技术中，美有14项领先（即计算机、光电传感器、制导与导航、生物技术、材料、微电子器件、制造工艺、推进器、雷达、机器人、信号处理、信号衰减、潜艇探测和远程通讯），有6项美苏水平相当（即航空和液体动力、常规弹头、定向能、核弹头、光学和动力源）。因此，保持并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是抗衡苏军兵力、兵器数量优势的重要措施，是推行“竞争战略”的关键。里根政府一向重视新武器、新技术的发展，1989年度军事研究发展费用高达382亿美元，占军费总额的13%。

从1987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进行“竞争战略”的制度化试

验，要求美军在制订各项军备建设规划时都要贯彻“竞争战略”的精神。1987年，成立了由国防部长亲任主席、三名国防部副部长、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三军参谋长为成员的竞争战略委员会，下设一个由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特别助理牵头的竞争战略运营小组，其下再根据需要设立各种专家小组。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由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陆、海、空军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组成的高级情报委员会，加强情报保障。美国制定“竞争战略”的基本计划的程序是，先由国防部业务部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部及各联合总部就“竞争战略”提出具体建议和方案，由运营小组进行筛选，将其中有发展前途的项目转交专家小组论证，然后提交竞争战略委员会审定，批准后即可付诸实施。

2、通过提高实战能力增大威慑效果，提出“多层次威慑”新概念，决心一旦威慑失灵，便使用军事力量维护美国的利益

与70年代相比，里根政府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就是强调通过提高实战能力来增大威慑效果，对于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推行全球争霸政策的决心大为增强。里根政府上台不久即公开宣称，“美苏缓和已经死亡”，“认为无需认真准备战斗就可起到威慑作用”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强调“一旦威慑失灵，就要为恢复和平而进行战争。我们的基本战略就是要保持一支随时作好准备的、机动的和可扩充的军队，使潜在的对手相信，向我们侵犯的代价将超过他们期望得到的好处。实行有效的威慑必须达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1）生存性：我们的目的是必须能在遭到敌人先发制人的打击后生存下来，并以足够的力量使敌人的损失超过其所获得的好处。（2）可信性：我们对敌人的进攻作出的反应必须是可信的，就是说，要使潜在的侵略者相信，我们能够而且会作出一定方式的反应。（3）明确性：必须将我们要遏止的行动明确告诉对手，使潜在的侵略者知道哪些行动是被禁止的。（4）安全性：由于意外事故、未经认可而使用武力或估计错误造

成威慑失败的风险，必须降至最低程度”(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告》)。里根甚至公开扬言，美国在平时就应奉行“战时战略”，“做好准备，可以对常规战争或核战争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能够打赢这种战争”(1983年2月15日里根《预算咨文》)。

此外，里根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还提出了“多层次威慑”的新概念，其主要内容是：

(1)威慑力量构成的多层次。美国的威慑力量不仅包括核威慑力量，而且包括常规威慑力量和化学威慑力量；不仅包括现役部队，而且包括后备役部队；此外，还要把盟国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之中，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相互补充的威慑力量。

(2)威慑手段运用的多层次。有效的威慑应通过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防御”，主要依靠前沿防御和快速部署进行灵活反应，使对手认识到“发动侵略可能失败，从而放弃进攻计划”。第二步是“升级”，主要依靠战术核力量、局部动员、战略支援。在防御失败后，“使对手明白，即使它的侵略能够成功地实现最直接的目标，它所面临的敌对行动升级的威胁，将使它付出比它所愿意付出的更高的代价”。第三步是“报复”，主要依靠战略核力量、化学武器、战争总动员。在升级再度无效时，使敌人认识到“侵略将招致美国幸存的报复力量对侵略者要害的攻击，以致它的损失将大于可能得到的好处，从而停止进攻”。“在上述三层威慑中，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是防御。我们击败进攻并恢复和平的实战能力是有效威慑的基石”。

(3)威慑作用的多层次。“美国需要一个概念扩展的战略，包含各个层次目的与手段的一致”。美国不仅应有一个总体军事战略，而且“每一个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都应有实现其任务的战略”(以上均引自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多层次威慑”是灵活反应、逐步升级等战略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其核心是综合运用各种威慑力量，发挥各层次的威慑作用，依

靠多种威慑手段，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3、以核力量为后盾，以常规力量为主要作战手段，重点准备打常规战争

在核和常规的关系上，即所谓“剑”与“盾”的关系上，里根政府进一步明确以核力量为“盾”，而以常规力量作为到处拼刺的“剑”——主要作战手段，主张在不放松核军备的同时，重点准备打常规战争。这是因为：

(1) 美国已经丧失了核优势，“长期依靠美国核优势低销苏联常规优势的希望落空了”(1983年度美国《国防报告》)。靠挥舞核大棒既不能阻止苏联以军事手段干涉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也无法遏制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

(2)美苏之间不仅爆发晴天霹雳式的核突袭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常规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温伯格说，“前几届政府的战略思想判定常规战争必然迅速升级为核战争，从而毁灭一切。我认为，这种假设不一定是唯一的设想。观点上的这种差别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作出特别努力来增加我们的常规力量”(1981年11月30日温伯格答法国《费加罗晚报》记者问)。美退役陆军上将威斯特摩兰预测，下一场战争“仍将是常规战争而不是核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仍是地面部队而不是核武器”(1982年10月19日美《星条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也认为，“未来的年代中，对美国的真正威胁将会导致美国动用常规力量而不是核力量”(1981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报告)。

(3) 美国政府过去认为，不仅遏制核战争要靠核武器，而且阻止常规战争的爆发也要靠核威慑力量。现在则认为，常规力量不仅是对付常规挑战的“主要工具”，而且是抬高核门槛、防止核战争的“重要手段”。“我们把整个国防预算的大约85%用于发展常规力量，这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的重点。”(1983年度美国《国防报告》)“常规力量应具有在关键战区进行常规防御而不求助于核武器的能力。常规威慑力量越大，战争的危险性就越小；常规威

慑所发挥的作用越大，对核的依赖性也就越小。”（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四、“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核战略思想及核军备建设

里根政府尽管确立了重点准备打常规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但并不放松对于核战争的准备；尽管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但仍视之为军事实力的后盾。里根在1988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虽然为了起到威慑作用需要有对付各种冲突的能力，我们的战略核部队及核战略却是各种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拥有有效的战略核能力，并有在必要时使用核力量的决心和意志”。据此，里根政府摒弃了60年代提出的“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继承和发展了卡特政府后期提出的“抵销战略”，大力推行“战略防御倡议”，发展攻防兼备的核能力。

1、里根政府由强调核战争可以打赢转向承认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但仍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

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核战略长期以“相互确保摧毁”理论为基础，认为核战争将意味着“美苏同归于尽”和“人类的毁灭”，因而“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而里根政府在执政初期曾一度扬言，“常常听到有人说，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足够的核武器把对方彻底摧毁。这样的陈词滥调是无济于事的”（温伯格1982年8月11日在旧金山律师协会上的讲话）。由于“苏联人的实际行动已表现出他们相信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因此要遏制战争，就应当准备一旦威慑失灵时真正打一场核战争并设法获胜”（温伯格1982年8月17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的证词）。

1985年以后，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以防止核战争为首要目标的“新思维”，里根政府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也逐渐改变了调门。里根在1988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我一再强调核战争不可能取胜，绝不能打核战争”。然而，里根政府并未改变其通过加强核实战准备提高核威慑政策效果的基本核战略方针。里根在同一报告中又说，“由于苏联仍然重视核实

战能力，我们必须让苏联人懂得，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无法通过核战争或核讹诈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灵活反应或威慑政策使美国及其盟国获得了几十年的安全”。温伯格也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论点，认为讨论和发展核实战战略和实战能力会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相反，缺少这种实战战略才会使人怀疑美国的决心，并从而削弱美国核武库的威慑作用”(温伯格1981年7月13日在美国国防大学的讲话)。

在1982年苏联正式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义务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家凯南、麦克纳马拉、邦迪和史密斯多次建议美国亦应公开放弃“及早使用”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1986年8月美国《大西洋》月刊)。这一建议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却被里根政府所拒绝。里根政府坚持认为，在苏联和华约拥有常规军力优势的条件下，美国应继续奉行“及早使用”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平时，以核报复相威胁遏制苏联不敢对西方发动进攻；战时，则以核武器抵销苏联的常规优势，弥补美军和北约常规兵力的不足。温伯格说，“如果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会排除阻止苏联使用巨大的常规力量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温伯格1982年8月1日对记者的谈话)。

2、摒弃“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卡特政府后期提出的“抵销战略”

里根政府把“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理论称为美苏之间“相互自杀的契约”，认为“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忽略了三个根本问题：第一，如果苏联人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核袭击的反应只会在自杀和屈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那么苏联可能相信美国根本不会对核袭击作出反应。第二，建立在使苏联居民大量伤亡基础上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是既不道德也不审慎的。第三，美国政府懂得核战争不可能取胜。我们的核战略是要保证苏联领导人也相信核战争绝不可能取胜，因此绝不打核战争”(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

告》)。里根政府继承了卡特政府以《第59号总统指令》的形式提出的"抵销战略",但强调增加核战略的灵活性和选择性。里根政府在以下几点上发展了卡特政府的核战略。

(1)在核打击目标方面。由"打击财富"转向"打击军事目标",即由侧重打击苏联的城市、工业和人口中心转向以苏联的战略力量、部队集结地域、军工生产基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军事目标作为核打击的重点。"抵销战略"实际上就是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1974年初提出的"打击军事目标核战略"的继续。核打击重点由城市转向军事目标,表明美国的核战争进一步向实战方向发展。里根政府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人口的伤亡,控制战争的升级,又可以削弱苏联持久作战的潜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效果。核打击目标侧重点的变化,也是核袭击兵器质量提高的结果。美国虽然早在60年代就把苏联的军事目标列入核打击计划,但当时核武器命中精度差。到70年代多弹头技术问世后,美国才逐步拥有了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为了增强打击硬目标的能力,美国计划把可用于打击苏联军事目标的核弹头由1986年的1000颗增加到90年代的6000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9月,美国国防部批准研制一种能钻人地下然后爆炸的核弹头,旨在摧毁苏联的地下指挥中心和地下防空工事(1988年9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2)肯定了核战争是可以控制的,有限核战争是可能的。50至60年代,美国认为美苏之间一旦爆发核战争,必然是"晴天霹雳般的全面核突袭"。70年代,美国判断爆发这种核突袭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核战争将由常规战争升级引起,而且常规战争一旦升级为核战争,必将难以控制,最终将升级为全面核大战。但是,里根却认为"欧洲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爆发有限核战争,而不致于导致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核对抗"(1981年10月16日里根答记者问)。温伯格也说,"美国的核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在欧洲发生核交锋是可以控制的"(1981年5月18日温伯格对

英广播公司记者谈话）。里根政府之所以认为可以打有限核战争，在客观上是由于核武器打击硬目标能力的不断增强，现代化的指挥控制通信体系能够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保持不间断的指挥通信，从而为控制核战争的升级、使核战争“有限化”提供了条件。

（3）首次提出长期核战争的思想。里根政府推翻了核战争必将是短暂的判断，首次提出无论有限核战争或全面核战争都可能是长期的。温伯格说，“看来，苏联至少在作一次以上的核打击计划。因此，美国也必须准备应付一次以上的核袭击”（1981年11月3日温伯格在参院外委会的证词）。他要求“美国的核力量必须能在持久战中获胜”（1982年8月10日温伯格对《纽约时报》记者谈话）。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里根政府准备耗资400亿美元，加速建设能承受一场持久核战争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网，并大力改进空中和地下指挥所。

3、推行核力量现代化计划，增强核威慑能力

1981年10月，里根政府提出了6年内耗资1800亿美元的战略核武器现代化计划。大力提高美进攻性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突防能力和命中精度。1988年1月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继续推行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对于发挥威慑作用，增进稳定和防止苏联的欺编和违约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到1988年底，美国进攻性核武器的现代化计划已基本完成。

（1）不断改进“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质量。里根政府恢复和加速发展了卡特政府停止或推迟发展的MX新型洲际导弹、三叉戟战略导弹潜艇和B—1战略轰炸机，使美国“三位一体”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洲际导弹方面，美国于1987年6月拆除了最后一枚大当量的“大力神”Ⅱ型导弹，使美洲际导弹总数减至1000枚，但弹头数却增至2450个。从1986年11月至1988年底，在“民兵”Ⅲ型导弹发射井内部署了50枚MX“和平维持者”洲际导弹，从而使“民兵”Ⅲ型导弹总数减至500枚，“民兵”Ⅱ型导弹保持在450

枚。里根政府已决定第二批 50 枚 MX 导弹采用铁路机动部署，并于 1988 年开始进行车载试验。小型“侏儒”单弹头机动洲际导弹于 1987 年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计划 90 年代装备 500 枚，采用公路机动部署方式。

在潜射战略导弹方面，里根政府任内装备了“三叉戟” I 型导弹 384 枚（16 艘），“海神”导弹减至 256 枚（16 艘）。具有洲际射程的“三叉戟” II 型（D—5）导弹试射较顺利，1989 年底开始装备。到本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导弹潜艇将全部换装为噪声低、性能好的“三叉戟”潜艇，并全部换装“三叉戟” II 型导弹。

在战略轰炸机方面，为提高突防能力，已有 98 架 B—52G 型机和 60 架 B—52H 型机装备了机载巡航导弹，到 1990 年初全部 96 架 B—52H 型机均装备巡航导弹，用来取代 B—52 型机的 B—1B 型轰炸机从 1986 年 10 月开始装备，至 1988 年底已有 6 个中队，飞机 100 架，采用隐形技术的 B—2 高技术轰炸机正在加紧研制中，计划 90 年代初期装备 132 架，成为 21 世纪美主要核袭击兵器之一。

（2）更新战术核武器。根据 1983 年北约理事会的决定，美国将减少 1400 件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大力提高战术核武器质量，重点是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1981 年 8 月 8 日，里根下令生产中子弹，作为提高战区核威慑能力的重要措施。根据 1987 年 12 月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美销毁 400 余枚中导核弹头。美进一步调整战术核武器的结构，继续更新陈旧的火炮发射的核炮弹，替换战术飞机携带的核炸弹和空对地导弹，发展新型短程核导弹取代过时的“长矛”战术导弹，并计划到 90 年代中期部署 700 枚舰载“战斧”式巡航导弹。

此外，根据“多层次威慑”战略的需要，里根政府还于 1985 年下令恢复已停止 18 年之久的化学武器的生产。

4、推行“战略防御倡议”，核战略的基础从单纯依靠核报复转向攻防兼备的双重威慑

1983年3月23日，里根正式提出“战略防御倡议”，（简称SDI）。其战略意图是：建立一个以天基定向能武器系统为主要截击手段的多层次、多手段的综合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关闭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易遭苏联攻击之窗”，使美国拥有攻防兼备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进而夺取对苏军事优势；并以此为杠杆，带动新技术革命，推动美国经济飞跃，振兴美国国力。

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倡议”同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研制的“奈基—宙斯”、“奈基—X”、“哨兵”、“卫兵”等几种反导弹系统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按照里根政府原有设想，该计划的主要特点是：

（1）拦截方式多层化。过去的反导系统是在对方来袭导弹弹头进入大气层后进行末段拦截，这种方式无法对付成批导弹攻击。新的反导系统实施纵深防御，在对方来袭战略导弹的助推起飞段、后助推段、中途飞行段和再入大气层后的末段进行层层拦截，其中助推段为拦截的重点阶段。这时，战略导弹处于点火上升之际，助推火箭燃烧时喷出的高温尾焰易被识别和跟踪，助推火箭易被摧毁，加之此时尚未释放多弹头和突防装置，摧毁一枚就相当于在后几道防线中摧毁数十颗弹头。

（2）截击手段多样化。过去的反导系统都是以导反导，单纯依靠陆基反导弹导弹截击来袭导弹。新反导系统则广泛采用各种定向能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等）和动能武器（包括电磁炮和陆基反导弹导弹等），而以激光武器作为主要截击手段。

（3）部署方式立体化。过去的反导弹导弹部署在地面，反导基地易遭摧毁。新的反导体系广泛采用陆基、飞机、卫星、发射平台等多种运载工具，地面、空中和空间等多种部署方式，而以天基为主，不仅提高了生存能力，而且有可能及早拦截目标。

（4）保护目标全面化。以往的反导系统均使用带核弹头的反导弹导弹作为拦截手段，即使拦截成功，高空核爆炸所产生的电磁效应和放射性回降微粒也会对己方人口中心和通信设施带来严

重损害，因此只适用于对加固的导弹地下井和地下指挥中心提供点状防御。新的反导体系由于采用定向能和动能武器等非核手段为主要拦截工具，加之要求将绝大部分来袭弹头在重返大气层前予以摧毁，因此可望提供国土大面积反导弹防御。

（5）探测和指挥系统高度自动化。预警、探测、识别、跟踪系统以及指挥、控制、通信系统是战略防御体系的耳目和神经中枢。过去的反导系统主要依靠地面微波雷达作为探测和跟踪手段，新的反导体系将广泛采用微波和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红外探测器、紫外和可见光探测器等多种探测和跟踪手段，而以天基多光谱探测器为主。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核心是新型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涉及信息处理、武器戒备、攻击特征判断、武器发射及应急对抗等一系列过程，能在有对抗措施的情况下，指挥整个系统有效地进行反导作战。

从技术上看，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激光技术、动能武器技术、航空技术、红外探测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该计划提供了技术基础。从经济上看，它符合美国以新技术革命为杠杆，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战略上看，“战略防御倡议”是美国夺取对苏军事优势的突破口。里根政府认为，单靠扩充和改进现有军事力量，难以打破美苏间业已形成的军事实力大体均衡的局面。因为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国的质量优势无法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在进攻性核力量方面，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核弹头的比威力已接近理论数值，运载工具改进的余地也不大，近年来甚至出现重新发展单弹头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均势，必须另辟蹊径。

里根政府期望通过推行“战略防御倡议”，抢在苏联之先解决反导难题。这样，美国不仅具有对付苏联核袭击的防御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报复性还击中摧毁苏联，使美处于能守能攻的主动地位，从而取得压倒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因此，“战略防御倡议”本身就是对长期在美国风行的“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理

论的否定，意味着核战略的基础从单纯依靠大规模核报复转向能攻能守、攻防兼备的双重核威慑，这正是里根政府通过做好攻防两方面的实战准备增强核威慑效果的“实战”核战略的重要体现。

里根政府声称，发展“战略防御倡议”意味着美国的核战略将从“相互确保摧毁”过渡到“相互确保生存”或“相互确保安全”，使“核武器无用和过时”。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给“战略防御倡议”披上一种“和平”的外衣。里根政府坚持推行“战略防御倡议”，正是为了压倒对手，使苏联的“核武器无用和过时”，而使美国的核武器发挥更大的威慑和讹诈作用；确保美国的生存和安全，使苏联的生存和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美国 1988 年度《国防报告》把“战略防御倡议”列为美国核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战略防御倡议”不能取代核威慑力量，而只会“加强核威慑”，“在可预见的将来，进攻性核力量仍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基础”。

1987 年，里根政府对“战略防御倡议”的部署方案作了重大调整，将整个计划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于 90 年代中期开始部署，到 21 世纪初建成一个初级系统。表面上看，分阶段部署似乎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实际上却推迟了全面部署的时间，使其近期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定向能武器为主要截击手段转向以动能武器为主要截击手段，从以天基部署为主转向天基、陆基部署齐头并进，从四层防御转向两层防御，从提供全面的国土防御转向重点保护点状目标。“战略防御倡议”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表明，定向能技术在近期内尚难以过关，作战管理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及空间运输能力离实战要求相距甚远，难以满足全面部署的需要。加之，原计划需耗资上千亿美元，美国政府实在承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战略防御倡议”的经费一减再减，原计划 1985～1989 财政年度费用为 260 亿美元，实际仅有 160 亿美元，其中 1989 年度里根政府要求拨款 67 亿美元，国会仅批准 41 亿美元。该计划第一阶段总费用将从原计划的 1150 亿美

元减到690亿美元。面对重重困难，美国国防部"战略防御倡议"局局长阿伯拉罕森中将于1988年10月愤然挂冠而去。"战略防御倡议"的最初设想难以实现。

5、协调核裁军谈判与核战略的关系，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谈判

里根政府对美苏核裁军谈判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僵硬到积极灵活的变化过程。里根在第一任期内曾多次批评卡特政府的"裁军幻想"，声言"和平不能靠虚伪的军备控制来维持"（1983年9月18日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可是，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转而将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列为国防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里根政府强调，美国必须从过去谈判及苏联的违约行为中"吸取经验教训"，把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纳入美国国家战略的轨道。"我们的军备控制政策是我们国防政策的补充，而不能使其受到削弱"（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1987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提出"裁减和控制军备战略"，声称"里根政府处理军备控制的办法与其前任大不相同"，其要点有四：

（1）"里根总统坚决主张我们一定要始终不渝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目标：如何防止核战争并建立一个较安全的世界"。"我们的裁减军备步骤同我们的总体防御计划一样，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核战争的风险，从而保卫美国的切身利益。"

（2）"裁减军备是我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途径之一。""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谈判是我们能够进行有效谈判的唯一途径。"

（3）"协议必须做到大量削减进攻性武器的数量，使我们双方处于比现有水平低得多的均衡状态。协议应是有效的和可以核查的。"

（4）"除了关于武器的构成和数量的谈判之外，许多其他旨在控制武器的倡议也是重要的，如建立信任措施等。"

1987年12月8日，经过6年多的艰苦谈判，里根与戈尔巴乔

夫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中导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苏军控和裁军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创了三个“第一”：

（1）第一次在美苏之间实现真正的核裁军。条约规定，射程在1000～5500公里的中程核导弹和射程在500～1000公里的中短程核导弹将从美苏核武库中全部销毁。尽管这两类核导弹只占美苏核武库的3～4%，但这确是一个好的开端。

（2）第一次开创了美苏之间的不均衡、不对等裁减军备的先例。在中导条约于1988年6月1日生效后的1．5～3年内，苏联共应拆除1836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以及1667颗核弹头，而美国只需拆除859枚此类导弹及429颗核弹头。苏联的裁减数为美国的2～4倍。

(3)第一次规定了包括现场核查在内的比较严格的核查措施。核查的期限长达13年。

里根政府强调，中导条约的达成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压苏联作出较大让步的结果。此后，里根政府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进行削减50%战略核武器和削减常规军事力量的谈判，谋求达成对美国较为有利的裁军协议。

五、“新灵活反应战略”的常规战略思想及常规部队建设

里根政府认为，对美国霸权地位和全球利益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苏联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各种规模的常规战争，强调美国必须有以足够的常规军事力量战胜各种常规挑战的决心。里根政府的常规军事战略和常规部队建设方针与前几届政府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1、摒弃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或“一个半战争”的机械的常规作战指标，提出在多条战线上实施灵活反击的常规战略

温伯格认为，“对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也许可以做数量上的规定，但是对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可能做数量上的规定。因此，以前所说的我们准备进行一个半战争或两个半战争

的话，目前没有什么意义”（1981 年 9 月 3 日温伯格在檀香山的讲话）。里根政府认为，“关于两个半战争或一个半战争的机械的假设忽视了美国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机会，不应事先武断地确定必须准备打多少战争或在多少条战线上作战”（1983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而应采取灵活反击的的对苏作战方针。其主要设想是：

（1）“苏联已具有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的能力。未来战争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战区之内，而可能扩展到其他地区。”（1984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温伯格说，“苏联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同时发动进攻。因此，美国必须具有足以对付同时发生的许多危机的能力”（1981 年 11 月 30 日温伯格对法国《费加罗晚报》记者的谈话）。

（2）美国不应被苏联牵着鼻子走，苏联在哪里攻，美国就在哪里顶，而应变被动为主动，迫使苏联处于多线作战的困境。“即使敌人仅在一处发动侵略，我们也不必仅限于在敌人肇事地点反击。我们可在几处同时打击敌人，或者集中兵力于几个最重要的战场。”（1983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这种横向升级一向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选择使美军可以在便于发挥自己优点和使苏联易遭攻击之处展开军事行动，从而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恢复和平。”（1989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3）美国应避实击虚，以己之长，击苏之短，选择苏联既薄弱又要害之处进行反击。“美国的战略不应当是简单地在遭到进攻的地点作出反应，这里往往是对方的强点，而应以美国的强点对付敌人的弱点。”“我们应在能够影响战争结局的地点发动反攻，如果为了抵销敌人的进攻，就应当对敌人的某些领土和力量发动进攻。这些领土和力量的重要性须与敌人正在进攻的领土和力量的重要性相当。”（1983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据透露，里根政府考虑过的反击目标有：用空军打击海参崴、彼得格巴甫洛夫斯克等海军基地，用海军封锁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或攻击苏联北方舰队基地摩尔曼斯克、封锁古巴或利用东欧国家的动乱局势出兵，等等。

（4）故意含糊其词，不明确宣布打几场战争和在何处打，以增加美国军事战略的威慑和讹诈作用。里根说："美国的威慑力量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捉摸不定之上的。我们要对一个潜在的侵略者故弄玄虚，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西方到底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1981年1月9日里根在美参议院的讲话）"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使莫斯科明白，我们有能力并有决心对侵害我们利益的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但是，我们避免言明我们到底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是我们灵活反应战略的关键。"（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2、批判未来战争将是短期战争的"谬论"，把准备同苏联打一场长期常规战争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出发点

长期以来，美国一向以打"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作为其常规战略的基础，设想未来美苏战争"要么在30～60天之内就见分晓，要么迅速升级为核大战"。里根政府明确指出，"我们不再依赖短促战争这一危险的谬论。这一谬论认为任何常规战争必定都是短促的，要么侵略者被击退，要么战争很快升级为核战争"（1982年4月20日温伯格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讲话），"美国战略计划应建立在与苏联进行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的基础之上"。尽管从主观愿望讲，美国希望"竭尽全力尽快打赢战争"，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指望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这是因为：

（1）从战后历史看，"进入核时代以来，美国参加的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未来的常规战争也不大可能是短暂的，而且也不一定升级为核战争。

（2）从力量对比看，美国已丧失了核优势，而苏联又握有常规兵力优势。对付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美国不可能"迅速取胜"，只有经过长期较量，充分发挥美国巨大的战争潜力，才有可能获胜。

（3）从对苏联的心理影响看，"如果美国缺乏持久作战准备，

就会使苏联认为可以在战争中比美国坚持得更久”，从而“鼓励苏联更加放手发动侵略”（1983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据此，里根政府估计未来的美苏战争很可能是与前两次世界大战相类似的持续数年之久的长期常规大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里根政府大力加强为支持持久作战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动员基础。在人力动员方面，坚持实行适令青年征兵登记制度，推行“总体力量”方针，重视后备役部队建设，将其纳人美军战略计划之中。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美军后备役部队兵力从86.9万人增至117.6万人，增加了35%；在物力动员方面，扩大军工生产，政府平时给军火商以优惠和补贴，要求开战后军工生产能满足战时60%的需求量，在半年内达到动员高峰，基本满足作战需要；增加战略物资储备，要求平时就储备可供战时3年之用的美国缺少的矿物原料等战略物资。

3、制定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六条原则，决心在必要时动用美军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里根政府吸取了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并总结了近几年的经验，在1987年度《国防报告》中提出了“美国考虑派遣部队投入战斗时应采用的六条检验标准”：

（1）除非美国的切身利益（包括盟国的切身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否则美国不应派部队投入战斗。

（2）如果美国决定派部队投入战斗，必须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并有充分的支援，以求得胜利。

（3）如果决定派部队投入战斗，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未能规定明确的可以达到的目标，从而导致混乱和失败。

（4）必要时根据美国的目的对所派部队的规模、组成和部署不断评价和调整。在冲突的过程中，情况和目的不可避免地会有变化。

（5）在美国向国外派出战斗部队之前，政府应事先得到美国

人民和国会给予支持的某种保证。

（6）派出美国部队投入战斗应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为保护美国的切身利益进行了外交、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之后，才能采取这一手段。

里根政府声言，提出上述六条用兵标准，“其目的就是为了审慎”，不打则已，打则务必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力避在兵力使用上的“渐进主义”，久拖不决，陷入越南战争那样的泥潭。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曾按照上述原则在中东和中美洲多次使用军事力量，主要有：

1983年10月25日至11月18日，美出动兵力17000余人，武装入侵并全部占领加勒比小国格林纳达。里根政府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推进美国政策目标的“一个成功的样板”。

1983年12月4日至18日，美国以其侦察机遭到叙利亚驻黎巴嫩部队攻击为由，从“独立”号航母上出动大批飞机突袭黎巴嫩中部舒夫山区的叙利亚防空部队阵地，并用舰炮轰击贝鲁特以东的叙军防空阵地。

1986年3月24日和25日，美国以利比亚支持恐怖活动为借口，出动第6舰队舰载机攻击利比亚的地面和海上目标，摧毁2个萨姆—5型地空导弹阵地，击伤4艘导弹巡逻艇。1986年4月15日，美国从英国出动F—111战斗机远程奔袭利比亚，攻击卡扎菲的总部、海军训练基地和的黎波里军用机场；从航母上出动A—6舰载机攻击班加西亚地区的军用机场及卡扎菲的备用指挥部。

1989年1月4日，美国地中海舰队从“肯尼迪”号航母上起飞F—14战斗机在公海上空击落利比亚苏制米格—23战斗机2架。

4、认为“低强度冲突”是对美国的“最现实的威胁”，大力加强特种部队建设

里根政府批评尼克松政府和卡特政府犯了忽视低强度冲突的

战略错误，认为尽管“苏联仍是对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主要威胁”，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低强度冲突形式出现的界限模糊不清的侵略已成为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低强度冲突是当今世界上的一种主要冲突样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如此”（1989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1988 年 1 月，美国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向里根提交了一份题为《区别威慑》的报告，建议美国“不能再以华约大举入侵西欧和苏联对美国发动全面核袭击这两种极端的设想作为制定战略规划的主要基础”，而应“着重对付多样化的低强度冲突事件”。

据美国国防部 1986 年 10 月统计，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武装冲突有 26 场，牵涉到约 40 个国家，投入的兵力约 400 万人，其中大部分为低强度冲突。尽管这时的低强度冲突与 60 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苏对抗的色彩大为减弱，然而在不少低强度冲突中仍有美苏对抗的影子，美苏都在利用低强度冲突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防部长卡卢奇在 1989 年度的《国防报告》中说，“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不稳定局势挑起低强度冲突，以削弱美国的核和常规威慑力量”。

“低强度冲突”理论是里根政府对战争理论的新发展。什么是“低强度冲突”？里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简明的定义：“低强度冲突的典型特征是在低于常规战争水平上进行的政治和军事的对抗，通常牵涉到相互对立的原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持久的斗争，从颠覆活动直至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由于低强度冲突是低于常规战争水平的武装冲突，因此又被称为“非常规冲突”。

非常规冲突只能用非常规手段去对付，里根政府强调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手段。首先，美国应尽可能帮助亲美国家消除动乱的根源，使这些国家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与决心。在结束动乱、加强民主与法制方面，政治和经济手段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政治、经济手段无法达到目的、亲美政府或势力

面临失败的边缘而要求美国帮助时，美国才出动武装部队进行干涉。在1986年1月美国国防大学召开的“低强度冲突问题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一致强调，低强度冲突实质上是美苏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认为在威胁“仍然可以驾驭时”，主要运用非军事手段处理，但“必要时还要投入军事力量”。

里根政府认为，特种作战部队是对付低强度冲突的最合适的手段，因此大力推进特种作战部队“复兴计划”，并将该计划列为美军建设中的最优先项目之一。1981年度用于特种作战部队的费用仅4.4亿美元；1988年和1989年度在军费总额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特种作战部队的费用却激增至25亿美元和29亿美元，里根执政8年总费用超过90亿美元，特种作战部队从里根政府上台时的16个扩充至24个，其中陆军特种作战大队从7个增至8个，海军“海豹队”从2个增至5个，1987年4月，成立了上将级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成为美国最新的三军联合司令部，直属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负责集中指挥三军特种部队。1988年初，美国国防部新增设了一名专门负责特种作战和低强度冲突事宜的助理副部长，并在国防部内建立了“全球危机协调中心”，以加强对低强度冲突的政策研究和指导，增强高层次的决策和指挥能力。

5、陆海空三军基本均衡发展，海军建设处于突出地位

里根政府推行三军基本均衡发展的方针。在他任期内美现役三军总兵力从1980年底的204万人增至1988年底的214万人。其中，陆军兵力略有减少，从77.7万人减至77.2万人；空军兵力略有增加，从55.8万人增至57.6万人；海军（含海军陆战队）兵力有较大扩充，从70.5万人增至79万人。三军军费也大体相当，以1988年度为例，海军军费最高，为1001亿美元；空军次之，为882亿美元；陆军为758亿美元（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里根政府把加强海军建设作为重振美国全球霸业的一项重要

措施，里根在上台后不久即明确提出以保持对苏海军优势、控制制海权作为海上战略的基本目标。温伯格说："美国的工商业有无保证，能否获得至关重要的资源，西方联盟的活力有无保证，都取决于我们有无控制海洋的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打败任何威胁到上述利益的军事对手。在这方面，均势或力量对等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拥有海军优势。"（1981 年 3 月 4 日温伯格在参院军委会的证词）美国海军部长莱曼宣称，"美国需要有海上优势，必须能够在紧急时刻及时赶到出事地点，控制空中、海上和水下海域，确保通向世界各个海域的航道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常规部队的可靠性将会受到怀疑"（1986 年度《美国海军态势报告》）。

里根政府提出，美国海军的常规作战任务包括：控制海洋、向海外投送军事力量和海上运输，强调美国海军不仅要在未来海上战斗中迅速围歼苏联舰队，而且应密切配合陆上战斗，"运用海上力量影响地面战斗的结局"。为此，要确保通过海上运输向海外特别是向欧洲提供大规模地面持久作战所需的人力与物资支援，利用海上优势以及向海外投送力量的能力来牵制苏联。

1986 年 2 月 16 日，美国海军宣布要控制全球 16 个海上咽喉要道，即阿 拉斯加湾、朝鲜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波罗的海进入北海的两条要道）、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非洲以南和北美的航道、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以及佛罗里达海峡。

为了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里根政府提出了大规模的造舰计划，要求将美国海军主要作战舰只由 460 余艘扩充至 600 艘，其中航母 15 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100 艘，重新启用的改装战列舰 4 艘。1983 年，美国海军提出了一项和平时期前沿部署的新方针，即"舰队演习与作战新方针"，把海军的训练演习与海外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美国海军舰队的机动性和使用效益。

里根政府强调，“现代化的、强大的地面部队是推行国家军事战略的关键。根据空地一体战理论，地面部队应能在敌人后方遂行纵深抵近作战，为此需要先进的装备和良好的训练”。（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陆军现役师由16个增至18个，并按86型师进行改编，在原有步兵、机械化步兵、装甲、空降、空中突击师基础上，新增加了轻型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师，以适应不同地区的作战需要。其中，装甲师与机械化师（又称重型师）主要用于欧洲方向的高强度战争，步兵师、轻步师、摩步师、空降和空中突击师（统称轻型师）主要用于亚洲、中东地区作战。5个轻型步兵师的改编于1990年完成，装备轻型坦克，可在3～5天内从美国本土空运至中东地区。重型师在86型编制基础上开始推行代号为AOE的新编制，更新装备，增强火力，但编制人数将减少。例如，装甲师人数将为16113名，比原编制减少649名；机步师为18000名，减少4000人。

空军为加强常规作战能力，调整了部分战略轰炸机的作战任务。69架驻美国本土及西太平洋的B—52G型轰炸机由执行核袭击任务改为主要担负常规作战任务。空军还计划投资30亿美元使150架B—52型机携带先进的远程常规导弹。美国战术空军实力不断增强，战术战斗机作战中队已增至77个。

6、重视高技术在常规兵器上的运用，正式提出“常规防御倡议”

里根政府认为，“作为美国整体威慑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常规力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第一，苏联从60年代开始推行战略攻防力量的长期发展计划，使美国丧失了核优势。由于苏联能给美国本土造成巨大损失的能力的增强，美国在冲突中及早使用核武器的方针是不可取的。美国及北约盟国都认识到，必须增强常规力量，提高对付非核冲突的能力，以提高核门槛。第二，苏联一向重视增强常规力量，并修正其战区战略进攻理论。北约和华约的常规兵力和火炮、坦克对比对北约严重不利，这种状

况必须纠正。第三，根据美苏中导条约，将销毁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美苏在削减远程战略核武器方面的谈判也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常规力量才能确保北约为执行“灵活反应战略”所必需的威慑态势。第四，为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常规裁军谈判，也需要加强常规力量的现代化。第五，历史表明，“常规力量是日常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常用、最可见的手段”（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

为了弥补美国常规兵力的不足，抵销苏联常规力量的数量优势，里根政府强调以质补量，将高技术用于常规武器的发展，研制高性能的常规武器系统。1987年，里根政府正式提出常规武器现代化的“常规防御倡议”（简称CDI），耗资2.77亿美元，包括250个研究项目，研究重点包括精确制导技术、装甲与反装甲、侦察、监视、目标与战场管理、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手段、高功能微波技术，等等。

六、“新灵活反应战略”的联盟战略及地区政策

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性。为了缓解由于推行“里根主义”战线太长而美国自身力量更形不足的矛盾，美国更加重视与盟友的战略合作。1986年3月14日，里根在外交政策咨文中说，要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始终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合作”。1984～1988年度美国《国防指导文件》进一步明确美海外战略重点地区的排列次序，即西欧、西南亚、东北亚、加勒比海。里根政府维护并加强在海外战略重点地区的军事存在。1988年底，美海外驻军总兵力达60.6万人，占美军现役总兵力的28%。

1、继续推行“联盟战略”，提出处理与盟国关系的四项原则

里根政府强调，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以强大的联盟体系为基础的。美国一国无法提供在世界范围内遏制侵略所必需的人力和武器。因此，我们采用了联盟战略，即把改善美国的国防态势同扩大军事援助计划、加强美国各个联盟的活力，以及同其他友好

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1988年度美国《国防报告》)。据此，里根政府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的四项原则：

(1)联盟关系“应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里根政府认为，美国与其盟国从缔结军事条约之日起，即确立了一致的目标，即共同对付苏联的挑战和威胁，保持地区稳定并维护各盟国的利益。里根政府认为，联盟除了要遏制苏联的直接进攻外，还需对苏联通过代理人进行的低强度冲突“给予更多的注意”。1985年7月17日，国务卿舒尔茨在一篇题为《联盟的责任》的演说中声称，对付诸如恐怖活动等低强度冲突虽是“正式条约范围以外”的事，但由于这些活动危及各国共同利益，因而盟国之间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增强“互相信任与更大范围的合作”。

(2)盟国之间要进行“合理分工”，共同分担防务负担。里根政府强调，就美国而言，需要带头重振军力，为盟国提供军经援助和“核保护伞”，并在必要时承担集体防务义务。对盟国来说，必须“为确保自身安全作出必要的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特别是常规防御的重担。

(3)盟国之间应广泛磋商，加强合作。里根政府注意就重大问题与盟国广泛磋商，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例如，在美苏中导条约谈判过程中，里根政府经常与盟国和友好国家交换意见，“全球双零点方案”就是采纳了盟友的建议后提出的。再如，里根政府在对利比亚等国采取“惩戒性军事行动”之前，也与北约盟国进行了磋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里根为推行“星球大战计划”也到处游说，诱拉英、法、日、意、西德等盟国参加。

(4)妥善解决盟国间出现的分歧。这是里根政府针对1985年初新西兰政府以美国不愿证实美舰是否带有核武器为由拒绝美驱逐舰“布坎南”号访问一事所提出的一条原则。里根政府强调，要从联盟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待彼此的分歧，不能因暂时的差异而损害长期的同盟关系，这样只会使共同的敌人从中谋利。

2、继续以西欧为战略重点，积极改善与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

（1）继续把西欧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战后，美国军事战略虽几经变化，但以西欧为美国海外利益的战略重点地区这一点始终未变。里根政府重申，“欧洲的防务是美国的切身战略利益。欧洲人口众多，技术先进，工业发达，对美国说来，是除北美之外最重要的地区。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体系是高度相互依存的：美国近1/2的海外投资在西欧；而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中有2/3来自西欧”（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为了确保西欧的安全，美国和北约将继续推行“灵活反应”和“前沿防御”战略，并根据“空地一体战”作战思想作好抗击苏联和华约进攻的各项军事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少丢失领土的情况下，制止华约发动的最初攻势。重点将是对华约的侧翼发动进攻，迫使华约将其人力从中部战线分散出来。同时，为了利用华约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弱点，为了破坏敌军的后方行动，特种作战部队将在东欧和北约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作战。”

（2）不断加强针对欧洲的作战准备。里根政府坚持在西欧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1988年底驻欧美军总兵力为34．2万人，占美国海外兵力的56％。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即着手提高驻欧美军的战备水平，与西德签订了新的防务协定，确定战时美将在10天内从美国本土派6个师增援欧洲，从而使驻西德美军从4个师增至10个师。与此相适应，美国将预先储存在西欧的美军作战装备从可供4个师之用增至可供10个师之用。

（3）努力增进与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里根政府大力推行1979年12月北约核计划小组通过的“双轨计划”：一方面与苏联就削减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一方面从1983年底开始在英国、意大利、西德等国部署美国的“潘兴”Ⅱ型和“战斧”式陆基巡航导弹。里根政府认为，美苏之所以能于1987年12月签署中导条约，正是由于北约推行上述双轨政策的结果。1983年底，北约核计划小组蒙特贝洛会议又通过了北约核力量现代化计划，决定将部署在西欧的核弹头削减1400枚，并更新余下的4600枚。美

正大力研制射程为125～480公里的短程核导弹。里根政府敦促北约盟国与美国“分担防务负担”，落实“战略分工”，大力扩充常规军备，担负起欧洲特别是中欧地区的防务。1985年5月，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常规防御倡议”，制定了大力增强常规军力、联合研制常规武器的五年计划。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称，“北约盟国现有常备军350多万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60%的地面部队和50%的空中力量将由北约盟国提供。目前，驻欧美军的基地设施费用的73%由所在国支付”。

3、摒弃“调拨战略”，在亚太地区积极贯彻“灵活反击”作战思想

（1）摒弃“调拨战略”，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强调美必须改变重兵深陷亚洲而无力顾及欧洲战略重点的局面，从亚太地区大量撤军，集中力量加强在欧洲对苏作战准备。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进一步提出“调拨战略”，表示一旦欧洲或中东发生战端，美国将从亚太地区抽调兵力前往支援。里根政府上台后，摒弃“调拨战略”，明确表示：即使欧洲发生战端，也不再从亚洲抽调驻军增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84年度《军事态势报告》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对苏联向北约发动进攻有重要牵制作用，因为苏联在欧洲采取行动“需要在亚洲有一个安全的侧翼”。几年来，美国逐步增强驻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到1988年底已达21．4万人，占海外美军兵力的35%。其中，地面部队2个师，都在进行现代化改装；战术空军战斗机中队已换装F—15、F—16等新式飞机；第7舰队作战能力显著增强；用于西太平洋方向的美战略核力量也不断更新。

（2）贯彻“灵活反击”作战思想，把围堵苏联的防线推进到苏联近海地区。美国国防部1984～1988年《国防指导文件》设想，一旦苏联在欧洲向北约发起攻击，美国可以选择亚太地区这个既是苏联薄弱环节又有牵动全局的方向主动出击。例如袭击苏海参

崴等沿海港口，封锁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海峡等。为适应上述作战思想的变化，美军更加重视东北亚地区的兵力部署。

（3）加强联盟体系，逐步形成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对苏防线。在东北亚，美国更加重视发挥日本的抗苏前哨作用，强调“日本是美国亚太地区前沿防御的基石”，美日应建立“更积极的防卫伙伴关系”（1989年度美国《国防报告》）。为此，美国敦促日本增加军费，扩充军力，要求日本拥有守卫本土、封锁宗谷、津轻、对马三海峡，保护周边1000海里海上航线的能力。日本海军连续数年参加了美、澳、新、加、日五国海军联合举行的“环太平洋演习”。“美、日、韩安保体制”逐渐形成。美国一方面大力说服日本和南朝鲜消除宿怨，加强合作；一方面帮助南朝鲜加速军队现代化，与南朝鲜签订了战时向其移交价值20亿美元军事装备的协议。在东南亚，美大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以遏制越南的扩张，保护从菲律宾到马六甲海峡的海上通道。1981年9月，美国与泰国作出安排，美军重新启用乌塔保空军基地，作为B—52战略轰炸机由关岛赴印度洋的中转站。1988年10月，美国与菲律宾就今后两年美国继续使用苏比克和克拉克海空基地问题达成协议。此外，美国还与新加坡达成租用其机场和港口的协议，与印尼商定在守卫马六甲、巽他和龙目等海峡方面进行合作。在西南太平洋，美国重视利用《美澳新条约》增进三国合作，先后向澳、新提供了F—16、F—18等新型战斗机，并获取了达尔文等基地使用权。

（4）推行“一中一台”政策，在借助中国牵制苏联的同时抱住台湾不放。里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两面性，一方面，重视同中国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认为中美之间不仅在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而且在柬埔寨、阿富汗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尤其是在战略上，中国在远东牵制了苏联，使苏联处于欧亚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因此，里根政府把中国当成美国“友好的非盟国”，并有限度地放宽对华技术转让，以“增强

中国对抗苏联的军事防御能力”。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又抱住台湾不放，扬言“美国不会为结交一个新朋友而抛弃一个老朋友”（里根1984年4月23日讲话），坚持按《与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所承担的义务，对台出售先进武器与军事技术。

4、中东、西南亚战略地位上升，美国不断加强针对该地区的军事活动

（1）中东、西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里根政府判断，在西欧和东亚两大战略方向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美国安全利益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中东、西南亚地区。1982年度美国参联会《军事态势报告》称：“当前对西方集体安全利益最紧迫的威胁存在于西南亚地区。一旦苏联控制了该地区的石油命脉，西方联盟将在没有苏联一兵一卒进入西方世界的情况下屈膝投降。因此，美国军事准备的优先注意力应放在这一地区。”

（2）不断加强针对中东、西南亚地区的军事活动。为适应中东、西南亚地区作战的需要，里根政府于1983年初将原美国快速部署部队司令部升格为三军联合的中央总部，下辖兵力由23万人增至近40万人，包括5个陆军师、1.5个陆战两栖部队、3个航母战斗群、1个水面舰艇特混大队和若干空军战术战斗机中队。美国除扩建迪戈加西亚基地外，又在索马里、阿曼、埃及、肯尼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9国获取了约20处基地和设施的使用权。在印度洋部署的仓库船由7艘增至20艘，装载可供1个陆战两栖旅和若干空军中队作战30天所需的装备物资。一旦情况需要，可在4～6周内从美国本土运送1支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抢占中东、西南亚战略要冲。为了确保波斯湾石油航道的安全，并对伊朗实施威慑，1987年8月美国成立了中东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一度在波斯湾频频为科威特等国的油轮护航，并多次对伊朗实施警告性打击。1988年8月20日两伊战争停战后，美国在波斯湾的海上兵力与活动已逐渐减少。1988年底，该地区有美舰25艘，预计最终将减至5～7艘，恢复到两伊战争前的水平。

(3) 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美国的中东政策一向是偏袒以色列的，但为了推动和平进程，又要设法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2 年 9 月 1 日，里根正式提出“中东和平计划”，推行两手政策：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促和，并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调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与当地亲美国家的军事合作，增强这些国家的自卫能力。美国与埃及建立了军事协调委员会，与约旦建立了联合军事委员会，支持海湾六国合作委员会的联合空防和维护波斯湾航行自由的努力。

5、确保中美洲“美国后院”的安全

(1) 重视中美洲的战略地位。里根政府指出，“平时，美国进口的各类物资包括石油的 45%都通过加勒比地区运入；战时，美国支持欧洲作战的补给品的 50%也要经这里运出。而这一地区存在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和利用古巴代理人渗透的危险”（1983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一旦发生全球性危机，苏、古可以利用尼加拉瓜为基地向加勒比地区增派军事力量，封锁巴拿马运河，切断美海上通道，从而危及美国资源的进口，影响美国对北约的支援。”（1989 年度美国《国防报告》）里根说，“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紧靠美国，我们却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面苏联不断在此扩大影响，危及美国的安全。为了对付这一威胁，美国在中美洲保持了威慑力量，进行集体安全合作安排，并加强该地区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和内部颠覆的能力。我们绝不允许苏联在此建立桥头堡”（1988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 增强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南方司令部下辖兵力 1 万余人，分散驻在 19 个拉美国家中，1982 年将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加勒比联合特遣司令部扩建为加勒比美军司令部，直属大西洋总部指挥，美大西洋舰队经常在加勒比地区保持约 20 艘舰艇。1986 年 12 月，美国又成立了陆军南方司令部，以完善加勒比地区美军地面部队指挥系统。里根政府对中美洲国家采取诱压并举的

两手政策，一方面，大力修补同中美洲各国的关系，扶植亲美势力；另一方面，对尼加拉瓜、巴拿马等不听美国摆布的国家施加军经压力，排挤苏、古影响，力图维持美国在“后院”的霸权地位。1988年3月16日，美国借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边境形势紧张之机，派遣2个营兵力进驻洪都拉斯。1988年4月，因与巴拿马诺列加政府关系恶化，美国以保护运河区安全为由，向巴拿马增兵2200人，并对巴实行经济封锁。

6、调整外援和军售政策，加强对外军事援助

(1)改变“重经援、轻军援”的倾向。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出于对苏缓和的需要，力避在军事上卷入第三世界冲突，提出“以水对火”的方针。在外援方面，强调通过经济援助扩大美国影响，对外军援有所减少。里根政府认为，尽管经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却不能解决受援国燃眉之急。美国对外军援对于巩固与发展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加强地区集体防务，换取受援国的基地设施使用权等，有着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诸如中东等地区的一些不愿正式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来讲，军事援助乃是美国与之发展双边军事合作的一种好方式。根据这一方针，里根政府加强了对外军援，在其任期8年内，对外援助总额907.83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365.11亿美元，占40%；军事援助5442.72亿美元，占60%。1986年度，军援一度高达104.99亿美元，比当年经援49.68亿美元高出一倍以上。

(2)强调军援直接为美全球战略服务。里根政府明确指出，对外援助“首先将给予那些能直接促进美国战略目标实现的国家”，并把“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列为对外援助的最后即第8位的目标（美国国务院1982年5月向驻外使馆下达的新外援方针）。中东、西南亚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美国军援的70%左右流向该地区，其中以色列和埃及两国占近50%。中美洲接受美国军援数额急剧增长，1980年度仅2300万美元，1986年度增至10亿美元以上，主要用于支持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等亲

美政权。对亚太地区的军援的90%以上提供给南朝鲜、菲律宾和泰国，以求保持这些美国拥有重要军事基地的国家的稳定。欧洲南翼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在美国军援中也占一定比重。

（3）放宽对外军火出售的限制，扩大军火市场。卡特政府曾宣布减少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军火销售，企图以此来换取苏联的响应。结果，苏联对外军火出口却急剧上升。里根政府改变了这种单方面的自我限制的做法，于1981年7月颁布了新的《关于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指令》，宣称对外军火销售是美国“全球防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交政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大幅度增加对外军火销售。近几年每年销售合同额均在100亿美元左右，其中1983年度高达191亿美元，占全世界军火交易总额的36%。近两年，由于国际军火市场不景气且竞争加剧，美国对外军火销售额有所下降，但仍占世界总交易额的30%以上。里根政府破例向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出售了一批先进武器，例如，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新型E—3A空中预警飞机、F—15战斗机和“毒刺”式防空导弹，向巴基斯坦、南朝鲜、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出售F—16战斗机等。为了向面临危机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及时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里根政府还于1982年专门制定了一项“特别安全援助计划”，设置了一笔10亿美元的“特别防务采购基金”，事先准备好某些武器装备，一旦作出紧急援助的决定，可立即交货。

七、简短的评论

1、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是其国家战略——“里根主义”在军事上的体现。和“里根主义”一样，“新灵活反应战略”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进攻性和冒险性。“新灵活反应战略”以竞争战略为指导，明确提出美军的战略、战术、武器发展、军队建设、部队构成、全球部署等各个方面都要针对苏军，以美之长、击苏之短，力图重获对苏军事优势。“新灵活反应战略”以“推回战略”为依据，跨越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灵活反击、主动进攻的新阶段，力图将苏联的影响推回苏联国土之

内。“新灵活反应战略”是威慑战略的具体运用，强调通过提高实战能力增强威慑效果，较前更加重视军事力量在推行国家战略中的作用。里根政府曾多次使用或威胁使用美国军事力量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2、里根政府执政8年，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方面，不仅扭转了对美国不利的趋势，而且出现了对美国有利的势头。在全球战略态势方面，不仅遏制住了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而且加强了美国在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军事地位，加上其它原因，美苏攻守易手，苏联由进攻转入防御和退缩，美国由收缩转入进攻和扩张。里根政府依仗日益增强的实力地位和不断改善的战略态势，与苏进行对话，迫苏在中导谈判方面做出较大的让步，达成了有利于美国的中导条约。1989年1月11日里根在告别演说中声称，美国“经济复兴”和“信心复兴”是他执政8年“最感自豪的两大成就”，而这些都是推行“里根革命”，执行“以实力求和平”政策的结果。

3、里根政府为使“新灵活反应战略”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对其进行调整与修正。近几年来，随着美苏关系缓和，热点地区降温，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在保持强硬保守的基调下，也在向灵活而实际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战略方针方面，不再提谋求对苏军事优势，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在核战略方面，明确承认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依重程度大为降低；在常规战略方面，越来越重视对付地区性“低强度冲突”；在地区政策方面，强调与盟国实行战略分工，分担责任，宣布撤除若干海外基地，考虑从海外收缩一定兵力，等等。

第十三章　布什政府时期的“地区防务战略”

1989年以来，布什政府推行以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为根本目标的全球战略和针对原苏联、东欧等国的“超越遏制战略”，并据之提出一项“地区防务战略”。

一、布什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

1988年11月，布什凭借自己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的有利地位在大选中获胜，1989年1月就任第41任美国总统。布什政府登台之初，面临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美国的安全环境逐渐发生质的变化的战略形势。

1、主要对手苏联国际地位衰落，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掌权后，一意推行“新思维”，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联在与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日益动荡，经济不断滑坡，民族矛盾深化。在自顾不暇的困境中，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和兵力，改行“防御性”军事战略，从海外全面收缩，撤出在阿富汗打仗的苏军，放弃在越南的军事基地，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在军备竞赛中，苏联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在地区争夺上形成美攻苏守、美进苏退的局而。苏联的综合国力每况愈下，国际影响逐渐缩小，急速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衰落下来，在军事上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也大大降低。布什声称：“在过去40多年来，美国的遏制大战略一向针对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的扩张。而现在，我们发现苏联正为内部种种危机所困扰，因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内向。可以断言，苏联重新回到过去40多年间美国的超级大国对手的地位已不可能。今天，美苏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的危险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小。”（1991 年 8 月 13 日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主要对手苏联的衰落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增强，意味着两极体制的解体，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苏长期争霸的局面逐渐让位于美国力图一家称霸的形势。布什声称：“尽管出现了新的力量中心，美国仍是唯一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具有真正的全球实力、作用力和影响的国家。”“美国的全球领导重任不可替代。”（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美战略重点欧洲地区形势剧变，雅尔塔体制渐趋瓦解

东欧剧变使欧洲的战略图景大为改观。东欧国家纷纷摆脱苏联的控制，改行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不仅不再是苏联军事战略的附庸，而且要求苏军尽快撤走。华约名存实亡，直至后来导致 1991 年 7 月的正式解散，雅尔塔体制瓦解，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严阵对峙的局面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国家联合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美国判断，“欧洲地区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降至 40 余年来的最低点”（1991 年 3 月美《国防报告》）。

美国的战略重点欧洲地区形势的剧变，给美国带来机会，也提出新的挑战。随着苏联和华约威胁的减少，欧洲国家更多考虑本国和欧洲内部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摆脱美国影响和控制的倾向，“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声日高，德国走向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再加上日本的迅猛崛起，使美国从东西两方面临强劲的竞争，美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地位呈相对下降势头。布什承认，“日本和德国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以及美国的激烈竞争者的面目出现，是新时期一个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发展变化”（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3、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更加动荡，更不安宁

“世界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旧格局已经被打破，而新格局尚

未完全产生。当今的世界仍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而难以预测。"（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旧格局被打破后，东、西、南、北各方及大、中、小各国内部及相互之间原来被美苏争霸所掩盖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进一步显露出来，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纷争，诸如民族对立、宗教差异、边界纠纷、资源争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分歧，均呈上升趋势。南北方之间差距拉大，不少国家，包括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困难，政局不稳，又加剧了这些分歧。

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但多极结构并不稳定。多极意味着更多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的涌现。地区性大国争夺地区发言权和影响力的角逐愈演愈烈，竞相扩充军事实力，导致地区性军备竞赛加剧，核、生、化、导弹武器扩散加速，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危险增长。旧的热点，如中东，尚未消除；新的热点，如原南斯拉夫，又冒了出来。世界更不稳定，更不安宁。如何对付这种更现实的"威胁"，成了美国军事战略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地区防务战略"的产生

1、"超越遏制战略"为"地区防务战略"定下基调

布什上台后，立即对美全球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审议，在此基础上于1989年5月12日以"苏联的变化"为题，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比任何前任抱负更大的'超越遏制战略'"。这一战略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进而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攻心战，力图以政治、经济、外交、心理等非军事手段为主，推销美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迫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是"里根主义"及其"推回战略"的继承和发展，由对苏联侧重"硬对抗"转向加强"软进攻"，不仅要"把苏联的影响推回到其国境之内"，而且要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开放"乘虚而入，促使苏联发生"根本体制的变化"，并趁苏联从全球收缩之机，扩张美国的全球影响。布什明确宣布："美

国现在的目标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要大得多，我们寻求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也就是说，力图将苏联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轨道，使苏联成为美国的“二流合作伙伴”。布什还将“东欧的自决和自由化”列为“冷战能否结束的关键”，压苏“明确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拆除铁幕”，支持“建立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

“超越遏制战略”是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解决对于主要对手苏联的政策、目标和方针，确定由对苏遏制转入对苏和平演变，由外线的消极围堵转向内线的主动进攻，由突出军事对峙改为侧重政经渗透。这一重大战略转变为布什政府制定新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定下了基调。

2、海湾战争对美“地区防务战略”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

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东西方“冷战”趋于结束时爆发的第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热战。这场战争对于美国“地区防务战略”的产生起了摧化剂作用。至1990年年中，美“超越遏制战略”的“和平演变”意图在东欧已大体实现，在苏联也初见成效。苏、东欧对美威胁大为降低，全球安全环境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海湾危机表现出来的地区性强国对美国的挑战突出了出来，进一步证明在美苏军事对峙缓和的同时，地区性局部冲突已上升为对美国“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威胁”，美国修改军事战略势在必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武力侵占科威特的当日，布什提出一个“新的防务战略”。布什声称，适应“安全环境的改变”，“美国的防务战略和军事力量结构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修改”，明确宣布“美国防务计划的重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威胁转向对付重要的地区性突发事件”。1991年3月1日，美国防部长切尼在《国防报告》中将布什上述讲话全文发表，并据此提出了美新军事战略的全面设想和调整军费、兵力和军事结构的计划。1992年2月25日，美国防部长切尼向国会提交了1993财政年度《国防报告》。该

报告将布什政府当前奉行的军事战略正式命名为“地区防务战略”。至此，布什政府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形成。

3、“地区防务战略”与新全球战略同步产生

90年代，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各国特别是各大国都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去塑造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一马当先。布什政府经过两年的实践，确立了以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1991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打出“世界新秩序”的旗号，认为在海湾战争中，对推行这一战略进行了试验，将军事战略的调整作为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布什声称，在海湾危机中“处于生死存亡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宏伟的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全世界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实现长期以来对建立世界新秩序所怀抱的希望。”“美国在这一努力中承担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不仅具有道义上的声望，也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手段。正是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从布什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所构想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

如果说“超越遏制战略”是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全球战略构想中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话，那么，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则是以军事手段实现此全球战略构想的支柱。1991年2月9日，切尼在国会作证时说：“尽管决定美国全球领导能力的因素很多，军事实力无疑仍是最基本的因素。”“美国防务战略诸原则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维护美国牢固的领导地位，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引路。”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所在。”

三、布什政府“地区防务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1、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向对付地区

冲突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1991年3月1日《国防报告》中宣布，美国新军事战略“将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向对地区性威胁作出反应”。尽管从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就越来越重视局部冲突对其全球利益的挑战，但美国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声明不再以“苏联的全球挑战”而以“地区性威胁”作为“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此尚属首次。切尼称，美制定这一新军事战略的依据是“国际安全环境戏剧性的变化，冷战时期华约大规模入侵西欧并升级为全球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冷战后时期的挑战主要来自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显示出的重大地区性威胁。这种地区性威胁能够在事先得不到警报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由于先进武器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地区危机具有的危险性增大”。

切尼在《国防报告》中专门将布什政府从事的三次军事行动一一列出，吹嘘这些行动证明“美国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冲突迅速作出反应的力量和决心”。这三次军事行动是：“（1）1990年8月7日开始大规模增兵海湾的“沙漠盾牌行动”，1991年1月17日升级为对伊拉克大规模空袭和2月24日开始对伊地面进攻的“沙漠风暴行动”，至2月28日伊军撤出科威特，该行动告一段落。（2）1989年12月20日，美以制裁诺列加贩毒和保护巴拿马运河为借口，开始在巴拿马实施“正义事业行动”．除出动全部驻巴美军13000人外，还从美本土派出一支9500人组成的军队，2至3天就控制了巴拿马全境。1990年1月3日，将诺列加抓获，劫持至美国“审判”。（3）1990年6月3日，美以利比里亚内战威胁到美国侨民安全为借口，开始推行“锋利刀刃行动”，从地中海派出4艘军舰和2335名陆战队员组成的两栖作战大队，开赴利首都蒙罗维亚外海。8月4日，美军在蒙市登陆，开始撤侨。至1991年1月9日该行动结束，美共从利撤走美、加、意、德等国公民2600人。

在上述三次军事行动中，海湾战争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海湾战争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与一个地区性中等军事强国之间实力悬殊的一场较量。这场战争既检验了美军的“低强度冲突”理论，又对其提出了挑战，因为战争规模和使用武器大大超出了“低强度冲突”的范畴，美军不仅运用了55.4万精锐的正规部队，而且动员了22万后备役部队。美抽调近半数的驻欧美军支援海湾，表明美军事计划中优先次序的重新安排，不再以欧洲大战作为军事计划的中心，转而推行对付第三世界局部冲突的“实战战略”。美军在海湾战争中较成功地应用了原来为欧洲作战拟定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在持续38天的空袭中，充分发挥美军技术优势和空军优势，打击伊拉克全纵深目标，使伊军指挥中断，补给不继，士气丧失，从而为美军发起地面攻势铺平了道路，仅用100个小时就完成了对伊军42个师的围歼。伊军伤亡近10万人，而美军仅伤330人，亡115人。

美以较小代价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显示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以武力干涉地区事务的能力，为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布什说，美国通过制服萨达姆，“向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任何一个置一切法律于不顾地发动侵略的独裁者或暴君发出一个持久有效的警告”（布什1991年1月29日《国情咨文》）。海湾战争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摆脱“越战后遗症”的影响，美国的“新爱国主义”（实即“美国第一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实即“全球霸权主义”）大大抬头。1991年3月2日，布什在欢迎从海湾得胜返美的美军的讲话中说：“越南战争的幽灵已经永远被埋葬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中。”

2、适应“超越遏制战略”的需要，谋求与原苏联建立新的军事关系

尽管苏联对美国威胁的程度和性质不断变化，但在苏联解体前，对苏关系在美全球战略中仍将占据关乎全局成败的突出地位。布什在1991年8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继续推行“超

越遏制战略"，"鼓励苏联持久而深入的政治和经济演变"，仍是美"不可避免的优先重点"。适应对苏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需要，布什政府逐步调整了对苏军事政策。这一调整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89年5月，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时，仍然强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军事威胁和军事对手。布什说，"尽管我们希望超越遏制，我们在新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前面还有许多危险和不可捉摸的因素。我们绝不能忘记苏联拥有令人畏惧的军事能力。我们必须保持强大，从而使苏联确信推行扩张主义得不到任何好处"。直到1990年1月，美《国防报告》在承认"苏联的军事威胁正在减少"的同时，仍强调"只要苏联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未变，苏联就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并摧毁美国的国家"。因此，美国"不应匆忙地修改军事战略和调整军事计划"，而应继续推行"竞争战略"，"与苏展开长期竞赛"。

（2）1991年3月的美《国防报告》调子有了明显的变化，肯定"苏联正朝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方向发展"，"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已使美国更加安全"，"冷战时期的持续威胁——华约对西欧的大规模入侵可能极易升级为全球战争，已因苏联从东欧撤军和华约崩溃而烟消云散"，明确美"新军事战略转而侧重应付重大的地区性冲突"。与此同时，该报告强调"苏联局势的发展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美仍须"保持对于全球战争的重新组合能力，以防苏联发生大的逆转，重新出现冷战高峰期间苏联对美国所构成的那种全球性威胁"。直至1991年8月13日，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说："苏联仍是一个军事大国"，"要预言苏联将遵循什么方针是不可能的"，"美苏关系的基本特征仍是竞争性的，重新出现美苏对立的危险始终存在"。

（3）1991年8月13日布什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六天之后，苏联发生了"8·19"事件，然后局势急转直下。布什由忧转喜，立即表示"民主、自由和改革又一次在苏联占了上风"，并断

言从此“苏联的历史性变革再也不可能逆转”，“未来的美苏关系只会更好”。至此美国已经看准苏联的发展方向，改变了“重新出现美苏对立的危险始终存在”的判断，从而更坚定地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非但不再以苏联作为主要对手，相反谋求与苏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1991 年 10 月 4 日，美国防部发表题为《变革中的苏联军事力量》的报告，同 1981 年以来美国防部每年例行的题为《苏联的军事力量》的报告相比，基调已经改变，由强调苏联“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转而承认目前苏军基本处于一种防御态势”。

从上述判断出发，适应“超越遏制战略”的需要，布什政府曾力图与原苏联建立新的军事关系：一方面，谋求苏联在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与美合作，成为美的“二流伙伴”；另一方面，加强双边军事交往，向苏军传授“非党化”、“非政治化”的经验，并加速美苏裁军进程，双管齐下，兼顾对苏利用和削弱苏军事潜力的双重目标。

在拉住苏联共同对付地区冲突方面，美从海湾战争中尝到甜头。海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一场没有美苏争霸背景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美国第一次可以在不必顾忌苏联军事干预的情况下放手使用武力对付苏联的一个老盟友。这是海湾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突出的不同点。苏联在海湾危机中采取了与美合作的立场，对允许美对伊动武的安理会 678 号决议也投了赞成票，美国对苏的态度深表赞赏。1991 年 9 月 23 日，布什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说，“随着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实现第三次历史性突破即国际合作的机会也大大发展。一年前，为了保护一个弹丸王国免遭侵略，为了反对萨达姆，苏联加入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阵营，在重大问题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第一次被国际合作所取代”。“8·19 事件”后，美又施加影响，压苏承诺了从古巴撤军并停止对古援助，客观上为美孤立古巴起了配合作用。

在常规裁军谈判方面，布什政府采取了比里根政府更加积极

主动的立场。1989 年 5 月，布什提出加速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四点建议”，中心的一点是在 1993 年以前将美苏驻欧军队减至各 27.5 万人。1990 年 2 月为适应苏加速从东欧各国撤军的新动向，布什又进一步提出美苏在中欧地区的驻军各减至 19.5 万人的建议。布什的建议对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起了推动作用。1990 年 11 月 19 日，美苏以及欧洲共 22 国正式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对欧洲各方的主要常规武器规定了限额，并对统一后德国的军备作出限制。该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达成的第一个常规裁军协议，对于推动欧洲新格局的形成及加速国际裁军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在加快常规裁军进程的同时，布什政府采取切实步骤加紧美苏核裁军谈判。1991 年 7 月 31 日，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今后 7 年内将各自的战略核运载工具削减至不超过 1600 件，其中重型洲际导弹不超过 154 枚；战略核弹头总数削减至每方不超过 6000 个，其中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弹头不超过 4600 个，重型洲际导弹弹头不超过 1540 个，机动洲际导弹弹头不超过 1100 个；每方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减至苏联现有水平的 50%；此外，还规定了远程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及重型轰炸机的限额，并确定了比较严格的核查措施。美苏经过 9 年艰苦谈判达成上述条约，首次对双方的战略核武库进行大规模削减，标志着美苏争夺战略核武器数量优势的竞赛结束，美苏的核对抗大为降级。

在苏“8·19 事件”急剧逆转后，布什于 1991 年 9 月 27 日进一步提出内容广泛的裁军新建议，除敦促美苏双方尽快批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外，还提出销毁所有陆基短程核武器及其核弹头，从水面舰艇、攻击潜艇以及陆基海军飞机上撤走所有战术核武器，停止机动洲际导弹的研制，等等。布什要求苏联效法，并立即就消除所有多弹头洲际导弹和加强在核武器控制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进行谈判。布什提出新建议的意图有四：(1) 对戈尔巴乔

夫表示支持，并敦促苏削减核武库，解决核武器的指挥控制问题。布什声称，此举是对苏"戏剧性的变化作出反应"，"鼓励苏联更加迅速地走向民主"。"克里姆林宫和各共和国的新领导人现在怀疑他们庞大的核武库是否必要。现在看来，与其说苏联的核武器储备是国家安全的工具，倒不如说是一个负担。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改变美苏核态势。"（2）适应美"地区防务战略"的需要，表明"美国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曾让我们聚精会神了40年的恐惧——有可能发生全球对抗的前景，而转向关注地区冲突问题。"（3）"更加有效地防止核武器扩散，在美苏战略关系中更多地依赖防御性措施，并且实际减少核战争危险。"（4）最后一点布什本人虽未明言，但也很重要，这就是为共和党也为布什自己在即将展开的大选中捞取资本。布什的建议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响应，戈除全部接受布所提内容外，还增加了停止核试验，裁减苏军70万人等内容。

3、核战略朝对手多样化、威慑全球化、应用有限化和攻防一体化方向发展

过去，美国的核战略具有专门针对苏联核威胁的特征，并侧重全面核战争的准备。而现在，布什政府在核战略方面也不再局限于对付一个对手和侧重一种准备。如上所述，布什政府通过一系列核裁军协议，削减美苏双方的核武库，降低美苏核对抗水平，与苏保持一种低水平的相互核威慑态势。据专家估算，《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限额仍大大超出"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需要。该条约规定，双方只削减大约30%的战略核武器，然而即使削减90%，双方各只保留1000枚战略核弹头，不仅仍有能力给对方以致命性打击，而且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国。当然，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战略意图，因为能力是为战略意图服务的。即使在过去美苏军事上互为主要对手，核力量严峻对峙的时候，双方也还力避迎头相撞，唯恐美苏核冲突导致两败俱伤，美苏之间由对抗走向合作后，爆发美苏核冲突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事

实上，苏联在局势动荡之际仍能解决核军备的指挥控制问题，美国对苏联的核力量可以放心。双方在核军备和核战略方面希望进行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1991 年 9 月 27 日，布什在提出新的核裁军建议的同时，“下令美国所有战略轰炸机和根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应销毁的 450 枚洲际导弹立即脱离警戒状态”，并精简战略核力量指挥程序，成立“美国战略司令部”，统一指挥空、海军的战略核力量。布什的这一措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积极响应。戈也宣布，“停止苏联重型轰炸机和应销毁的 503 枚洲际导弹的战斗值班”，将一切战略核力量“纳入统一有效的指挥之下”，并建议与美探讨“建立导弹核袭击预警联合系统的可能性”。

鉴于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所显示出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导弹威胁，针对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逐步扩散的前景，布什政府强调美国的核力量应具有对付多样化核威胁的能力，既可对付全球性核威胁，又能对付地区性核威胁。1991 年 3 月美国《国防报告》预测：“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前景令人严重不安。估计到 2000 年，至少有 15 个发展中国家获得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其中 8 个国家将拥有或即将拥有核能力。30 个国家将拥有化学武器。10 个国家将拥有生物武器。这些威胁已清楚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必须改组我们的能力以便对之作出反应。”“美国在设法遏制核冲突的同时，必须保持能对任何水平的侵略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反应的能力，即可以在使用核武器的时机和规模上作出各种选择，能在最低冲突水平上恢复威慑态势。”根据对付全球多样化核威胁的需要，美将继续推行核力量现代化计划，重点增强灵活性和提高生存能力，完成三叉战略导弹潜艇及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的部署，改进机载航空核炸弹的性能。

布什政府认为，战略防御力量不能取代战略进攻力量，而只能起辅助作用，使美具有攻防兼备的战略能力。由于针对全面核大战的国土反导体系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原设想的定向能武器用于战略防御实战尚很遥远；苏威胁性质改变，在战略上已不再需

要；加之，高达1万亿美元的巨额费用，美国经济实难承受，美国轰动一时的“星球大战”计划已改变了方向：由为美国本土提供全面对导弹防御，转向为加固的导弹发射井和地下指挥中心等“硬”目标提供点状防御；由以空间助推段拦截为主，转向以空中和地面再入段拦截为主；由以激光等定向能武器为主要截击手段，回到仍以导反导；由专门对付苏联的导弹核威胁，转向兼可对付其他国家现实的或潜在的导弹核威胁。布什在1991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我已经指示，‘战略防御倡议’的重点要重新放在提供有限的弹道导弹袭击的防护手段上，不管这些攻击来自何方。”1991年9月27日，布什进一步提出与苏联在反导方面合作的主张。布什说，“美苏并不是拥有弹道导弹的仅有的两个国家。我呼吁苏联领导人同我们一起立即采取具体步骤，允许在不损害现有威慑力量的可靠性的情况下，有限地部署非核防御力量，以对付有限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不管这种袭击来自何方。我们还将加紧努力控制导弹核武器的扩散。上述两种努力是互相促进的。为了加强美苏合作，美国不久将在弹道导弹的预警方面另外提出倡议。”

美国国防部根据布什指示，已决定将“战略防御倡议”（SDI）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合并成为一个“对付有限袭击的全球防护系统”（GPALS），其主要任务是“为美国海外驻军、派往海外的增援部队、美国的盟友及美国本身提供对付意外的、未经授权的、有限的弹道导弹袭击，不管这些袭击来自何方”。美军从“爱国者”防空导弹在海湾战争中多次成功地拦截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导弹中受到鼓舞（伊发射的81枚“飞毛腿”导弹中有80%被“爱国者”导弹中途击毁），正加紧研制命中精度更高、截击距离更远的新型反导弹导弹。在军费开支总额削减的情况下，美增加了反导武器研制费用，1992财政年度为41.5亿美元，比1991年度增加了11.5亿美元。美国防部预计，新的“对付有限袭击的全球防护系统”到90年代中期将部署700～1000枚“智能

卵石”反导拦截器，总费用 460 亿美元，低于原“第一阶段战略防御倡议”的 1460 亿美元。

4、美军建设突出精兵、常规、高技术、快速反应和重组能力五大重点

布什政府强调，在 90 年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为了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全球战略构想，军事手段的作用非但没有降低，而且还可能更为广泛。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列为美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布什说：“在冷战后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之中，在一个迅速变化但依然充满危险的世界上，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破坏稳定的威胁。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军事力量是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基础和保证。”（布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切尼称：“美国实力的基石依然是美国人民对防务所承担的责任。它是支持正在扩大的自由世界的力量。当我们准备应付明日的突发事件时，当我们考虑苏联变化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时，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都无法对美国的能力和意志产生怀疑”（1991 年 3 月 1 日美国《国防报告》）。

为适应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美军建设的重点也逐步发生变化。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90 年代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军面临的挑战将与过去 40 多年不同。在一个欧洲大规模战争或全球大战危险减少的世界上，美军现役和后备役部队的编制、装备、训练、部署和使用将取决于维持在关键地区较小规模的前沿部署和对付地区紧急事件的需要。我们还应具有在必要时重新组建部队以应付重新出现的全球威胁的能力。”布什政府奉行质量建军的方针，突出精兵、常规、高技术、快速反应和重组能力五大重点。

（1）精兵：布什政府认为，防务计划重点转向对付局部冲突后，美军不需要保持对付苏联全球威胁时那样庞大的兵力。切尼宣布，今后美军的作战指标由“一个半战争”降为“半个战争”，

即“保持在再打一场海湾战争所需的水平上”（1991年9月29日切尼答记者问）。布什声称：“我们必须执行一项始终如一的计划，来建立一支规模大大缩小但能力极强的军队。”（布什1991年9月27日电视讲话）美军逐步削减军费和兵力，已成定局。1992财政年度美国军费为2910亿美元，比1991年度减少79亿美元，实减2%。今后5年，每年将实减3%。至1996年度，预计美军费将减至占国民生产总值3.6%，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比例最低的。同期，美现役部队总兵力将减至165.3万人，比现有兵力减少约20%，其中陆军师由18个减至12个，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由24个减至15个，海军舰艇由545艘减至451艘，航母由15艘减至12艘，后备役兵力将减少30万人，此外，还计划关闭本土军事基地91处和海外军事基地164处。与此同时，美军强调质量建军，加强训练，提高人员素质，改进武器装备，增强战备水平和实战能力。

（2）常规优先：从重点应付地区局部冲突的战略需要出发，美军将进一步减少对于“核盾牌”的依赖，大量淘汰过时的核武器，将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加强常规力量建设，使“常规剑”更为锋利。据估计，布什1991年9月27日下令销毁战术核武器，可使美节省200亿美元（1991年9月23日切尼对记者的谈话）。美军90%以上的军费用于优先增强常规军事能力。

（3）高技术化：布什强调，“历史上，技术优势一向是美军赖以抵销对手兵力优势并减少美军伤亡的重要因素，在美军削减兵力并重点对付地区紧急事件的情况下，保持美军技术优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布什1991年8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切尼也说：“美国必须保持军事技术领先地位。现在就着眼于应付21世纪新兴军事技术对美国可能构成的挑战。”（切尼1991年3月《国防报告》）海湾战争作为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显示了美国技术优势的威力，推动美军进一步加强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重点放在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技术、天基武器系统、电子干扰抗干扰、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技术等方面。在削减军费总额的同时，美军新武

器研制费用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92 年度增至 299 亿美元，比 1991 年度实增 11．3%。

（4）快速反应：布什政府强调，为适应“地区防务战略”的需要，美军应大力增强“对主要地区性冲突和危机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地区性危机具有对手和地区条件多样化、往往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爆发、难以得到当地国家支持、缺少良好基地和设施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全球美军将区分为三大集团，即：大西洋部队、太平洋部队和应急部队，三者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相互支援，以达到能同时应付一个以上的地区冲突的能力。为了提高美军的快速反应水平，美军重视加强远程海空运力量、前沿重点军事基地的建设和海外重装备的预先储存。美国防部要求到 90 年代中期，美军能在 6 周内将 5 个陆军师及与之配套的海空军部队部署到世界上任何出事地点。与之相适应，美军将原有 10 大司令部缩编为 8 大司令部，除航天司令部和军事运输司令部未动外，海外 5 大司令部全部撤消，重新组建为：大西洋部队司令部、太平洋部队司令部、应急部队司令部和重组部队司令部，另设战略部队司令部和研究发展司令部。

（5）重组能力：布什政府认为，在重点转向对付地区性局部冲突的同时，美军还必须保持“也许哪一天会重新出现的更加遥远的威胁，例如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所构成的全球挑战。我们目前所设想的较低水平的力量无法应付这种威胁”（1991 年 3 月美国《国防报告》）。“尽管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历史教育我们应当谨慎行事。20 世纪的地缘政治环境瞬息万变，技术发展一再改变了战场状况。重组能力使美国可以视需要以超过对手进攻能力的速度重新扩充和组建美国军事力量。”（布什 1991 年 8 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此，美军重视维持人力物力动员基础。在人力动员方面，重点是保持具有专业技术的军官和士官队伍。美军认为，士兵经 1～2 个月训练即可适应作战需要，而专业军官和士官的技能则需要若干年的培育。在工业动员方面，美国要求尽量避免因

削减军费和收缩军工生产而影响一旦需要时的工业动员和转产能力。

5、调整联盟战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

海湾战争进一步暴露出美国野心太大而实力不足的战略弱点。这次战争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入国家最多的一次战争，又是第一场主要由美国出人而盟国出钱的战争。“多国联盟部队”由28国军队组成，总兵力74.4万人，其中美军55.4万人，占74%，但海湾战费的88%由沙特、科威特、日本、德国、阿联酋、南朝鲜等国“捐助”，共提供“战争捐款”540亿美元，而美国只负担70亿美元。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叫花子警察”的角色。

为了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美国在推行“世界新秩序”构想中，不得不对其“联盟战略”作出新的调整，更多借重盟国的合力。1991年3月美国《国防报告》称：“在冷战后时期的安全环境中，坚强的联盟依然十分重要，既可共同对当前的危机作出反应，又可应付长期的战略需要。美国通过多边或双边的联盟与世界许多国家保持友好联系，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地区性威胁，增强盟友的自卫能力，并使美国取得应付局部突发事件的前沿军事部署的权力。”美国的新联盟战略强调：（1）分担共同防御责任，尤其是分摊共同对付危机的军费，要求日本、德国等国承担美驻军的大部分费用。（2）国际防务合作。美国与日本、西欧等盟国共同研制新武器，合作生产，交流技术。现共有34个合作项目，盟国负担其中40%的研制经费。（3）海外基地和驻军。美正从海外撤销部分军事基地并减少部分驻军，但为了能对地区紧急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美坚持在海外关键地区保留军事基地和驻军。（4）人道主义援助。美国防部现向4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被服、车辆、建筑、食品以及紧急空运救援服务。1991年度，美国首次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此项援助。（5）国际安全援助。1992年度美计划用于这方面的费用为77.6亿美元。现在在美国接受“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外国军事人员共6000余人，“这些人在美国受完教育

回国后，10～20年内有可能升至关键岗位”。(6) 对外军火销售。海湾战争后，美对外军火销售激增，预计1991年将高达330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2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出售给沙特、埃及、阿联酋、土耳其等中东地区国家。

布什说：“欧洲仍是中心战略地区，也是世界上正在经历最深刻变化的地区。”（布什1991年8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什政府在欧洲地区有两个关系美战略全局成败的问题需要解决：(1) 保住和巩固对原苏联和东欧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成果，防止原苏联、东欧形势逆转。一旦原苏联、东欧形势逆转，美全球战略将受到致命打击，建立美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的美梦将化为泡影。而消化和吸收原苏联、东欧，使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改轨，彻底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大家庭”，并非易事。事实表明，原苏联、东欧剧变后，局势动荡，南斯拉夫战乱不止，苏联四分五裂，经济大幅度滑坡。布什政府看到，美国自身经济复苏乏力，无力推行“新马歇尔计划”，不可能将前苏联、东欧包下来，只好稳中求进。看来，这是今后若干年内美全球战略中的头号问题。(2) 维系美欧联盟，保住美国的领导地位。随着欧洲安全形势的改观，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统一后实力地位的增强，美欧战略分歧呈上升势头。为了维系美欧联盟，保住美国的领导地位，布什政府努力在“实现统一而自由的欧洲”的口号下，与欧洲盟国加强协调，共同促进苏、东欧“历史性的变革”。1989年12月，在“柏林墙”拆除后，美国务卿贝克曾提出“新大西洋主义”；1991年6月18日，贝克进一步提出建立包括苏、东欧在内的“大西洋共同体”的主张。布什强调，“北约作为美欧合作的基石应保持活力”，其主要任务是“保持对苏军事优势；遏制和对付任何国家对北约成员国的进攻；维护包括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鼓励欧洲人更多地承担欧洲防务责任”，并与美战略调整相协调，“制定欧洲新战略，改组欧洲部队结构”（布什1991年8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决定逐步减少驻欧

美军，5年内减少50%，由30万人减至15万人，其中陆军师由4个减至2个，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由8个减至4个，储存在欧洲的战术核弹头由3500个减至800个。

亚太地区在美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布什政府在对其亚太战略进行审议后，于1990年4月19日以国防部名义向国会提交了题为《亚太地区战略结构：展望21世纪》的报告。该报告所提出的亚太战略即“合作性戒备战略”，主要内容是：（1）“建立一个兼顾各方安全利益的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要尽最大能力为此作出贡献。”（美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卡尔·福特1991年3月6日在美国防大学的讲话）要求日本、南朝鲜等盟国不仅在财政上“分担负担”，承担美国驻军的大部分费用，而且在防务上多挑担子，日本承担周边1000海里海上安全，南朝鲜接管美韩部队指挥权。（2）美军将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其主要任务已不是“遏制苏联”，而是充当“地区平衡和稳定力量”，防止亚太地区出现“安全真空”，避免“地区性军备竞赛加剧而造成对抗的环境”，“确保没有一个国家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各国共同利益之上”。美计划分阶段削减西太平洋驻军。第一阶段，1992年以前，削减15%，从13.5万人减至12万人，其中从南朝鲜撤走7000人，从日本撤走6000人，从菲律宾撤走2000人。第二、三阶段，视情况再定，但有两点已经明确：一是1994年前第7舰队撤离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美军正设法租用马来西亚的卢穆特海军基地；二是1995年前再从南朝鲜撤走6000名美军，使驻朝美军减至3万人。（3）阻止核、生、化、导弹武器在亚太地区的扩散，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扩散。布什最近宣布从南朝鲜撤出核武器，也包含有这方面的意图。在对华政策方面，布什政府推行“双轨政策”，在与中国维持基本关系的同时，逐步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贸易逆差、武器出售、西藏等问题上向中国加大压力，并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借助台湾对大陆加强“和平演变”攻势。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呈增多之势。

在中东地区，美利用海湾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大抓战后中东安排，企图以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作为“世界新秩序”的样板。布什政策的主要做法是：(1) 发挥美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导作用。1991年3月至10月，美国务卿贝克8次走访中东各国。在贝克的撮合下，1991年10月30日在马德里召开由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联合主持的“中东和会”。(2) 推行“以领土换和平”计划，敦促以色列归还所占阿拉伯领土，换取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3) 帮助海湾战争中受破坏的国家恢复经济，并从中捞取经济实惠。据估计，仅科威特一个小国战后重建就需耗资约1000亿美元。美国已得到科威特重建合同的70%以上。(4) 建立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和埃及、叙利亚为主体的中东地区安全结构，扶植亲美势力，维持地区力量平衡，遏制地区性大国称霸倾向。1991年9月19日，美国与科威特签订了为期10年的“美科安全合作协定”。(5) 推动中东军控进程，在不影响美国军火出售情况下，控制核、生、化、导弹武器的扩散。1991年5月29日，布什提出关于控制中东地区武器转让的建议，7月10日五大国就此专门召开了会议。(6) 在海湾地区留驻一定数量的美国军事力量，主要是海空军力量，谋求军事基地，预储部分重型武器装备，作为“地区稳定力量”。

布什政府较前几届政府更加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始终打着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旗号。布什政府认为，美今后干涉地区冲突时应尽可能采用这一模式，借助联合国的影响，作到“师出有名”。布什说：“联合国将比以往更多地发挥其缔造者所梦想的作用。在维持地区和平，改善全球环境，解决难民，对付贩毒及恐怖活动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布什1991年8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四、简短的评论

1、布什政府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调整，是从“冷

战时代”向“冷战后时代”转化的一次大的战略转变，其深度和广度可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两次大的战略转变相比拟。其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的主要对手变了。5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军事战略虽几经变化，但始终以苏联为主要对手，“遏制苏联”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进入 90 年代，苏联从超级大国地位急剧衰落下来，美国第一次不再有一个明确的独一无二的全球对手，多极化倾向的发展使美国面临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挑战。这一重大变化不仅决定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必须进行根本性调整，而且促使北约的“共同战略”也不得不进行战后最深刻的变动，美国和盟国从此很难再有一个共同的敌人。（2）美国面临威胁的性质变了。在美苏对抗和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美国本土不再是庇护所。如今，全面战争的危险基本消失，美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地区冲突，但这种冲突不会危及美国本土的安全。（3）美国遇到的挑战领域变了。过去，军事对抗突出，而现在，综合国力竞争加剧；过去，美苏争霸为主导，而现在，日、德等盟国的挑战日益严峻。（4）美国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变了。“冷战”时期，美不仅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而且防务计划也以欧洲大战为中心。现在，美全球战略重点虽仍在欧洲，但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已转向第三世界的地区冲突。当然，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仍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有不少基本点仍沿续下来，如军事战略是美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军事优势特别是军事技术优势为支柱；通过提高实战能力增大威慑效果；以核力量为“盾”，以常规力量为“剑”；坚持前沿部署，推行联盟战略；等等。不过，这些基本点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和更新。

2、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和其全球战略一样，尽管基本构想已经形成，但美国军事战略和全球战略的调整仍在进行中。这是因为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存在诸多难以预测

的不确定因素，国际环境包括国际安全环境仍在急剧变动之中。战略调整完全适应千变万化的局势相当困难。此外，美国国内存在着激烈的战略争论。美国战略派别林立，历来主张各异，在新形势面前更难有一致看法。美国国内主要有两种战略主张，一种是以布什共和党政府的决策者们为主体的主流派的主张，强调形势对美有利，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美遇到的机会大于挑战；美应抓住这一“历史性良机”，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和“新干涉主义”，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另一种主要是民主党人士及一些民间学者的主张——“新孤立主义”的主张。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与布什政府的看法相反，强调美国内问题成堆，经济复苏乏力，财政危机深重，教育继续滑坡，犯罪活动猖獗；国际上，原苏联、东欧成了新的动乱根源，使美国背上沉重包袱，日、德等国迅猛崛起，对美竞争加强，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美国到处干涉不得人心。从上述形势判断出发，他们反对布什政府“更加野心勃勃”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认为美国不应充当世界警察，为他人打头阵，让日、德等国坐大，而应重点转向国内，“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全力增强美、经济地位，克服国内社会弊端，迎接21世纪的严峻挑战。上述“新干涉主义”和“新孤立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战略主张的辩论，在1992年美国大选年中更趋激烈。因此，未来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何去何从，尚须拭目以待。

结 束 语

在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上，美国的军事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的演变发展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美国的战略处境与战略地位不同，军事战略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历届政府在使用武力与组织武力方面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美国军事战略中带规律性的特点，对于探讨美国战略的发展趋势是大有裨益的。

一、扩张与称霸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总目标

综观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军事战略目标发展变化的轨迹：争取独立→巩固政权→大陆扩张→海外扩张→与苏争霸→独霸世界。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的军事战略具有争取独立与巩固政权的正义性质。其余二百年所奉行的军事战略，无不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1846 年美国挑起的美墨战争标志着美国进行大陆扩张的开端。美国学者将从独立战争到 19 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美国推行的军事战略统称之为“西半球防御战略”，认为这种军事战略为美国赢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力争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争斗，利用海洋屏障和英国海军的保护，以及本土四周无强敌的有利条件，集中全力于美洲大陆的扩张。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等手段，美国的版图从建国初期的 230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 930 万平方公里。

从 1898 年的美西战争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是美国的“海外扩张时期”。美国学者称这一时期美国奉行的军事战略为

“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通过美西战争，美国夺取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等地的“保护权”。此后，美国不但在太平洋增加了殖民利益，而且对欧洲也表示了“传统的关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宝座，从此便进入了与苏争霸的新时期。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经过多次更迭，每一届新上任的领导人都要对其前任所奉行的军事战略进行重新评估。结果，有的人是“萧规曹随”，按成规办事，有的则对原军事战略作一定的修补。从杜鲁门政府推行“遏制战略”到布什政府推行“地区防务战略”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尽管美国的军事战略几经更迭，但这些战略在争霸世界这一总战略目标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解体后，战后维持了40多年的两极体制不复存在了，美国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布什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1992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制订的《1994～1999财政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明确指出：“地区防务战略”的首要目的就是防止重新出现一个新对手，无论这个新对手来自前苏联的领土，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美国防部长切尼1992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1993财政年度国防报告》更加露骨地说：“美国要确保其他大国不会在世界关键地区起支配作用”。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二、同时运用战争与和平两手

为了实现扩张与称霸的战略目标，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同时运用战争与和平这两手。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曾露骨地说：“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把箭。我们打算给两者同样的注意。”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我们的思维方法常常处于或者增强实力或者进行谈判这二者必居其一的倾向中。更妥善的途径应当是双管齐下，同时兼顾。”据此，他认为

美国的军事战略应该是“一种以既要进行谈判又要加强实力的方针为基础的战略”。里根认为，战争与和平这两手“必须配合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说：“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只是空谈，而实力如得不到我们政治目的的指导，就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美国领导人的上述言论就是对美国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真实写照。

美国要想推行以扩张与称霸为目标的军事战略，首先要依靠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是由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美国在19世纪奉行的“炮舰政策”以及在20世纪奉行的“实力地位政策”和“威慑政策”，都表明武力是美国一切军事战略的后盾。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很强调实力政策，都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国防建设之本。他们认为：“政治与经济力量无论何等强大，也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立即使用，而必须依赖一支机动能力强的军事力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1月9日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美国政府本年度施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军事实力。”可见，使用武力是美国赖以推行其军事战略的主要手段。

所谓和平的一手主要是指“和平演变”。早在1954年1月12日，杜勒斯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说时就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他要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促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6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用“为和平而战”的口号来代替“冷战”这个口号。他在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在戴维营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开创了战后美苏首领的首次“对话”。肯尼迪1963年6月跑到西欧大肆兜售他的“和平战略”，叫嚷要“颠覆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里根在1986年3月14日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咨文》中要求“用我们的影响，以尊重别国传统和政治现实……这样一些谨慎的方式，鼓励进行民主改革”。

在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

言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布什政府于1989年提出的“超越遏制战略”，这是一项侧重点由“硬对抗”转向“软进攻”的战略。布什在1989年5月12日发表讲话时说：“美国现在的目标要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要大得多，我们寻求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美国“支持所有东欧和中欧国家实行自决”，以“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欧洲”。布什的一席话道破了美国企图促使苏联与东欧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险恶用心。

三、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

早在1945年5月12日，也就是在德国于5月8日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第4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去了一封自称为“铁幕电报”的电报。丘吉尔在这封电报中说：“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道铁幕垂在它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一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而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光秃秃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洋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和俄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和压倒一切的。”

丘吉尔的这封电报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高度重视。一年后，杜鲁门的高级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于1946年9月24日提出了一份长达50页的题为《美国与苏联》的绝密报告，极力鼓吹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1947年7月7日，一度曾出使过苏联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以“X先生”的笔名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文章再次提出要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于是，作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盟国的苏联，一下子便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这四十多年，苏联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军事战略中的主要对手。特别是从60年代后期起，随着苏联实力的增强，特别是

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高，苏联成了世界上唯一能威胁到美国生存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更将苏联看成是最危险、最现实的主要对手。

至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军事战略均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原因，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谁控制了欧洲，谁就能称霸全球。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战后，欧洲成了美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为了保护美国在欧洲的利益，美国一直在欧洲驻有重兵，美国在欧洲的驻军通常均占美国海外驻军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战后的四十多年中，只有在70年代初，因美国向印支战场大量增兵，曾出现过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数量超过欧洲驻军数量的情况。但这种战略失衡的现象只是极其短暂的，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

四、准备打多种战争

战后，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军事战略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改变。而每一次改变，都会带来战备重点的变化。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战备重点是准备打核大战。该战略认为，未来战争要么不打，要打就是“闪电”式的全面核大战。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预测：“未来大战中任何一方只要发起2～3次核突击，就能取胜。大战只要几天就可结束。”而肯尼迪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则强调要侧重准备打有限战争。肯尼迪在《1963财政年度预算咨文》中说：“核大战虽对美国的生存威胁最大，但不是最可能发生的战争；发生较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正是由于各种军事战略在战备重点方面各有侧重，这才引起美国军界发生所谓“剑”与“盾”之争，以及后来的“一个半战争”与“两个半战争”之争。

尽管如此，战后美国推行的各种军事战略都是全球战略，都认为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及全球，认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不仅来自拥有庞大核武库的苏联及其领导下的华约集团，而且还来自

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国家。因此，这些军事战略在侧重准备打一种战争时，并不放弃准备打其他样式的战争。例如，“灵活反应战略”就要求准备打三种战争，即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核大战指的是美苏都直接卷进去的、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有限战争指的是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武装冲突，美国无须动员，只需派出有限的部队就可应付。特种战争指的是正规战争以外的战争，如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等。又如，“现实威慑战略”要求准备打四种战争，即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战略核战争是指美国本土遭到核武器直接攻击的战争。战区核战争是指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战区核武器、或牵涉到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战区核武器的战争，但不包括对美国本土进行的直接袭击。战区常规战争是指苏联或中国直接卷入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以外的局部地区的战争。再如，“新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准备打三种强度的战争，即高强度战争、中强度战争和低强度战争。高强度战争是指美苏之间或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或是有一个超级大国参加的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交战双方可能使用一切最现代化的常规武器，也可能使用核武器。中强度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发生的有限目的的常规战争，战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结束，但也可能扩大为高强度战争。低强度战争主要是指为对付暴乱、游击战、特种战争、恐怖活动等而进行的小规模常规战争，战争的目的和规模有限，使用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等综合手段进行。

五、奉行联盟战略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奉行以集体安全为中心内容的联盟战略，认为“集体安全是大战略的支柱”。所谓“集体安全”，美国官方下的定义是：“通过共同行动谋求国家联盟中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国家联盟既可包括许多国家，也可以仅限于两个国家。”美国参联会发表的《1987 财政年度军事态势报告》指出：“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以强大的联盟体系为基础的”，“强大的联盟是美国军事

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就认识到，要推行包围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单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办不到的。美国参议院于1948年6月11日通过《范登堡决议案》，授权杜鲁门政府广泛组建“区域性和其他集体的军事联盟”。尼克松上台不久提出的“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与盟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要求盟国承担起自身防务的主要担子，美国则根据自身的利益对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军经援助和海空支援，力避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地面战争。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莱尔德于1971年5月17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谈话时说：“现实威慑战略强调加强伙伴关系，虽然要求美国在继续分担防务责任方面尽自己的本份，但也要求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更多地承担自己的防务责任。”据此，他提出一个“总体力量”的方针，主张把盟国的军事力量纳入美国全球战略计划之中，以缓解战线过长而美军兵力不足的矛盾。里根入主白宫后，一再强调加强西方联盟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块极其重要的基石”。他在1987年1月致国会的报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美国必须与其盟国和朋友协调行动，别无其他选择。”

美国历届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联盟战略，是因为他们认为推行这一战略具有如下好处：一是便于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联合西方国家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及华约集团；二是便于控制盟国，维护美国在西方世界的“盟主地位”；三是便于在平时经营全球军事基地网，以便在战时能尽快展开兵力；四是可以弥补美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使美军得以处于全球机动的位置。

六、坚持文官治军的原则

文官治军是美国历届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遵循的基本原则。早在美国建国初期，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曾说过：“军队是一台危险的发动机，绝不能掉以轻心。”（《华盛顿选集》第260页）他认为，要保证美国能长治久安，就必须防止军人干预政治。

文官治军，可以防止产生独裁与暴政。1776年美国制订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规定："任何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地接受其领导。"美国制订的《1787年宪法》，为坚持文官治军的原则制订了一系列防止军事独裁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确保国会对军队的控制。国会拥有财政大权，每两年拨付一次军费，这样就可使军队的规模受到拨款数额的限制。国会还对民兵实行领导，并对总统委任的军官进行审批。总统关于军事问题的一切计划及军事预算都需经国会讨论和批准。二是规定民选的文官总统为三军统帅，由总统任命各级军官及对军队实行具体领导。三是实行集权与分权，通过相互牵制达到权力平衡。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三权分立，互相牵制，有利于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独裁和暴政。

此后的二百多年来，美国政府经过几十届更迭，军队的指挥体系也作过许多重大的调整，如设立统一的国防部、空军升格为独立军种等，但文官治军仍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恪守的基本建军原则。如今，美国总统仍是三军总司令，而且总统不得从军官中直接产生。1950年戎马一生的艾森豪威尔并非在军职岗位上直接竞选总统的，在这之前他曾短暂地担任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此外，国防部长和各军种部长均由文官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参谋长只不过是总统和三军部长的军事顾问和助手。

七、实行现役部队（常备军）与后备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在美国独立战争即将胜利结束时，华盛顿为了解决既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又不致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这一矛盾，提出了实行常备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他认为，常备军"虽然对自由是危险的"，但根据他在战时的经验，在战争中只有正规军（即常备军）才靠得住，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要靠正规军来镇压印度安人并保护商业往来。另一方面，华盛顿也清楚地看到，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对于新

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确是难以承担的，而建立民兵队伍却不必由国家出钱。据此，他强调必须把民兵看成是美国的安全屏障和战时可以依靠的第一支有效的力量。他要求把民兵当作国防建设的基点，并在全国实行民兵制度。

美国的这种武装力量体制，经过多次战争的检验，其内容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例如民兵制改变为后备役制度。后备役部队又按战备与训练程度分为一、二、三类，以便在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时，能有顺序地调服现役。此外，后备役按隶属关系又分为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后备队。前者隶属州政府，负责维持各州的地方治安；后者直属联邦政府，但二者在战时均可调服现役，充实国家的现役部队。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裁减军队员额，强调质量建军，美国当然也不例外。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将进一步裁减三军现役部队总员额，但为保证在战时能迅速扩充军队，将增加后备役部队员额。总之，在美国的建军史上，尽管武装力量体制的内容发生过许多重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现役部队与后备役部队相结合的这种基本的武装力量体制是不会改变的。

八、美国军事战略的弱点

美国的军事战略经过二百多年的修补与发展，至今已基本形成相当完整的体系。但是，它却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可以说是矛盾重重，步履维艰。①美国军事战略是一种向全世界侵略扩张的全球战略，其最终目标是独霸世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这种非正义的军事战略在推行过程中不仅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本国人民的抵制。②美国的野心太大与其国力日衰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今美国已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连打一场海湾战争都要靠别国资助，要想独霸世界更感力不从心。③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近年来美国的两个重要盟国——德国与日本经济发

生了腾飞，现正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对美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上，日、德已成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由争夺海外市场发展到抢占美国内市场；政治上，力图逐步摆脱美国控制，在全球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军事上，不愿再捆在美国的战车上。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已经出现欧洲国家独立处理欧洲事务的倾向；在北约前途问题上，美欧也是同床异梦。④与独联体、东欧等国的矛盾。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背上沉重的包袱。为了摆脱经济困境，独联体和东欧一些国家纷纷向美国求援。美国无力承担，只能使这些国家失望。波兰总统瓦文萨已有“上当受骗”的表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与美矛盾依然很多，很难设想会完全听命于美，甘当美低一等的伙伴。⑤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美国到处干涉，不得人心，与世界多数国家矛盾必将不断增长。至于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则更是对美的称霸野心及“和平演变”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布什政府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美梦难以实现。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预言，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主张必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主张一样，难逃破灭的下场。连布什本人也承认，“如果有人对你讲，美国的最好日子近在咫尺，那么他们是看错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美国军事战略研究
作者=
页数=233
SS号=0
出版日期=
Vss号=55131115